狱中二十年

薇拉·妃格念尔著

巴　金译

文化生活译丛

XXVIII

狱 中 二 十 年

薇拉·妃格念尔著

巴　金译

文 化 生 活 译 丛

XXVIII

狱中二十年
YU ZHONG ERSHI NIAN
〔俄〕薇拉·妃格念尔著
巴　金译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137,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4.50 元
ISBN7-108-00050-4/I·15

文化生活译丛
XX VIII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　刷　者
六〇三印刷厂
发　行　者
各地新华书店

目　　录

自　序

"今日得过且过，勿虑明日。"新的时代需要着新的歌曲，而我的书却是一首已经过去了、完结了而且永不会回来的时代的歌。

不过，我的书虽然只讲到过去的事，对目前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丝毫的贡献，但将来有一天它会有用处的。死了的人不会活起来，可是他们会复活在书里面。西尔维约·佩利科的《我的狱中生活》①或德·科斯特的《欧伦施皮格尔》②在我们看来都是活着的，不管佩利科的书写于一八三二年，科斯特在他的书中描写的是十六世纪的事情。

---

① Silvio Pellico（1789—1854），意大利的著作家。他的狱中记原名 Le mie Prigisni（1832）。

② Charles de Coster（1827—1879），比利时著作家。《欧伦施皮格尔》原名 La légende de Thyl Eulenspiegel et de Lamme Goedzak（1868）。欧伦施皮格尔是十六世纪一个诙谐家的名字。

"写吧，"那个伟大的悲剧演员爱勒翁诺拉·杜色[1]跟我在国外会见的时候，她劝我道，"写吧。你应当写；你的经验不应当白白地失去。"

那么我就把我在《生命的钟停了的时候》[2]的那一段经验写出来，不让它白白地失去，我希望对那班要在生命的钟不停地摆动（这钟的指针是永远向着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的方向移动的，目的在给俄国、给全人类争取幸福）的情形下面生活的人它会有一点用处。[3]

薇拉·妃格念尔

---

① Eleonora Duse(1859—1924)，意大利女演员。

② 妃格念尔的狱中记(即回忆录的第二卷)一名《生命的钟停了的时候》。

③ 这是《狱中记》第二卷的《自序》，篇末未注明日期，大约是在第一次欧战前写的。第一卷和第三卷都另有作者的自序。

第一天

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早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房里还很阴暗，我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保证”看守走进里面来。这所谓“保证”看守就是指那班退伍的兵士，他们跟宪兵[①]们一块儿负责管理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囚人。他是一个最凶恶的禁子，一只灰色的老鼠，他厌烦他的工作，他的职务和他的责任，讨厌几十年来他象一只猛犬似地看守着的那些囚人。生活显然并没有给过他什么好处；现在他又老，又病，境遇又坏，因此无论遇着谁，只要他能够，他就会对他或她发泄他对命运的牢骚。

我们刚刚见面，他就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还记得，我被带进彼得保罗要塞来的时候，刚进了我的监房，没等关上房门，他马上就动气地咕噜道：“这儿

① Gendarmes 通常译作宪兵，但这里应该是一种政治警察。他们的职务与中国过去的宪兵不同。

不许唱歌！”我吃了一惊；我从没有想到唱歌的事情。我便说：“唱歌？谁还有心肠想到歌？”不错，我走进了要寨的墙垣内，我的灵魂里不是充满着严肃的情绪和严重的思想吗？在这种时候，唱歌的举动简直把这一块被许多代人的受苦所圣化了的地方亵渎了！

如今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他趁我还在睡眠的时候闯进了我的监房，粗暴地把一双臃肿的毡靴放在地上，又掷了一件没有衬里的羊皮短袄到我的床上，一面生气地叱道：“起来！快点！多穿一点衣服！”

“什么事情？”我想道。“他们要把我怎样处置？”

自从我被捕以后我就觉得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也不再问我自己：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只问他们要把我怎样处置。的确，一个人失掉自由就等于失掉他自己身体的主权。

“他们要把我怎样处置？究竟怎样？”我一面匆忙地打扮，一面这样想。我的装束是很简单的：裹腿用的破布；一双农人的鞋子；一条又脏又旧，而且虫蛀过的，军服布做的裙子；一件满是汗渍的囚衣；一块包头用的白布帕子。我十天来就没有肥皂了；他们还不许囚人使用梳子、牙粉和牙刷。

我一直在想：他们要把我怎样处置？也许他们要把我带去处死吧！但是我还记得仅仅在三天以前他们告

诉过我减刑的事情，那个老典狱庄严地宣告说："终身懲役罪"。我的头脑昏乱了。我过了整整两年的单身禁锢的生活，如今在我的眼里现实也变成模糊的了；可能的事情和不可能的事情奇怪地颠倒过来，而不可能的事情却仿佛变成可能的了。

好吧，说不定他们到底会把我处死的？再不然他们并不把我处死，他们只杀我的同志们，不过把我放在他们身边让我去目击、身历他们的经验。真的，为什么不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的人不是都遇过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一次？但是为什么那个"保证"看守又说："多穿一点衣服"呢？显然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带到什么远的寒冷的地方去。但是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到一个中间竖立着绞刑架四周挤满了人的宽广的广场去吗？还是到西伯利亚去？难道他们会把我放在一辆雪橇上面，由两个宪兵押着，驶到加拉的矿山去（在那里我还会遇见别的比我先到的女流放人）？

虽然是在秋天，而且直到昨天地上还没有见雪，但毡靴和羊皮短袄却固执地在我的心里绘出了一块遍地积雪的平原，一部雪橇和一辆三驾马车。

宪兵们押着我经过走廊，下了楼梯走进卫舍前面的一间屋子。典狱穿着制服站在写字台前面，还有一

个穿便衣的矮胖子站在窗子旁边，他的背向着我。

"你的手！"典狱说。

我惶惑地伸出了我的手。那个穿深色便衣的男人立刻掉过身来，他把我的手腕小心地捏了一会，好象一个医生给人摸脉一般。"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道。"这也许是副医官。他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验我的脉搏？难道前面有什么事情会使我晕倒吗？"一个阴暗的思想掠过我的头脑。我觉得我的心在我的胸膛里跳得愈来愈慢了。我把我的全副力量聚集起来。

同时那个我所假定的医官又向着窗子转过身去，依旧把背朝着我。典狱又说道："你的手！"

于是那个深色衣服的东西又掉过身来正对着我，他手里捏了一副手铐。我刚才起的对于未知事情的恐惧现在却让步给对于现实情形的愤怒了。不能抑制的狂怒抓住了我。"什么！我还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们却要给我上一副手铐，那奴隶的记号！他们想用这手铐来束缚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血液完全停止流动了，我因了愤怒而战抖着，一面不住地顿脚；当他们给我上手铐的时候我狂暴地对典狱说：

"告诉我的母亲！告诉她不管他们怎样处置我，我一点也不会改变！"

"好，好，"典狱差不多骇坏了，他喃喃地说。

“告诉她不要伤心。我只要有书读，我只要时时得到一点她的消息，这就是我所要的东西。”

“好，我会把什么话都告诉她，”典狱惶乱地呐呐说。

我们走过在卫舍里立正站着的两排兵士中间，进了一个小小的天井。在那分隔堡垒广场与特鲁别茨科伊堡的大铁门外边停了一辆马车，有两个穿外套的宪兵看守着。我向着马车走去的时候，我无意地看见了那个最愉快、最和善的看守。他身材瘦小，有一张红铜色的脸，再盖上一脸的红胡子，左边脸颊上有一条大伤疤，经过他的左眼一直到太阳角上。他常常温和地望着我，又对我微笑。他好象在说：“啊，太太！我看见你一天天变瘦了，脸色更苍白了。快不要这样！我不骗你，生活里究竟也有快乐。”那时候我在孤寂中也感到了一点安慰。

现在他显然是故意来和我见面的：他的面容严肃而忧郁。我们的眼光遇在一起了，好象有一块东西堵住了我的咽喉。这个和善的朋友那么怜悯地望着我。“呵，薇拉，不要哭，不要想到哭！在这种时候还淌眼泪真是太可耻了”，我不停地暗暗告诫自己。但我又是多么地感动，多么地感动。我把他的眼光带进我的活葬墓去，在那里它会给我一点安慰：这一个心地单纯的俄国

人，一个小兵，他守护着我——他的灵魂是和我在一起的，他同情我，他怜悯我。他是最后一个而且唯一的带着友情送我到我的暗夜似的新生活去的人。

“他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坐在马车里面的时候，我向典狱问道。

“我不知道，”他这样回答。

出了彼得保罗要塞，马车便向右转弯，沿着涅瓦河岸边驶去。几分钟就象几点钟似地长久。马车终于停住了，我们走了出来，我看见前面有一块小的跳板和一只轮船；船上连一个人也看不见。宪兵们捉住我，差不多是把我抬到甲板上去了的。随后他们又把我带进舱里去，那房间的窗户都是很小心地用窗帷遮掩了的。轮船开动了，继续驶行着。

两三个小时以后一个军官跑来问我是不是要吃一点东西。

“不！”

他又跑了来。这一次他问我要不要喝茶。

我坚决地答道：“不。”

我盼望他不要走近我。我盼望他不要问什么话。我愿意静一下子。我应该静一下子。我过了二十个月的完全孤独的生活，每两个星期只能够在和母妹会面的二十分钟里讲一次话，因此我的可怜的声音就大大

地改变了；它变成这么细，这么无力。它有一种背叛的调子，它完全违背了我的意志。

轮船继续地前进着，它把我载往未知的地方去。起初我以为他们也许把我送到一个荒僻的港口，然后搭火车或马车到别处去。也许是到克宿尔门？我早就听见人说过芬兰境内的这个堡垒。再不然就到席吕塞尔堡去？我在彼得保罗要塞里曾从什么书报上见到一个消息说，席吕塞尔堡内建了一个可以容纳四十个人的监狱，是专为民意社的党员而设的。在审问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志也嚷过："把我们都关到席吕塞尔堡去！"

大约过了五个钟头，轮船靠了岸。宪兵们忙乱了一会，便带我到舱面上去。他们捏住我的膀子，做得很敏捷，而且捏得很牢，好象用铁钳挟住它一般。在我的前面现出了石灰石的白塔和白色墙垣。在一个高高的塔尖上有一把金钥匙在发亮。再没有疑惑的余地了——这是席吕塞尔堡。那把钥匙高高地耸到天空去，好象是一个标记，仿佛在说：一旦进了里面以后就决不能够再走出来了。那只两头的老鹰张开了它的翅膀覆盖着席吕塞尔堡的入口，在老鹰上面有一个被风雨剥蚀了的标识，写着"帝国的"字样。这个字眼里含着一种报复的、私人的意味，它把我刺痛了。

一大群人过来把我押进了大门，我后来才知道他

们都是些军官、宪兵和兵士。于是我看见了一个完全不曾料想到的景象。这个地方带点田园的情调。是一个消夏的别墅？是一个农业的区域？是这一类的东西——平静的而且朴素的。左边有一座两层的白色建筑，这本来可以做一所膳宿兼备的女学校，现在却真的做了兵营。右边有几所孤单的小屋，墙壁刷得很白，形状又好看，每一家都有一个小花园，两家中间就隔着一块宽广的草地，上面种了好些树木。树叶已经落了，但是在夏天这周围全是一片绿色，那时候会是多么地美！在尽头处还有一所白色的礼拜堂带了一个金色十字架高耸着。这使人感到和平与安静；这使人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这群人不停地向前走着，不久我就看见一所红砖建造的两层的楼房，窗户是深黑色的，屋顶上还有两个高的烟囱——这是一所典型的工厂。这楼房前面红砖砌的墙上开着两扇红色油漆的铁门，他们押着我走了进去，把我带上一条门廊，这门廊看起来倒还可爱。我们又穿过一条走廊，后来进了一间颇宽大的拱形房顶的屋子，那就是办公室。角落里还放着一个浴盆。

"你的手！"典狱说。

我把手伸出去。他摆弄了一阵，打开了手铐，叫人拿走。所有的人都走开了，只剩下一个穿着军医制服

的年轻人和一个中年女人，这女人是突然出现的，从她的相貌和举止看来，她和一个不正当地方的当家人完全相象。

于是医生在桌子旁边坐下，把背朝着我，那个女人便动手脱我的衣服。

几分钟以后我站在那里，光赤着身子。

我觉得痛苦吗？不。

我觉得羞愧吗？不。

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我的灵魂飞到别的地方去了，再不然就是它躲开，缩成了极小极小的一团。只有我的肉体还留在那里，它完全感不到羞愧和道德的痛苦。

医生站起来，在我周围走了一转，把我全身都看过了，在一本簿子上写了一些话。他便离开了这房间。

他们带了我到这里来，要我在这里住一辈子。我是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然而他们还以为应该把我全身的衣服剥光，记录下来我的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

四年前我的三妹叶夫金尼亚在审判以后也曾受过这样的待遇。我被捕后内务大臣脱尔斯道伯爵来访问我，我曾经气愤地把这事情告诉了他。

“那是非法行为，”他说。“不应该有那种事情。”

然而不管他的话（也许正因为我动了气的缘故），他们如今却使我也受着这同样的待遇了。我并不抗议，也不叫喊。我并不抓，也不咬。

在我们的幼年我们读过古罗马的历史，知道罗马皇帝为了娱乐乱民的缘故把年青的基督教处女带进了比武场中，然后再放进饿狮去吞噬她们——这读本怎样告诉我们呢？

那些女子并不叫喊，也不抵抗。

然而我也有我的上帝，我的宗教：自由，平等，博爱之宗教。为了这教义的光荣，我也必须忍受一切。

那个女人要我洗澡，这也是非做不可的，也许这样一来他们就更清楚我是否还藏了东西在身边。我洗过澡，她就走了。别的人来把我带上楼去。

这监狱的两层房屋是用一个绳网和一条窄狭的走道隔开的，这走道象一个露台似的沿着上层的一排监房伸出去。由于这种布置我们便能够一下子就看清楚了整个监狱的内部，这四十个监房的铁门全都可以看见。

绳网的中央有一条通到二十六号监房去的窄桥，这样把绳网分开了。“叹息桥”，我被带着走过这座桥的时候，我不觉这样想道。我记起了古威尼斯共和国行政官的宫殿，在那里有一座这样名字的桥，这是威尼

斯的反叛者从监房走到断头台时所必经的路。我每天都走过这席吕塞尔堡的叹息桥，我要走许多许多年。我就关在这二十六号监房。房门猛然地关住了，我没有力气，一下子就倒在床上。

一个新生活开始了。这是一个在死一般的静寂中间的生活，这种静寂，你常常去倾听它，而且也听得见；这种静寂，它渐渐地制服着你，包围着你，钻进你身体的每个毛孔，钻进你的理性，钻进你的灵魂。它那种喑哑是多么可怖，它那种沉默和那偶然的发作又是多么可惊。渐渐地有一种感觉从它那里悄悄地到了你脑中，你觉得有什么神秘的事物近在眼前；一切都变成不寻常的，暧昧的，仿佛是在一个月夜里，在孤寂的时候，在一座静寂的树林的浓荫里一般。一切都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在这种静寂中真实变成模糊与虚幻，想象反而象是真实的东西了。一切都是纠缠在一起，混淆不清。那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白天就象是无梦的睡眠，它那种闲懒生活使人够厌倦；在夜里你却有那样的光明灿烂的好梦，使你几乎疑心这不会只是你的想象的结果。你过着这样一种生活，让你感觉到梦就象是生活，而生活又仿佛是梦。

而且那些声音！那些可诅咒的声音，它们突然地，

使你料想不到地打岔你，惊吓你，然后消失去了。在什么地方起了一个响亮的嗞嗞声，好象是一条巨蟒从地板下面爬上来，要把你卷在它的又冷又滑的身子里面。其实这只是水在下面的水管里流动作声。你会想象着有人禁锢在石壁中间。因为你听见一声极细弱的、忍住的呻吟，好象有人闷在一堆石头下面似的。然而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患肺病的囚人的极微弱的干咳声。要是什么地方起了一个碟子的响声或者金属的床脚碰在地板上的声音，你的想象就会给你描绘出带着脚镣手铐的囚人来。

那么在这里什么是真实的呢？什么是这里真正存在的？什么是幻想出来的？这里是坟墓一般的沉寂和宁静，要是你忽然听见门口起了一个低微的沙沙声，那就是看守已经俯在门洞眼上窥探了你的动作，现在关上盖子走了。这好象一个电池的电线从那里拉了过来。电流挨了一下你的身子，电击通过你的全身，通到了你的手和脚；好象一些细针刺进你的指尖，你的整个身子经过那一下猛烈的电击以后还继续痛苦地、长久地颤动着。它惧怕着什么东西，你的心战栗着，不肯安静下来。

至于夜间的梦啊！那些疯狂的梦！你看见逃走，追缉，宪兵，开枪，逮捕。有什么人被带去处死刑。群

众激动而愤怒了；一些红面孔由于怨恨而扭歪了。然而你最常梦见的却是拷打。他们在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都安置了无数的细管，从那里面放出热气来拷打你。那热气烧着，打着，它是很可怕的，你不能够逃避。监房锁着，它是空的，完全空的，里面到处都是灼热的汽流。或者你会梦见他们用电刑拷问你。你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面，就象卫舍里面有的那种木头椅子，你不能够站起来；有一个看不见的禁子在把电流通到你的身上。一次，两次——你醒过来——你的两只膀子搐动着，再不然你的腿部的筋肉因痉挛而集成了一块象铁一般坚硬的东西。

只有一个强健的声音还留在你的灵魂里面，它反复地对你说：

> “薇拉，你要勇敢，你要坚定！不要忘记你的同胞，记着他们是怎样生活着的！不要忘记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记着他们的那种繁重劳苦的工作，他们的那种没有丝毫快乐的生活；不要忘记屈辱，饥饿，疾病与贫困。
>
> “你要坚定。倘使他们把你的母亲给你带走了（他们对于一个贪心的杀人犯或一个无耻的引诱妇女的人也不会加以这种处罚），你不要哭。不

要为斗争的失败而哭，不要为死亡的同志而哭。不要为你的生活里的那些废墟而哭。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这神秘的静寂里，在这聋哑的石头后面，你的朋友们还是无形地存在着。在这里受着压迫的并不单是你一个人；他们也在受苦。你且想想他们。他们是看不见的，然而他们还是在这里。你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然而他们还是在这里。他们象脱离了躯壳的灵魂一样守着你，保护着你。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孤独的！”

最初的几年

我们被人剥夺了一切：故乡和人类；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志和我们的家属；这些我们都失掉了。我们和所有的生物完全隔绝。二重窗的不透明的玻璃遮蔽了阳光，要塞的墙壁遮住了远的天际，遮住了田野和村落。在整个世界中他们所留给我们的就只有一个牢里的天井；在那宽阔无垠的天空里就只有我们在那窄小的圈地里散步时所看见的一小块。在所有的人中就只有宪兵在这里，对于我们他们就聋得象一些石像，而且他们的面孔没有一点表情，好象只是一些面具。

生活象水一样地流过去，没有印象，也没有接触。虽然它在内心的感受很复杂，但在外表上它却是非常荒芜，而且非常单纯，差不多是透明的，所以它就象一场无梦的睡眠；而同时在我们的梦里却有着种种的活动，人物和色彩又时时在变换，这梦景倒反而近似现实了。日子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一月一月地逝去。它们模模糊糊，一个叠在一个上面，好象一叠在阴

天里拍摄的轮廓不清楚的底片。

这里没有钟，然而我们却知道外面的看守们什么时候换班。他们会迈着沉重而匀整的步子在牢里走一转，一直走到有守卫在那里站岗的高墙边。我的监房原先本是白色的，不久就变成了一只阴暗的箱子。沥青的地上涂了一层黑漆；墙壁上半截是灰色，下半截约有一个人高的光景漆成了深铅色。每个人一旦走进这种重新油漆过的监房，就禁不住对自己说：“这是一口棺材！”

其实监狱的整个内部真象一个坟墓。有一次我违犯了狱规，他们把我带到惩戒室去，那时候我才看见了这监狱的内部，是在夜里，燃着灯光。墙壁上悬挂着一些小灯，照亮了这建筑的上下两层，这建筑只是被一个窄小的露台和绳网分隔着。这些光点就象一个教堂墓地上神龛里点的小小的长明灯。而那四十扇紧闭着的门很象一排直立着的棺材，在那些门后面囚人们正在寂寞中憔悴地度日子。

秘密和不安包围着我们。人家不许我们见任何人，也不许我们和家属通信。任何种类的信息或话语都不能到我们身边，我们也不可以给谁送出一点信息。我们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应当知道，也没有人应当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的女儿进了坟墓里的时候，你会得到她的消息的，”我的母亲向内务部次官阿尔测夫斯基问起我的消息，他就这样地回答她。

我们的姓名完全被忘却了。他们不称呼我们的姓，却使用号码来代替，好象对待衙门里的物品或文件一样。我们不知道这要塞四周是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景象，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被关在里面的这个建筑对于我们是一个秘密。我们不能够在里面各处闲走，也不能够把这建筑各处观察一番。住在这里面的囚人是彼此不认识的，他们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却被厚厚的石墙分隔开了。每件相熟的、惯常的事物，每件亲近的、亲爱的、容易理解的事物都消灭了；只有陌生的、古怪的、不可理解的留在这里。而且在我们全体的上面笼罩着一种难堪的静寂。这并不是使神经休息的活人的静寂。不，这是死人的静寂；当一个人在亡人旁边留了许久，他的心就会被这静寂抓住——就是这样一种可怕的静寂。我们倾听着，警惕着什么事情的到来，等待着；……这静寂总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它一定会有个终结。于是，对某种可怕的事情的预感咬着我们的心灵。某种事情会发生，一定会发生……这一定是可怕的，比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还要可怕得多。白天会接连地过去，没有一点变化，黑夜会

接连地来，每夜都是一样。月来了又去；年来了又去了，这是第一年；这一年就只象是一天和一夜。

关进席吕塞尔堡来的囚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在头几年里面，就死了十五个。这以后，密纳科夫与麦秀根因为反抗给枪毙了；克user门科自缢；格拉切夫斯基自焚而死；尤瓦切夫、谢德林和科那舍维奇发了狂。雪巴林一个时候神经失常，不过后来又复原了。在以后的几年中尤尔科夫斯基死了，波希托诺夫发狂而死。在我们入狱的第八年，苏菲亚·金斯堡又割断喉管自杀。我们受了多年的单独禁锢，她连一个月也不能够忍受。[①] 席吕塞尔堡的囚人甚至在出狱以后也不能够生活下去。雅诺维奇和马尔地诺夫在西伯利亚用手枪打死了自己，帕立瓦诺夫在国外自杀。席吕塞尔堡的经历使他们的生活力完全干涸；他们抗拒生活里的灾祸与不幸的能力全都耗尽了；他们再没有余力继续生活。

在这几年里我自己的精神也很沮丧。其实谁又不会被席吕塞尔堡所摧残呢？我们民意社的党员给关进席吕塞尔堡时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的？革命运动被镇压了，它的组织被破坏了，执行委员会彻底消灭了。人民

① 苏菲亚·金斯堡用剪刀自杀。据A·S·拉玻特说，她是"为了逃避一种每个高贵的女人看作比死还可怕的命运"而自尽的。

和社会并没有支持我们。我们是孤独的。专制政治的活结拉得更紧了，而我们离开人间以后并不曾留下接班人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未完结的斗争。

然而席吕塞尔堡还给了我一种东西，这是我不曾预料到，而且我也没有准备来领受的。我生活里最后的快乐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把她给我带走了。使我的生活充实而且值得活下去的人，在全世界中就只有她一个；当我堕入在深渊里面的时候，我能够依附的人也就只是她。快乐在我的心里死了，但是它临死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椎心的哀痛。我未进监狱时，我并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而且我只有偶尔想到她。那时候我的祖国占有了我的思想；我的革命的活动占据了我的心灵；我有强烈的依恋和友情；我有无数的同志。现在连人连物全都没有了。我的母亲，那个最后的损失，我的最后一个亲爱的人的失去变成我的一切大小的损失之象征了。

我绝不后悔我选择了把我引到这个地方的那条路。那条路是我的意志选择了的——我不可能后悔。我被剥去了锦衣华裳而穿上有标记的粗布的囚服，[1] 我

① 在俄国囚人衣服的背上缝着一个类似纸牌中方块形的一点(A)的标记。——德译本注

从不曾有过一次后悔。我不悔恨，我只感到痛苦。我的心里只是充满着对母亲的思念——只有她的影像，并没有别的东西，和她分离使我感到了绝大的悲痛。然而我的一切痛苦，我的一切悲痛，我的破碎而受伤的精神的悲痛，我的被压迫受屈辱的身体的悲痛——这些全都被吸收而包含在那悲痛里面了。这悲痛表现在我失去母亲这件事情上，它把我损失的一切和被剥夺的一切全凝聚在一起，铸成了一种严酷的痛苦，它是如此巨大而难克制，使得那从不曾自由地表白过却始终潜伏在下意识的奥底的一切，如今都让人体味到了。我的阴郁的灵魂濒于破碎的险境了。

然而当再进一步就会使我沦于不可挽救的境地中的时候，一个内部的声音却说了："站住！"说话的并不是我的怕死的恐惧。死是十分值得愿望的；死和殉道的观念是相联的。在我幼小时候基督教的传统就教导我把殉道视作神圣，后来为被压迫者的权利的斗争的历史又巩固了我的这种观念。阻拦我去走那最后一步的乃是我对于发疯的恐惧，我怕发疯，我怕个人的堕落，我怕精神的与肉体的崩溃。但是要不走那一步，就须得努力取回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恢复精神的健全。这时候我的朋友们便来给我帮忙。

我心里开始出现了一道亮光，就象棕榈主日[1]的

蜡烛的微光。喑哑的墙壁开始说起话来②；我能够和我的朋友们通信息了。他们送来了抚慰，还送来了许多友爱的音信，席吕塞尔堡的冰层在他们的友情的温暖中融化了。别的影响也发生了效力，那是一些严峻的话语和教训。有一次我的邻人——一个我以前并不知道的男子问起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在想我的母亲，我在哭，”我答道。

我的邻人严厉地责备我。他问我读过《西门·麦叶的回忆》没有，是不是还记得船上的那一段：当人们开始给巴黎公社革命者剃头的时候，船猛然颠簸起来。他把这个西门·麦叶③，千万个巴黎公社革命者中的一个拿来给我作一个榜样。他对我训导了一番。我吃了一惊，我受了伤害而且生气了。我读过《西门·麦叶的回忆》，我记得船上的那一段，还有别的许多情景我

---

① 棕榈主日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节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② 指敲壁传话，这是帝俄监狱中关在单人房里的囚人们的一种谈话方法。老囚人对新来的囚人的敲壁方法是按照俄文字母的顺序反复敲着。等到彼此能够简单地通话之后，便改用简便方法，即将俄文字母排成六行，每行容五个字母，地位排定了，以后用到一个字母时，只要敲出它在某行某格就成了。譬如用一个B字，得先敲一下，又再敲三下，说明这是第一行第三格中的字母。

③ 西门·麦叶上尉，犹太人，巴黎公社革命时，他是国民军的军官。

都记得清楚。我不禁想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教？我不需要他的说教！”

然而事实上我正需要这个。倘使我的邻人同情我，柔情地安慰我，那么他的话就不会有一点用处；那种话会适合我的心境。但是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他很明白地指示出来我的责任是什么，他还使我气恼。这种气恼却救助了我；它和我平日的心境正相反，它和那心境冲突，而且把它打破了。在寂寞里一件很小的事情有时候会变成非常重要；它会依附在你的意识里，你很难把它赶走。这次的事情就是如此。我那邻人的话就盘踞在我的心上，使我不能忘记。我们中间的那堵墙壁每天都使我记起我们的那番谈话；每一次我记起它，就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激怒和困恼的感觉。这样一来我的悲痛和渴望就被打断了，气恼倒反而做了有益的事情。

然而还有别的更大的东西把我救了出来。我的审判是我所参加的革命剧之最后的、终结的一幕，在我得到判决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社会活动完结了，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人。我被捕以前的年代里的那种紧张，在我候审期内还能保持，现在却崩溃了；再没有工作留给我的意志，在我心里人的感觉就醒起来了。人现在会受苦，而不能够自制，而且会屈服于疾病和死亡的攻击。

我忘记了：我既然走上了社会斗争的舞台，就再不能够仅仅做一个单纯的人；我比一个简单的人要多一点什么，少一点什么，并且我的社会使命也还没有完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团体的一个成员已经把民意社的名字写在我们这时代的历史上面，而且俄国的巴斯底[1]席吕塞尔堡在我们同时代人的心中会留下大的影响，连我们也会受到它的光荣。无论是我或我的朋友们都没有起过这种念头。我们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不能够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入狱后的第五年，在一个未到预定期间就失败地终止了的同盟绝食以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了死亡，而且也渴望着死，却又不由自主地被人强迫着来生活，我的精神里充满了失望，我的神经也破碎了，在那时候我听见了一个同志说的一句话。他是我们中间天赋最高的人。他的话并不是对我说的，他在向别人谈起我，我无意间听见了。他说："薇拉不单是她的朋友们的，她还属于俄国。"

这一句话把我抬高到一个人不能够想象的、可怕

[1] Bastille，法国巴黎的一座要塞，后来改成监狱，囚禁政治犯或未经审讯的囚人。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被革命的民众攻下，拆毁。

的高度；这个高度把一个人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义务加在他或她的肩上。然而这一句无意间听来的话却放了一个理想在我的面前，这是一个达不到的理想，但是我应该去争取它。这句话给我的意志提出一个任务：努力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跟自己战斗，征服自己。要奋斗，要征服，要战胜自己！要战胜疾病、疯狂和死亡！

然而我应该怎样奋斗，怎样克服呢？要克服，就是要驱散那笼罩在我的精神上面的黑暗，要赶走那一切障碍着我的眼睛使它们见不到光明的东西。这就是说要忘记一切。我力求忘记一切。我驱走了一切的回忆；我把它们全埋在一个坟墓里面。十年来我埋葬了它们，十年来我努力忘记了一切。十年来在我的意识里我的母亲已经等于死了；我对于故乡、活动、自由等等的渴望也都死了。悲哀死了，爱也死了，雪落下来，用它的白色的大氅覆盖了过去的一切。我呢？我还活着。我还健在。

密纳科夫和麦秀根的死

在席吕塞尔堡的新监狱开设以后最初六个月里，发生了两次用排枪枪决囚人的事情。我在前一章里面提过密纳科夫和麦秀根被他们枪毙了。这两个人在革命运动中都有着长久的经历。

密纳科夫一八七九年在敖德萨被判罪。他被遣送到加拉矿山去服惩役，在那里他图谋逃走没有成功，便给人送回欧俄部分来，最初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面，后来席吕塞尔堡的新监狱刚一建成，他又被移到这里来。所谓席吕塞尔堡的监禁就是希望断绝的活埋，密纳科夫不愿意在这个新的巴斯底里面缓慢地死去，照他自己在一首诗里用的那个比喻"象一段木头掉在泥沼里慢慢腐烂一样"。他要求跟他亲属通信的权利，还有接见亲属的权利，又向监狱当局要求书籍和烟草，又实行绝食抗议，最后他打了狱医查尔刻维奇的耳光。

当时在狱里是这样传说的：在他实行绝食的时候，狱医强迫他进食，他便打了狱医的耳光。然而根据一

九一七年革命以后发现的档案里的记载，我们才知道原来密纳科夫胃口不好，他疑心医生在他的食物里面放了毒药，想害死他，才打了那个医生。他们把一个心理不正常的病人交给军法审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执行枪决，这就更令人愤慨了。密纳科夫不肯请求恩赦。

这是一八八四年九月里的事，这以后一个月我们"十四人案"中受审的同志们和我自己才被带进席吕塞尔堡里来。

这年十二月圣诞节那天，全监狱都被某一个监房里发生的事情惊吓住了。我们的晚餐刚刚送来，我们就听见金属盆子落在地板上的响声，扭打的声音，同时还有一个半被闷塞住的人声叫着，"不要打我！不要打！杀我吧，不要打我！"这是麦秀根的声音，他是俄国革命运动中一个受苦最长久的人物。他原是一个莫斯科的市民，在阿尔巴特区开设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局。他的排字工人都是些有知识的年轻人。全体的工人跟麦秀根一块儿就住在印刷局的那所房屋里面，过着一种友谊的共同生活。麦秀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跟那班准备参加"到民间去"的运动的人有联系。他们开始印起违禁书刊来。可是没有多少时候警察就查出了这件事情；他们实行搜查，把工人们全抓去了。然而麦秀根临时得着警告，他居然漏了网，后来便去了外国。他

在国外想出了去西伯利亚只手救出车尔尼雪夫斯基[①]的计划。他装扮成一个宪兵队的军官，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居住的维鲁斯克城，去找当地警察局长，拿了一份伪造的第三处[②]的命令给那位局长，要局长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交给他押送到圣彼得堡去。然而警察局长起了疑心，要麦秀根先到雅库次克去见总督，并且派了两名哥萨克兵护送他。麦秀根知道他的计划败露了，他决定设法弄掉他这两个同伴；到了雅库次克附近，他开枪打死了一个哥萨克兵，另一个却逃掉了。

但是麦秀根也没有走多远就给人抓住了，被送到圣彼得堡去，在"一九三人案"中受审判。这次受审的被告们决定了在他们中间推举出一个发言的人，根据他们共同草拟的一篇宣传革命的演讲稿当庭发表演说。麦秀根便是中选的人，而且他尽力认真地、热烈地完成了他这个任务。元老院院长彼德士几次要打断他的辛辣锋利的演说，都没有用。彼德士因此不得不宣告暂停审讯，于是审判停了，宪兵们向着麦秀根扑过去，要把他拉出去。别的被告们也连忙上前去保护他

---

① 尼·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俄国前进派青年的领袖，他还是一个有成就的经济学者。当时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英译本注

② 当时管理全俄国政治案件的最高机关。

们的同志。于是在一阵喧嚷叫号声中发生了一场混战，这样的事在审判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件来。

麦秀根在受审之前已经给监禁了三年，现在又被判处十年的苦役。从一八七八年到一八八〇年他被关在哈尔科夫省的中央监狱里面，受到极坏的待遇。在罗利士一麦里柯夫[1]专政的时期，判了苦役罪的囚人都被转移到加拉。两年以后在加拉有几个囚人合伙地逃走了，麦秀根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居然逃到了海参崴。在那里因为没有适当的联络关系，他又被人认出来，捉住，送回到圣彼得堡去。他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中的亚历克赛半月堡里面，好些民意社的社员正监禁在这里慢慢地消耗他们的生命。麦秀根好几次想鼓动同囚的人起来反抗这种杀人的管理方式，可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响应。半月堡内毫无动静。后来所有的囚人全被转移送到席吕塞尔堡去了。

麦秀根这样移来转去，在那些个人间地狱中差不多过了十年的岁月，现在，经过了种种苦难之后，他又落在最无希望的俄国的巴斯底狱里面。这是连他那样坚定刚毅的精神也忍受不了的。他决心去死——他要

---

① Loris-Melikov(1825—1888)，俄国的将军和政治家，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一年间担任内务大臣的职务，以镇压革命运动著名。

侮辱狱中督察长，他希望因此而受审讯。他在法庭上便可以揭发席吕塞尔堡的残酷的秘密，使全俄国人士都能看见，他以为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可以为他那些在狱的同志们争到一种较好一点的待遇。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实行了他的计划，但是他并未经过法庭公开审讯就在古卫城内一块空地上被枪决，三个月前我们的同志密纳科夫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受刑的。

麦秀根委托那个跟他的监房隔得最近的同志通知我们，要大家发动一个普遍的抗议来支持他。然而监狱里毫无动静，一点声息也没有；我们的监房都是不相连接的，他的庄严的遗嘱只传到了一间单独的监房。

在他处刑以后内务部次官阿尔测夫斯基曾到席吕塞尔堡来视察所有监房的情形。我们猜想他的视察跟麦秀根案一定有关系，在这视察以后，我们中间六个身体最坏的囚人便得到了两个人结伴散步的许可。这六个人都是从亚历克赛半月堡里移过来的，他们是莫洛左夫和布采维奇（布采维奇不久就因肺病死去了）；特利哥尼和格拉切夫斯基（格拉切夫斯基后来在狱中自焚而死）；弗洛林柯和伊沙也夫（伊沙也夫当时患着晚期的肺病）。两个人一块儿散步的许可算是把我们这个大石棺敲开了一个裂缝。直到这时为止，虽然墙上挂的狱规上面讲得有品行良好的囚人可以享受跟一个同伴

一块儿散步的优待这一类的话，可是从没有一个人享受过这种特权。然而在阿尔测夫斯基的视察以后，也就再没有人得到过它；一八八五年全年中，除了那六个人和填补死去的人留下的缺额之外，再也没有人享受过这种优待。

这是督察长的意思；显然我们大家的品行都“不好”。

我得到一个朋友

一八八六年正月初我听说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伏尔铿席太因（十四人案件中和我一起受审讯的一位女友）也在这席吕塞尔堡里面，便向督察长要求，问他们为什么不许我散步时在同囚者中间找一个同伴。督察长半晌不作声，过后便说："我们可以允许你有这个权利，只是你不可以……"他一面弯了食指在门柱上敲着，摹仿我们在监房里敲壁谈话的样子。我回答道我很少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并不曾继续谈下去，我依旧留在孤寂里，和从前一样，然而正月十四日他们带我出去散步，我们所称为"第一号笼子"的那个小地方的门一打开，我便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女人，她穿着一件没有挂面的皮短袄，头上包了块亚麻布帕子，她急忙走过来拥抱我，我好不容易地认了出来这就是我的同志，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她看见我穿着囚衣、样子有些改变，大概也会吃一惊。我们站着，互相拥抱，不知道该笑呢，还是

该哭。

在这时候以前，我只有在审讯中见过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我们从前并不曾遇见过，只是彼此常听见别人说起。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的诚实，她的质朴，她的好心立刻感动了我。我们处在这种情形下面，并不需要长时间，便结成了一种这么深切的友谊，只有在这环境里才能够做到的。我们和那些因沉船而飘流在无人岛上的人有些相象。我们除了彼此而外，在整个世界里什么都没有。不仅是人，便是自然、颜色、声音，全都消失了。只有一个阴暗的天空和一排神秘的、用墙壁隔开的囚房，那些不能够给看见的囚人便在这些监房里面一天天地憔悴下去；只有一种可怕的沉寂和那暴行，疯狂，死亡的空气。在这种环境里，两颗心的交流必然带来欢乐，而且以后会永久珍藏着这一个最令人感动的回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坐过监牢的人便知道一个人在禁锢的时候得到一个同伴的同情的柔爱，在他的生活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帕立瓦诺夫的叙述他在亚历克赛半月堡的生活的狱中记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描写，说科洛德克维奇怎样撑着拐杖一颠一跛地走到墙边用几句温柔的话安慰他。没有灵魂的石块隔开了这两个囚人，他们被败血病和寂寞折磨到快死了，透过这没有灵魂的石块的简

短的谈话便是他们的唯一的快乐和支持。帕立瓦诺夫又说过有好几次极度的忧郁向他袭来，使他起了自杀的念头，还亏得科洛德克维奇的友爱的话语把他救了。友爱的同情在监牢里果然造就了不少真正的奇迹；敲壁谈话的方法摧毁了那个分隔人们的石头障碍，倘使没有这些墙壁上的轻敲，囚人就绝不能够保持他的生命或精神了。难怪争取敲壁权利的斗争是囚人对狱吏的第一个斗争；这简直就是一个生存斗争，每个关在监房里的人都把持住这个方法不肯放松，就象一个快淹死的人紧紧抓住一根干草茎一样。然而倘使那些单独禁锢的囚人忽然被允许和他们的同监者见面，不再用暗示的敲壁，而用活的语言来谈话，那时候一声温柔的声调，一瞥亲切的眼光，那里面所包含的好意和仁爱，还有那友爱的握手，这一切都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那班不曾失过自由的人所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把什么给了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然而她却是我的慰藉，我的快乐，我的幸福。我的神经和身体组织已经彻底垮了。在体质上我很衰弱①，在精神上我也完全崩溃了。我的一般的心情是反常的；现在突然间我得到了一个朋友，她不象我这样被监牢

① 我正患着严重的贫血症和淋巴结核。——原注

环境所摧毁，打垮；这个朋友是温柔、善良、仁慈的化身。她的可爱的精神的全部宝藏，她把它们都慷慨地给了我了。我们会面的时候不管我的心境是多么忧郁，她总会想法驱散它，她总会想法安慰我。只要看见她的微笑，只要看见她的可爱的面孔，我的忧愁就会给赶走了，我的心也欢乐起来了。我每次和她散步后，回去时我就安心了，好象另外变了一个人；监房也不是那么阴郁的了，生活也不是那么难堪的了。我立刻梦想着我们下次的会面。我们每隔一天会面一次；显然是狱规认为应该使我们过一天完全孤寂的日子，减少我们会面的快乐。然而这样做大概只有使我们对彼此相见的渴望越发锐敏，只有加重我们的"假日的快乐"，这种心境我们日后回忆起来也是极其愉快的。

遇着牢里发生不幸事情的时候，譬如同伴们的惨死（他们的呻吟和临死时苦痛的叫号，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在这狱墙里面任何声音都有很清晰的回声），我们两人的脸色都变成了苍白，都很激动，不说一句话。我们极力不要看见彼此的脸，因此就互相抱着吻个不停，然后默默地在那小路上走来走去，或者坐在地上（这里没有凳子），背靠着垣墙，极力避开那个从小守望塔顶上监视着我们行动的宪兵的视线，离得愈远愈好。在这种日子里，单是彼此身体上的接近，或者挨

着一个朋友的肩头，都是一个绝大的安慰，可以减轻生活的重压。一八八六年里面有一个月就接连地死了三个囚人：聂马罗夫斯基、伊沙也夫和伊格纳季·伊凡诺夫，都死于肺病，伊凡诺夫还发了疯。

伊沙也夫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带他出去在露天散步，他的高亢的、嘎声的咳嗽好象是从一个空桶里发出来的一般，我们听见这声音，我们的心就象被撕裂似的痛楚了。有时候他们带我们去散步，就带进伊沙也夫刚才去过的那地方。在雪地上左边右边都留着他刚刚咳出来的发亮的红血。这些血迹不曾被人弄掉，也不曾被雪盖着，它们绞痛了我们的心，它们便是一个被摧残的生命的表征，这是一个同志的生命，科学无能为力了，人力也没有用。……这里又没有一块地方可以让我们掉开眼睛，不看见那些血迹。这个"笼子"里面小小的面积都给雪盖满了，只留着一条窄路给人散步，我们必须沿着这小路走。这血迹本来是只用几铲子的雪就可以掩盖了的，他们却冷酷地留下它来折磨、教训那些怕看见它的囚人，这种残忍的手段是太可恨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连铲子也得不到。

伊沙也夫的最后的痛苦是很可怕的。在我们所必须忍受的痛苦中，恐怕这要算是最大的了。只要一点吗啡或鸦片一类的东西就可以减轻他的最后挣扎的痛

楚，同时也免得我们大家受苦，然而没有这样做，牢里面是死一般的沉寂；我们都坐着不动，带着紧张的心情，屏着呼吸来倾听这沉寂…… 没有一点声音……在这紧张的情调中间突然起了一声呻吟，更象是一声哀哭。眼睁睁旁观着一个人交出他的生命，这是很难堪的，而更难堪更可怕的乃是做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关在活葬墓里的旁观者。只有在监狱和疯人院里面（疯人院在许多地方都和监狱相似）才会有这种惨痛的可怕的事情发生。……

在这年春天他们给了我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各两畦小地，都是在菜园里面，每块约有二英尺半长九英尺宽。狱中当局隔出了六个小园子，地方毗连着要塞的高墙，而且离监狱只十五英尺到二十英尺的光景。他们花了大价钱从别处买来许多土，用船载了进来，一堆一堆地撒在大菜园的地面上。

我们的地很小，是长方形的，并且位置很不好，差不多完全得不着阳光。一边是高的石墙，其余的三面各有一块九英尺高的板壁；总有东西把阳光遮住！然而便是这块四面高墙围着的井一般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已经算是天堂了。这里有着土，真正的土，田野的土，乡村的土，黑的、凉的、松散的。在这以前，我们就只看见我们那个"笼子"里面的不毛的地，是死的，石头般的

地，一片草也钻不出来。自然这是故意这样安排的，为了便于监视我们，不让我们彼此私下传递信件，把纸条藏在草堆里。一八八六年夏他们从河岸运了沙子进来，倾倒在这些小天井里面，每一处再放了一把木铲，说是预备来"给犯人练习运动"，这是照督察长的说法。他们准备让囚人用木铲把沙子从一个地方铲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增加他的气力。后来果然那些得不到菜园来种（因为他们只许很少的人有菜园）的人便只得靠铲沙子来消磨时间；然而这是非常沉闷的，我们就给这种无谓的游戏起了个名称，叫它做一八四八年法国国民工场的工作。

分配园子的时候，督察长和看守长把囚人领到那地方去给他指定一两畦，接着看守长依旧默默地发给囚人一包种子（小萝卜、胡萝卜、芜菁、豌豆、卷心菜、罂粟等等），他自己先从里面抓了一把教囚人怎样播种，但是依旧不说一句话。他把身子俯到地上，用手指挖了一个小洞，丢一粒种子进去，过后他就默默地跟着督察长退去了——督察长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这里绝对禁止宪兵和囚人谈话，而且连发布平常的必需的命令，也是往往不许可的。在绝对必要的时候看守长会用手势来表示，因此我们后来就开玩笑地给他起个绰号叫"哑剧班戏子"。

种子开始发芽的时候，它们的绿色嫩苗在地上到处伸出头来，给了我们说不出的喜悦。到了夏天，宪兵们先前沿着墙边种下的花一齐开放，那时我们竟然狂喜得象小孩一般。我们渴望着绿草，渴望着田野和草地，一丛绿草居然在我们的枯萎的心中唤起了全然意外的感情波涛。每一小片草叶都是我们的宝贝。

我记起来有一次我们走进园子里面，这地方在前一天另外一个同志去过，我发现墙边生气勃勃地长着的一株酵母花的嫩芽给谁在上面掷了一堆土掩盖了。倘使一个母亲看见她的孩子窒息在土堆下面，她也绝不会比我更气愤地跑去把土堆翻开。这是我被捕以来的第一次生气，我跟谁生气呢？跟一个同志。我本来以为我们处在这种环境里，不说跟一个同志生气，便是想起一个同志的坏处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对于植物的态度；但是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却特别喜爱昆虫和偶尔进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的少数动物。她把麻雀养得很驯，它们时常一群一群地站在她的膝上啄食她的囚衣上面的面包屑。常常在我们手挽手地散步的时候，我会忽然发觉她走出了路线，拉着我向旁边走几步。我好几次想不出这道理，可是她把她的理由一旦向我说明，我就禁不住发笑，随后我又深深地感动了，原来这个恐怖主义者看

见了一只爬行的蝶蛾类幼虫或甲虫，害怕她会把它踏坏！我却从不曾想到去注意有没有小生物在我们的路上经过。后来我们有了覆盆子树，小虫开始来吃树叶，我任是怎样劝她把这害虫捉下来放在水盆里淹死，她总不肯。她宁愿让覆盆子全株死掉，不肯杀死一个生物。另有一次她对待在她监房里发现的一只臭虫的态度（这臭虫大概是一个宪兵带进去的）更使人好笑。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用一片纸头把这臭虫小心地包好，她出去散步时便带上它，然后更小心地打开纸包，放出臭虫，让它逃生去！

这种对待动物的态度很使我感到兴味。我曾问过她是否她从来就是这样地对待动物。她回答说对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她都是永远这样地爱惜。在她，这种态度的确不是暂时的牢里的"情痴"，而是一种真挚的感情，而且和她的仁爱的天性完全相合。在待人一方面我很难找到一个比她更善良更温柔的人；而且在起初几年她的心灵还不曾被那对狱吏的琐碎的斗争摧残的时候，这种仁爱与好心曾放射着一种惊人的光辉。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知道生活，知道人民，她并不曾把他们理想化。他们本来是怎样，她便把他们当作怎样，她知道他们有光辉面，也有阴暗面。她爱光辉面就把阴暗面宽恕了。她有一种难得的能力，可以找出

而且从来不曾忽略过一个人的好的方面；她确信在每个人身上都潜伏有善的本原。她坚决地相信善和爱能够克服一切的恶；因此最有效验的纠正方法并不是严厉的斥责和压制，却是仁爱的话语和同情的、友谊的批评。她待人接物的典型特征就是无比的宽容。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宽容"。

我自己对于生活的见解和她这种温和的观点完全不同，然而在我被禁锢的起初几年中间，我和社会斗争，我和我平时所接触的那种紧张的气氛都离开得很远，我的精神也就渐渐地变软和了；而且我和这样一个崇高的爱的表现（不仅是对人类，对个人也是如此）接触以后，我的心理也起了一个奇异的变化。我感到一种道德上的，同时又是美学上的喜悦：这是爱和美，这种美和那种冲破一切障碍而前进的精力与坚决不屈的意志完全不同，关于那样的范例我从前已经见过很多了。……

观察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静听她的谈话，了解她的个性，谁都会不觉地自问道，她的仁慈与柔爱怎么会和革命运动的暴力与流血调和。固然发出光与热，使人幸福，对于这种仁爱的天性似乎是一个天然的事业。然而事实却又是两样：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畸形与不合理又逼迫她选择了另一条路。劳工阶级遭

受的残酷的掠夺使她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俄国自由的、公开的活动之不可能与夫对于个人之野蛮的压迫，又把她造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只有在革命的抗争里面她的仁爱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能够带着清白的良心来表示它的利他的热望，因此她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为后人扫清生活的大道。

不管我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在一起时是如何地幸福，而且结伴散步又是我们的唯一娱乐和慰藉，然而在这年（一八八六）秋天我们便不得不把这个特权完全放弃了。事情是这样的：按照狱规，这种散步和种菜园的特权乃是对于“良好品行”的报酬。自然谁也不高兴因自己的“行为”受罚；而且评量我们的行为的乃是监狱的督察长，或者确切些说他是随着自己高兴而发给特权的，因此便是非常地不公平。我们有好些同伴，他们的日常行为并不违犯例规，可是依旧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固然他们有时候敲壁和邻人通话，但这事情我们大家都做过。

在牢里人们必须设法互相通消息。只有那些精神错乱的人才不会敲壁通话。那么倘使一个犯狱规的人得到了和朋友结伴在园里散步的特权，所有的人也都应该享有这种特权。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有几个同志象科比连斯基和兹拉托波尔斯基竟不曾见过一

个朋友的面孔就死去了。别的人象潘克拉托夫、马尔地诺夫、拉哥夫斯基，等这种特权已经等了许多年。

有时使用某种决不能称之为“品行良好”的方法也能得到跟同志们见面的机会，帕坡夫的事就是一例。有一次忽然“救命”的叫声把整个监狱都惊动了。帕坡夫的房门上的滑窗打开了，露出督察长的脸，他粗声问道：“有什么事？”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帕坡夫答道。“让我跟一个同志见一次面吧。”

督察长注意地看了他一阵，然后说：“好，我去报告司令官。”

过一会儿司令官来了。他问道：“犯人要做什么？”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帕坡夫答道。“让我跟随便哪一个同志去散回步吧。”

司令官答道：“犯人喊着‘救命’，却要求特权。犯人应该想想，要是我们现在立刻满足他的要求，那么对别的犯人算是开了一个怎样的先例呢。然而要是犯人安安静静地等待一些时候，我们会满足他的要求的。不过要是他再喊一次的话，我们就要送他到别的地方去。”（他指的是老监的惩戒室。）

帕坡夫愿意静候着。过了几天他便跟雪巴林一块儿散步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象帕坡夫那样聪明，大多数人通常都不作声。特权的分配事实上是督察长捏在手里的一个武器。谁要是不用"您"字回答督察长的"你"字的称呼，他就会失掉跟一个同志见面的希望，哪怕是他患着重病活不多久了。兹拉托波尔斯基从来没有跟督察长冲突过，只是偶尔敲壁谈话。他吐血——他的体力一天一天地在消失，然而督察长残忍地看着他在孤寂中死去。科比连斯基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不过用了"你"字回答督察长的"你"字的称呼。督察长对潘克拉托夫也报了仇。

每当散步回来，想起自己的邻人连这一点和一个同志见面的快乐也得不到，这情景是很令人难堪的。自己和一个朋友在天井里面闲步，而就在旁边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同志没精打采地踱着，他也很想看见一个朋友的面孔，他也很需要同伴，需要同情，需要朋友，这情景也很令人难堪。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设法改变这种情形。在我看来狱规就和石墙、铁门、铁格子一样地坚硬顽固。我们不能够打破那凌践我们的狱规，犹如不能够打破墙壁和门闩。

然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另有一种见解。她想我们应该用各种方法来反抗狱规。督察长分配特权既是如此专断，如此不公，我们便不应该承认这种特

权。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提议采用一种消极的抗议，她的办法是由我们这般正享有着特权的人来实行自动的放弃。自然我们的放弃必须有一个理由。那么我们就说所有囚人的行为都多少相似，因此我们的友谊和同情使我们不能够安心享受其余的人所得不到的特权。我长久地不能够决心作这样的一个牺牲。自然我每一想起我在享受一种恩惠，我的许多同志却正因为没有它而悲痛，这时候我也感到很大的痛苦。但是我又觉得我是生活"在深渊里面"，我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的会面乃是我的唯一的快乐。但愿我能够相信这牺牲会有结果，我们的自动的放弃会把督察长用来压迫我们的武器夺取过来！然而我却不相信他们会在这样一个要点上面表示让步；而且这次恐怕会弄成自讨苦吃，永久地丧失掉特权，因为我们一经发动就不能够退缩了。加以现在享有这种和同志结伴散步的特权的囚人里面有几个的确是十分病弱，而且绝对需要朋友的帮助。

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看见我很害怕分离，她就好些时候不提起这件事情。但是后来这个恼人的问题又时时在我们的谈话中发生了。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固执地把这问题的新的方面指给我看。她说我们应该不仅看重这次反抗的直接效果。这次反抗除

了它的直接目的外（直接目的便是，使种菜园和结伴散步成为囚人共有的权利，是正常的，不再作为一种特权），它本身还有一种意义。在一般的沉默与屈服中间，监狱当局也会看见我们并不完全被动地忍受别人给我们安排好的一切，而且我们也不是如他们所希望的只顾自己，我们还要同情我们的同伴，还要起来发言保护他们。我们里面任何一个人在狱吏面前用了"我们"这个代名词，就会得着这样一个回答："只说你自己的事情！"这一次犯人就应该为了同志们而拒绝一件狱吏所认为是酬报的东西。狱吏们最高兴犯人对于他们发出的命令一概谦卑地承认和被动地服从。可是现在，这些不仅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权也全给夺去的人，这些人格被人不择手段地摧残的人却把自己置于狱吏和刽子手之上，哪怕就只是暂时也好：他们竟批判狱方的各种命令，指出必须把压制他们这些批评者的狱规加以改革。

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渐渐说服了我，使我相信她的论点是正当的。我们便联合了几个同志拒绝享受我们的特权，说非等到这种特权普及全监狱时，我们不愿再享受它。起初有许多人赞助我们；然而后来这运动就渐渐支持不下去了（牢里的情形往往是如此），并没有发生一个多少普遍的抗争，只有鲁特米拉·

亚历山德洛夫娜、尤利·波格丹诺维奇、帕坡夫、雪巴林和我，我们五个人是坚持到底的。整整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不曾种过菜园，也不曾两人一起散步过。

惩戒室

在最初几年里面，我就跟大多数新进监牢处在生疏而含敌意的环境中的因人一样精神十分颓丧，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我甘心忍受着那种手脚都被缚住的因人的命运。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不只是因为我明白在这里任何反抗，任何斗争都没有用处，而且是不可能的，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凡是象我这样曾经受到基督精神的影响的人（基督为了他的理想忍受了侮辱、痛苦、和死亡），凡是在幼年和青年时期把基督当作理想人物，把基督的一生当作自我牺牲的仁爱的榜样的人，一定会了解一个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被丢进活葬墓去的新判罪的革命者的心境。审讯完结之后被判罪的犯人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心情。他平静而坦然，他不再拚命抓住他刚刚分别了的一切，他坚定地向前看，正视着未来，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要来的事是无法逃避的，并且也是无法改变的。

基督教的思想（从我们还是小小婴孩的时候起，基

督教的思想就开始有意或无意地灌输给我们大家了），再加上一切为理想而牺牲生命的殉道者的生平事迹，在这种囚人的心上自然会产生影响，会给他造成一种安慰的感觉：他的考验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作为一个为人民，为社会，为后代（而不是为着他这个渺小短暂的自己）争取安乐与福利的战士，他的爱是否坚强，他的精神是否刚毅，现在正在受着检验。我们有着这样一种心境，自然不会想到跟那群禁卒和刽子手去作什么言语上或行动上的斗争。难道耶稣受侮辱挨人打的时候抵抗过吗？要是想到耶稣会抵抗，就会起一种亵渎了他那纯洁的精神和温良的品格之感觉。

虽然是这样，虽然我当时有着这种"不抵抗"的心境，可是在我和我的朋友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分开六个月后，我跟狱方发生了冲突，那冲突很有产生悲剧的结果的可能。

在降灵节[①]前几天的某一个晚上，九点钟光景，督察长正在循例视察狱中各囚房，在每个门上的洞眼里望望，帕坡夫忽然从他的监房里高声敲着墙壁唤我，他的监房在我监房的下面，只隔了几道门。我很倦。监狱里的白天又长，又无聊，又空虚。我只想在我的吊床

---

① "复活节"以后的第七个星期日。

上躺下来睡一觉，可是我也不愿意拒绝一个同志的呼唤，所以我回答了他。然而等到帕坡夫再敲起壁来时，他的第一句话还没有敲完，就在半途中断了。我听见门砰然一响，接着是一些人的脚步朝出口的方向跑去，然后一切又回到寂静中了。我立刻明白了：督察长把帕坡夫带到惩戒室去了。

惩戒室是督察长常常带着威吓的口气讲起的那个地方，他说："我要把你关到一个没有一个活人会听见你声音的地方去。"没有一个活人——这想起来太可怕了。

在这儿我们全体囚人都是在要塞的同一个屋檐下面；我们四周都是朋友们，各人在各人的石头囚房里，这样大家都算有了保护。要是你不得不叫喊，你的叫声也会给别人听见。要是你不得不呻唤，他们也会听到你的呻唤声。可是"关到那儿去"呢？那儿"没有一个活人会听见你的声音"。

我知道不太多时候以前，帕坡夫曾经给"关到那儿去"过，又挨了很厉害的打。我想到他现在又会给人关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他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一点抵抗力，又会让一大群宪兵扑到他的身上。我这样一想，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便下了决心我要叫他们把我也关到那儿去；至少我得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独的，并且——

要是他受到虐待拷打的话，他还有一个见证。

我敲打门，要人去请督察长来。他来了，打开门上的小窗，带怒地问道："你要什么？"

"两个人谈话，单惩罚一个人，那是不公平的，"我说。"把我也带到惩戒室去吧。"

"很好，"督察长马上答道，他开了锁把门打开了。

于是我第一次看见在夜晚给灯照亮着的我们这监狱的内部了：沿着我们这坟墓的墙点了好些小灯；四十扇沉重的黑门立在那儿，就跟竖立起来的棺材一样，在每扇门后面，一个同志，一个囚徒单独在那儿受苦：憔悴，患病，等着自己的死期。我刚刚经过我的"叹息桥"走近石阶的时候，忽然听见我的邻人叫起来："他们把薇拉带到惩戒室去了！"接着几十只手疯狂地打着门，几十个声音齐叫着："把我们也带去！"

在这使我十分激动的昏暗的景物中间，那些看不见的人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声音，那许多我好些年来没有听见了的同志们的声音给我唤起了一种痛苦而又强烈的喜悦！我们给人分开了，但我们还是联在一块儿的，我们的精神还是一个整体。

然而督察长气得不得了。我们由三四个宪兵护送着走进天井的时候，他举起他那只紧紧捏着一串监牢钥匙的拳头。他的脸气得歪扭起来，他的胡子颤抖着，

他向我叱骂："在那儿，你敢再弄出一个响声，我就要给你颜色看！"

我害怕这个人。我听见人说过他怎样命令宪兵对囚人用残酷的体刑，我想到："要是他们打我，我会死的。"可是我却平静地答道："我不是到那儿去敲壁传消息的。"我的声音居然是那样的平静，听起来好象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似的。

卫城的木门打呵欠似地开了，我的恐惧立刻被喜悦赶走了。五年来我没有看见过夜晚的天空和星群。现在我的头上就是天空，天上的星星对我射下光来。古卫城的高墙闪着一片白光，而五月的夜的银辉满注在墙内幽深的井似的方形院子里。整个空地上长满了草。草生得又密，又凉，又新鲜，轻轻地刷着人的脚，它使人联想到一片自由的田野上带露的碧草。一所低矮的白色建筑沿着墙伸展出去，从一面墙伸到了另一面墙，一棵孤单的树高高的黑黑的立在角落里。这个漂亮的生物一百年来就孤独地生长在那儿，始终没有一个同伴，它在孤寂中自由自在地长成了那顶华丽的王冠。这所白色的建筑就是所谓"老监"，里面一共可以关押十个囚人。钥匙发出擦响的声音；好象锁起了锈似的，他们化了相当力气才打开了监狱的外门，跨过这门便进到一间暗黑的小小的前堂。一股霉味迎面扑过来，这是

一间又冷又潮湿，没人居住的房屋的发霉气味。在我面前伸展着一条宽阔走廊的毫无隐蔽的石头，走廊的远远的另一端闪着一盏小灯的光亮。在这寒冷的微光里，宪兵们的模糊的形影、囚室门的不清晰的轮廓、黑暗的角落——这一切看起来都象带着不吉的预兆似的，因此我不由得要想到这地方真正是一个拷打人的暗牢了，督察长说过他有个不会让一个活人听见我们的声音的地方，他说的倒是真话。过了片刻他们打开了一道左边的门，放了一盏燃着的小灯在里面；门又砰的一声给关上了，我一个人留在房里。

我被关在一个又小又冷的监房里，这屋子从来就没有给人打扫过。墙壁很脏，好些地方都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剥落了。地是沥青的；有一张固定在地上的小木桌，还带着一个座位；另外还有一张铁的长凳，上面没有放席子，也没有放任何被褥一类的东西。

周围是一片静寂。

我白白等候着宪兵们回来带给我一床席子和一幅可以给我盖在身上的东西；我身上只穿了一件薄棉布衬衫，一条薄棉布裙子和一件牢里穿的外衫，我开始冷得发抖。我想，人怎么能够在这种类似吊床的铁格子上面睡觉呢？可是始终没有人送被褥来；我不得不在这张“拉赫美托夫床[1]”上躺下。然而在这张长凳上面

不仅是不能够睡觉，连在那些铁条上多躺一会儿也不行。挨到那些铁条，从地上、从石头墙壁上传来的冷气立刻侵进我的身体里来了。

第二天他们连这个东西也取消了。他们把这吊床弄起来，用挂锁锁在壁上。夜里我只好躺在沥青地上尘埃中间。我不能够把我的头放在地上，地太冷，还不用说上面那些龌龊东西。为了要救我的头，我只好牺牲我的脚。我脱下我那双粗靴子，用它们来当枕头。我的食物是又陈又硬的黑面包。我劈开面包，里面那些小孔里全是青绿色的霉污。我只能吃一点面包皮。他们不给我盐，更不用提毛巾和肥皂了。

我到惩戒室去的时候，完全没有存着敲壁传话的心思；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减轻帕坡夫的难堪的孤寂。然而帕坡夫却不想沉默：在第二天早晨他就开始敲壁唤我了，我的身体很弱，不能够回答他。他又敲起来，可是他刚刚敲着墙壁，宪兵们就抢先抓起木头之类的东西，用力打我们的门，响起了一阵人想象不到的闹声。要是一个人没有在监牢里这种坟墓般的静寂中生活过许多年，要是他的耳朵没有变成不习惯听声音的话，他绝

---

① 拉赫美托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一个人物，他主张并且自己过着一种极刻苦的生活方式。

对想象不到我这听惯了长期的静寂而变得柔弱的耳朵这时候所感受到的痛苦。

我无法制止他们的狂敲乱打，我生起气来，我变成歇斯底里了，我也用拳头去打宪兵们正在外面摇着的门。我没有力量再忍受下去了。然而帕坡夫仍旧时时敲壁想传话给我，这更惹起宪兵们发脾气，叫这种折磨人的打门的战斗一直继续着。最后宪兵们的忍耐力竭尽了。于是这种地狱的闹声突然中断了。督察长的沉重的脚步在走廊上跑着，他们在作什么奇怪的准备，他们在低声谈话，象在商量作什么不利于我们的事——只有这些声音打破了这可怕的静寂。

“现在他去开帕坡夫的门了，他们开始打他了。难道我要为这种野蛮刑罚当一个被动的见证吗？不，我忍受不了！”我这样想道。

我嚷着要见督察长。

他开了监房门上的小窗，我立刻用激动的粗涩的声音对他说：“你们想打帕坡夫。不要打他！你们已经打过他一次了——将来连你们也逃不掉惩罚的。”

“我们并没有打过他，”督察长说，我没有料想到他现在居然在替自己辩解了，“我们把他绑起来，他在挣扎，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你们打了他！”我愤激地说，我觉得自己的脚

跟立得很稳。"打了。有人作证。"我接着又说："他不会再敲壁了。我要告诉他，他会停止的。"

"好的！"督察长顺口答应道。

我便敲壁唤帕坡夫，告诉他，象这样一种斗争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我求他不要再敲壁传话。……于是一切又回复到静寂里去。

第二天他们给我送来茶和草荐，可是帕坡夫却没有，我把茶泼在地上督察长的脚边，我拒绝使用草荐。然后我劈开一块面包，把里面的脏东西指给他看，对他说："你只给我们吃面包，喝白水；你且看看你给我们吃的是什么面包。"

督察长红了脸。"给她另外拿点面包来，"他吩咐宪兵道。五分钟内他们就给我拿来一块又软又新鲜的面包。

这以后一连三夜，我都是睡在沥青地上肮脏东西堆中间，寒气包围着我，我只有一双牢里的靴子做枕头。我躺在那儿思索着，反复思索着……我下一步应该怎样做法。显然，这以后跟监狱当局冲突的机会是很多的。那么究竟在什么场合，究竟在什么情形之下这种反抗是可能的而且于我有利的呢？我应当用什么方法反抗？我怎样来表示我的抗议呢？我应该时时刻刻保护我的同志吗？我的第一个冲动说："时时刻刻。"

可是我的同志就永远是对的吗？我已经经过一个试验了，这个试验是很严格的。我把过去几天里面发生的每一桩事情都仔仔细细地思索了一番；我把我自己的行为和帕坡夫的行为都省察过了，我还问我自己：我愿意，并且有力量使用帕坡夫的方法来斗争吗？帕坡夫有着铁一样坚强的体格、绝大的自制力和无比的反抗能力；这都是在加拉矿坑里和亚历克赛半月堡中锻炼出来的，他是一个冷静的、顽强的、钢铁般的战士。要是看守们侮辱他，虐待他，他也会用同样方法对付他们。看守们的粗暴和宪兵们的吵闹的殴打，他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绑起他，打他打过好几次，打得很厉害；他都受下去了，他并不报复；他还能够活下去。可是我呢，我却办不到。我们两个人的路明明是分歧的。我没有充分的体力，也没有充分的精神力来从事象他在进行的那种战斗；而且从道德的观点上来说，我也不愿意发动一个我恐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的抗议。现在我应当想要我未来的行动方针，拣定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并且将内外的条件全部衡量一下，一劳永逸地决定下来我究竟应当怎样行动，免得日后摇摆不定。对那些细小的日常争吵，那些结果总离不了屈辱的冲突，我不喜欢。这种做法不合乎我的性格，我决定不用这种方法战斗。我已经明白了我的力量的大小，我并且确确实实地知道什么

是我所能够做的，而且什么是我所愿意做的。我决定下来：凡是我所能够忍受的，我都忍受下去；然而要是遇到什么值得我用生命去保卫的道理的话，我一定要出来保卫它，一直抗争到死。

在我给关在惩戒室里的第五天，督察长来对我说：“第五号犯人已经得到了一床草荐和一些别的东西了。”

我精疲力尽，身体非常衰弱，好象害了一场重病似的，现在我终于能够躺在我的床上了，这正是要紧的关头；我的耳朵里不停地响着叫吼声和铃子声，我觉得晕眩，而且感觉迟钝，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黄昏时分我半昏半睡地躺在那儿，忽然听到了歌声。唱歌的是一个可爱的、音质不寻常的男中音，这使我泛泛地记起了什么人或什么事情，但我又说不出来。这是一首朴素的民歌，它的曲调是很简单很单调的。谁在唱歌？谁会在这个地方唱歌呢？我惊奇地想着。难道有什么工人给放进来做点修补的工作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歌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好象是从外面来的。那么有人在修补这个建筑的屋顶吧？

谁在唱歌，这对我是一个谜。我许久都得不到解答，甚至我给人带出惩戒室以后，我还在想着它。后来我毕竟想出了那个歌者的姓名：格拉切夫斯基，可

是那时他已经自焚身死了。以后我果然听见人说起，我给他们关在老监里的时候，他也在那儿。

又过了两天。督察长打开门，对我说："散步去。"这是说，我的惩戒期满了。

我退缩到角落里去，一面说："要是你只放我一个人，我就不去。"过后我又害怕地加了一句："你不会动武拖我出去吧？"

督察长把我这个躲在角落里的病弱的身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耸了耸肩头，带着轻蔑的口气说："还用得着拖吗！"随后他又添上一句："第五号已经出来了。"

我便跟着他走了出来。

回到我原来的监房以后，我用水打湿那块写字用的石板，对着它那个小小的镜子似的表面看我自己。我看到的这张脸，在七天中间老了十年：满脸都是细小的皱纹，多得数不尽。这些皱纹不要许多时间就全消失了，可是这些日子的印象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灵上。

纸

在我被捕后的第六年，也是在我给关在席吕塞尔堡中的第四年(我已经度过了那三年最艰苦的岁月了,)他们第一次拿纸给我们。这是一件大事。然而在最初一阵冲动的高兴之后，我们开始感到疑惑了：我们怎样来使用这纸呢?我们应当写些什么呢?督察长拿出一册编好页码的抄本给我时，他还说:“你把这个抄本写满了,得交进去,他们会换本新的给你。”这就是说我们写好的东西得先送给监狱里的官员们看，然后再转到警察总署去。这么一来，我们刚才那一点过节似的兴奋又变成平日的那种淡漠无聊了。

在我们这个贫乏的图书室里，并没有纯文艺的作品,不论是散文,或是诗，这里都找不到。我记得我写在我的抄本上的第一样东西是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的一节。随后我又写下别的一些我能背诵出的诗。然而不久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材料的宝库。乐巴丁经过几个朋友的手（用敲壁的方

法）辗转传给我这一首诗：

“我诅咒那一天，它照亮了我走到这高墙里来的路
让我在这儿永别了自由；
我诅咒那一天，它把我带到这地上来
不让我母亲杀死她这新生的婴孩。”

以后还有五六句都是以这样的诅咒的叠句开始的。

我自己的心境以及我的多数同志们的心境（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跟这种可怕的悲观论调相距很远，所以这首诗使我非常惊奇。在我进监狱以前我从没有写过诗，可是现在我忽然想起写一首诗来回答他，我也拜托那几个朋友将我的答诗辗转敲给他：

“我们有幸为自由牺牲自己；
我们受苦，我们死亡，但我们决不逃避。
我们忍受，我们不发怨言，但我们谦逊地和平地走近
那个就在近旁等待我们的仁善的黑暗……那死。……

我们的强壮的年轻同胞们，他们会听见
我们的沉默的呼声，呼唤他们起来战斗，
为着自由，为着正义。

所有我们的同志全称许我的答诗，乐巴丁还送来回话，说这首诗把他感动到快流眼泪了。

这样的成功给我唤起了一种欲望，我要用诗句来表达那些我不得不时常压抑住的情绪。我便写了《给我的母亲》、《给我的妹妹》、《我的老家》等诗。我的同志们学着我的榜样，大家都写起诗来。四面八方都在吟诗。马上就出现了十六个诗人，各人依照自己爱好的调子写他的诗；席吕塞尔堡变成了"诗府"。每个诗人都是那么忙碌地敲出他的诗，住在下一层监房里面的莫洛左夫不知道往哪里躲藏：据他说，这种响法好象整个监牢都给鬼占据了似的。我们中间最严肃的人也有了灵感来了。连帕坡夫和弗洛林柯，我们的那两位实在论者也各写了一首诗。只有鲁加雪维奇、雅诺维奇、阿申布伦纳和另外两三个人没有写。我们写了各种体的诗：离和诗和十四行诗，短歌和叙事诗。潘克拉托夫在他的诗篇里描写了罗斯托夫[1]下层社会的生活；拿哥夫斯基在他的诗句中颂扬革命的旗帜和别

[1] 罗斯托夫是俄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在顿河岸上。

的崇高的题材。有的人写慷慨激昂的诗篇，有的人写哀伤的挽歌，各人依照各人的兴趣和才能写诗。回忆成了大多数的题目，这种调子倒跟我们在最初几年牢狱生活中所常有的抒情的心境很和谐。我现在不谈这些诗的好坏问题；但有一件事倒是确定了的：写诗减轻了我们的生活的痛苦，因为它给我们的幽闭多年的情绪找到了一条出路。在另一方面我们互相交换着诵读友人的诗句，这样也给我们的孤寂的生活中带来一点变化和愉快，有时甚至于带给我们极大的快乐。在一个人的生日或命名日，他或她有时候会收到令人感动的礼物，就象乐巴丁在九月十七日送给我的那样：

“虽然活埋在这个凶残可怕的坟墓里，
我们的爱仍旧围绕在你四周，挨近而亲密。
虽然你被夺去了光明，失掉了住居，
分别了你的亲人，然而朋友们在你的近旁。
你并不曾丧失一切，
友情的温语永为你的伴侣。”

这种用纸的特权不但使我们能够倾吐我们的感情，减轻我们的愁闷，它在另一方面（完全不同的方面）还替我们做了一件事。

在最初的三年里面每个星期六我们每人都要受到一次全身的搜查。我们从来没有藏过什么东西，实在也没有可以藏起来的东西，然而每到星期六那天我们还是要去受这种侮辱。男的囚人就由宪兵们粗暴地在身上搜查，我却被带进一间空屋，那里面有一个专为搜查我来的女人在等着我。她把我身上穿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从略微开着的门缝里递出去，交给走廊上的宪兵。起初这个职务是由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担任的，这个妇人倒有点象妓院里的老鸨，我在描写我们席吕塞尔堡的生活的第一章中已经提说过了。她总是拿她的手从我的光裸的肩头摸下来，把我全身都摸遍了，连我的耳朵和手指都摸到了。有一次另外换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外表上看，她比较细一点。她穿一件时样的黑绒衣服，前胸挂了一条金链。督察长把我带进屋子里交给她的时候，他摸摸她的耳朵，又摸摸她的嘴，说："她是个聋子又是哑巴。"其实这是不用解说也容易明白的。这个女人显然不惯于做这种事情，她露出了窘相。她脸都红了。我就只见过她这一次。以后又换了一个芬兰人，也许是一个厨娘，她没有受过教育，很粗鲁，长了一头淡黄的头发。她用她那肮脏的手指将我的头发一股一股地搔着，把我的头粗暴地摇来摇去，就象它是一个大木球似的。每次我都是含着眼泪走出

去的。[1]

然而当我们这些诗人正在推敲诗体和韵脚的时候，工人马尔地诺夫却用散文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按日写着日记，等他把那一册抄本写满了，他便将它交到督察长那里去，督察长再把它送给警察总署。马尔地诺夫在日记里描写了好些事，星期六的搜查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定描写得很详细、很生动。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缘故，还是因为我们应该被搜查的时期已经过去，总之搜查的办法突然取消了。不过我们坚决地相信马尔地诺夫的日记跟取消搜查的事大有关系。

---

① 我得说一句公道话，有一次督察长发觉我在哭，他问我有什么苦恼。"这个女人太粗鲁了，"我答道。"我会对她说的，"沙科罗夫简短地说；从那时候起她便不再拉我的头发了。——原注

格拉切夫斯基

一八八七年秋天民意社执行委员会的同志米·费·格拉切夫斯基用一种残酷的方法死去了。他的一生是一首完整的史诗。二十年前他还只十八岁，他便离开师范学校，出来做民众学校的教员，他“怀着强烈的志愿要做一点有益于农民的事情”。他辛苦地做了四年教员之后，又改行去铁路上做钳工，并且在工友中间做起文化教育工作来；随后他到圣彼得堡，在那里加入了柴可夫斯基团。① 这个团体要他到莫斯科去，在工人中间做宣传社会主义的工作。他到了莫斯科不多久，他的事情就败露了，他被逮捕，在牢里关了三年半才受审讯。在一八七八年审判终于举行了，他被判处三个月的徒刑。可是格拉切夫斯基并未得到真正的自由。这年八月他毫无原因地又在敖德萨被捕了，未经法

① 柴可夫斯基团是当时知识阶级青年中间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柴可夫斯基是一个重要团员的姓。

庭审讯，便由第三处下令将他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他年富力强，自然不愿意把他的生命消耗在流放生活中，他便设法逃走；可是他在北国茫茫的林海和沼地中迷了路，被人抓住，由宪兵们押送回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然而他在半路上又从车中跳下来，躲在森林里面，经历过各种的惊险，终于遇到了一些在流放中的同志们；他们把他隐藏了一些时候，后来他便动身到彼得堡去。那时民意社已经组织起来了。有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很成熟的格拉切夫斯基便加入了这个革命团体。一八八〇年我们的第一家印刷局被警察破获了，格拉切夫斯基便接受委托来另外创办一所。

格拉切夫斯基后来做了民意社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①]以后，他更用全力从事党的工作，成为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在一八八二年，那时民意社执行委员会中留下的委员已经不多了，格拉切夫斯基还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再来制造炸弹。他身兼管理者和工作者两个职务。当时他弄到了一张假护照，他相信自己非常安全，却不知道警察已经在暗中尾随着他以及跟他有来往的每一个人了。

---

① 这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社党员暗杀的日子。关于这事本书第一卷中有详细的叙述。

结果在七月里格拉切夫斯基和所有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同志同时被捕了。格拉切夫斯基认为他的同志们的灾祸是他一个人造成的，这种想法使他非常痛苦。在他那信仰坚强的革命者和恐怖主义者的严厉冷酷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热烈的心。他现在不能够继续做党的工作了，他便把他的爱专注在同志们身上，眼看着这么多年轻人将被判重刑，他十分难过。这种心情决定了他在法庭上的态度：他毫无惧怕地把一切责任全拉到他一个人的肩上，甘愿由此判处死刑，同时他还尽力为受审的同志们开脱。

一八八三年他在十七人案审讯终结时当庭的发表演说中说：

> "我只要求一点：至少把我的精神上的痛苦减去一部分吧，这十个月来我一直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它比起最厉害的肉体上的痛苦来，还要强过若干倍。实验室是我一个人办起来的，没有别人参加这个工作；我是实验室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罪人，因此要求让我一个人接受全部的处罚。"

格拉切夫斯基把他这种道德上引咎的重担一直挑

到他的活葬墓里去。他被判死刑，然后又被减为终身苦役罪。他起初给关在亚历克赛半月堡里，后来再转到席吕塞尔堡来。亚历克赛半月堡中的生活对于格拉切夫斯基简直是慢性的死亡。那个监牢就是一间死屋。在那儿是不会有抗议的。格拉切夫斯基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因此他给监禁在席吕塞尔堡的三年中间，他总是不断地跟督察长沙科罗夫斗争。好象是这样的情形：要是他那引咎自责的痛苦减轻了一点，他还可以忽略或者忍受许多事情。然而他身心两方面受的打击很大，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限了。除开席吕塞尔堡和亚历克赛半月堡的囚人所身受的精神和物质的痛苦外，这里还有一种最厉害的刑罚：静寂。不错，静寂，在这里整个地方都让静寂统治着。……狱规上规定着得保持这种静寂。静寂是监狱管理方法上最完满的成就。监狱里不论日夜都应该是毫无生气，它得象坟墓里那样死寂。这里唯一的不可避免的响声就是沉重的铁门的开关声和递送食物时滑窗的开闭声。门闩的声音低沉地响着，叫人记起住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不单只是你一个人。……此外就没有一点声音了。

在自由的世界中静寂是那班神经衰弱的人的难得

的幸福，对于受着刺激的神经，它正是一副非常灵验的药。然而这种永远的静寂，这种没有终结的死一样的静寂却是很可怕的。再没有比这个更有效的损害神经的方法了。这种连续不断永远存在的安静损坏了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听觉会越来越精细越锐敏，到后来稍微一点音响它都忍受不了。许多人已经开始现出了病象，他们一听见声音就不由自主地发出叫喊来；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响声越是细微越是平常，反应越是强烈。连最细微的杂音都会引起抽泣，要是声音周期地反复重响，那么痛苦更是不能忍受的了。

在夜间这种细微的声音也会使人失眠，并且刺激人的神经很深，使人完全失去自制的力量，只想叫喊，只想打人，为着终止肉体的痛苦。宪兵们故意弄出囚人最讨厌、最难忍受的声音来折磨囚人。那些特别害怕听某一些声音的人更倒楣！而不能忍耐容易发脾气的人还要糟。要是谁因为这个缘故开始认真地跟狱方斗争，他结果一定会毁灭。囚人越是激烈，越是坚强，他越难中止这种斗争。他会战斗下去；他要申说，要抗议，要辱骂，要叫喊。因为这一切，将对他进行报复，不是加倍而是百倍地报复！挑衅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发展到了极点，于是痛苦、愤怒、反抗都集聚在一块儿，使得囚人只有一个念头：当面侮辱敌人，然后死去。

这种斗争的几个步骤格拉切夫斯基一一地全经历过了。他不断地抗议，他决不放过每个可以抗议的机会。他每天都要跟宪兵和督察长沙科罗夫起冲突。

格拉切夫斯基的监房在下面的一层；在他的监房下面便是堆积木柴和煤炭的地窖。整个监狱都是由这里生火取暖的。不论是白天或夜晚都有声音，人来人去，生火，到处丢柴。这种闹声不过是一串数不清的痛苦的开端。加之，他正害着失眠症，服着水化氯醇；早晨他总是在床上躺很久。然而在被子里静静不动地躺着，这在监牢里是不许可的，这样会惊动了宪兵。……或许他死了吧？再不然他逃走了吧？他们时不时地偷偷走到门口，推回滑窗前的窗栓，朝监房里看了一下，又把窗栓弄得发出大的响声。……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样会使囚人的锐敏的听觉发生很大的反应。实际上这种响声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痛苦，并且使得许多神经衰弱的人因而发狂。格拉切夫斯基的情形也是这样，而且更糟。格拉切夫斯基每次向要塞司令官告状以后，督察长沙科罗夫总要千方百计整治他。

一八八六年三月监牢里有两个囚人病得很厉害，这是聂马罗夫斯基和黑立斯。我们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们的呻唤声。宪兵们发觉垂死的病人的痛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便决定把他们搬到老监里去。然而老监

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可厌又可怕的地方。那里比我们住的新监加倍地阴森、可怕、可疑。我们在新监里面，虽然是分开监禁的，可是大家都在一处。单独地死去，不在我们大家住的同一个建筑物里面……死在那儿，死在老监里，在我们看来比较死在这儿，死在我们的近旁更加可怕。

病态的想象力给我们尽情地描绘出他们虐待垂危的病人的情景。我们在这儿固然寂寞、孤独，可是在那儿更是孤单凄凉。我们决不允许他们把我们的病人抢走，把他们活活地抬到墓地去。然而他们终于被带走了，聂马罗夫斯基自己走下去，黑立斯是给人抬走的。他们把他放在一张帆布上面，在病人的呻唤声和其他囚人们一致的叫喊声中抬走了他。……格拉切夫斯基发动抗议。他叫人把司令官[1]请了来，告发了督察长。督察长替自己辩护说病人惊扰了整个监狱，所以把他们搬开。可是抗议也生了效，至少黑立斯给抬回来了。然而聂马罗夫斯基在三月底死在老监里面。

沙科罗夫把怨恨藏在心里，他便在极小的地方对格拉切夫斯基报仇。譬如他发觉格拉切夫斯基连一点微小的闹声也受不了，他便故意不断地做出这种声音。

---

① 席吕塞尔堡原先是一个要塞，所以它的最高的长官是司令官。

格拉切夫斯基给弄得连一点自制力也没有了，因此他接连不断地跟督察长发生冲突，在这长期的斗争中他完全受着那个人的专横和粗暴的控制。不久他放弃了散步的权利，不久他又开始了绝食。一八八六年十月他绝食了十八天(根据另--些人的回忆，还应该是二十八天)，沙科罗夫为了不使其他的囚人知道这件事情，他用了最狡猾的方法把格拉切夫斯基搬到老监去了。

格拉切夫斯基在老监里给内务大臣脱尔斯道伯爵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详细地描写着席吕塞尔堡和亚历克赛半月堡中囚人们所身受的一切。他坚决地相信他这次的揭发会产生一些改良监狱制度和改善囚人生活的措施。

不用说，这只是一个幻想。并且这份报告究竟送到内务大臣那儿没有，还是一个问题。可是它的直接的结果却是他们马上把纸、笔、墨水、书籍甚至药都给他拿走了。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格拉切夫斯基又决定了新的计划，要是他的报告没有结果的话，他要用别的方法逼着当局实施改革。

一八八七年五月里有许多同志给关进懲戒室里去了。格拉切夫斯基便敲壁告诉他的邻人说：“我不能忍受下去了，我要发狂了……明天我要打医生的耳光。”

恳求和劝告都没有用。五月二十六日他实行了他

的计划，打了查尔克维奇医生的脸颊，这医生是一个卑怯的人，督察长在监牢里干的那些可怕的虐待囚人的事情他都亲眼看到，却设法替他掩盖了。

格拉切夫斯基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他的邻人，并且他还说他用这种方法逼着当局举行军法会审，他可以当庭揭发狱中的黑暗情形。如果当局不判处他死刑，只想慢慢地磨死他，那他就要用煤油烧死自己。当天他又被他们关到老监里去了，在那儿等候他们的处罚。几个月过去了，他所期待的审讯并没有举行。他对自己以往所采取的种种行动方法完全绝了望，他也明白他不能再期望什么公开的审判了（他们借口说他的神经失常，不给他这种特权），然而他还是抱定宗旨要用任何手段和任何代价将他和他的同志们所身受的一切痛苦和虐待揭露出来。他实行了他早已想好了的计划，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把监房里那盏大灯中的煤油倒了一身，活活地烧死了自己。

一幕可以跟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残酷相比的大惨剧发生了。它是在十九世纪中发生的，发生的地方离一个文明国家的首都不过五十公里的光景。……那个地方跟全世界完全隔开了，没有一个囚人能够使他的抗议声让外面的人听见。在那儿密纳科夫死了，他是给人枪毙了的。他发动了抗议，逼着狱方给了他一次审判。

他相信借着审判可以诉于国内舆论，他希望能够公开发表他的意见……麦秀根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也给人枪决了。他也发动过抗议，为着想受一次军法会审，把监狱中的黑暗和囚人所身受的残酷的待遇当庭揭发。

格拉切夫斯基也是在这里死去……他烧死了自己。他也曾抗议过，他也曾要求过一次审判……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换得一次公审。

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用。……他在这个历史上的老监狱席吕塞尔堡中、在这个墓穴里面点燃了一根不祥的活人的火把。他关在那儿，跟我们大家全隔开了；那是一个大房间，跟从前宗教裁判官们的会议厅一样。一排阴暗的、锁牢了的门，死死地一动也不动，好象它们注定了永不打开似的。阴暗而潮湿。在这空阔的背景里宪兵们的阴沉的脸貌显得古怪可怕。他们就象是刽子手，又好象那个被人收买到伦敦塔中行刺的凶手①……静得很，死一般的静寂。……突然发生了骚动，惊扰。一切都活动了，震动了。警钟的声音已经狂乱地响了起来。

门没有动，是锁住了的。……他的门锁牢了，钥匙不在那儿。门后面昂然立着一个瘦长的身子，带着一

---

① 指暗杀英国幼王爱德华五世和他兄弟的凶手。

副活尸般的枯瘦面孔。他挺直地站在那里，在烟雾和火焰当中越来越看不清楚了。亮红的火舌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这根火把，它燃着，冒着烟；这根火把是一个活的东西，是一个人！

沙科罗夫终于迈着沉重的、急速的步子走来了。他痉挛地捏紧着那串钥匙。脸上的表情显出了非常的激动。他用熟练的手开了锁。门打开了。房间里充满了烟和火。一个人站在房中央，……完全给烟雾和火焰包围了……还有煤油的气味和东西烧焦的气味……惨剧完成了。在烟雾与火云中，一个人的知觉丧失了……几声呻吟……含糊的、窒息的呻吟……于是人死了。

三天以后柏特洛夫将军到席吕塞尔堡来视察，这以后不多久沙科罗夫督察长就不见了；他是因了"玩忽职守"的罪名被撤职的。格拉切夫斯基的牺牲结了果实，我们的监狱生活有所改变了。……死了的人不能复活，可是活着的人却呼吸得较为畅快了。席吕塞尔堡仍旧存在，然而马柳塔·司库拉托夫① 却去了。

沙科罗夫是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去职的。他走了以后整整有半年中间没有新的督察长来接事。他的职务暂时由一个宪兵队的军官代管着。后来在一八八八年

---

① Malyuta Skuratov，是沙皇伊凡雷帝手下的刽子手头目。

四月新督察长费多洛夫来了。我们渐渐地才知道他是个讨厌的老头儿，不过他不凶，他讲究手续，注重纪律，却又喜欢搬弄是非。在他的管理下面，我们的抗议算是达到目的了，我又可以跟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见面了。现在所有的同志们全得到了这个权利；共同散步已经是条规上载明了的一种权利了。

同盟绝食

我给关过惩戒室以后又过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间许多的日子都是平淡、单调、灰暗、无光的，我已经记不起它们来了。自然也有一些日子里面我的心灵在苦苦地挣扎，它激荡得厉害；还有一些别的日子我的心十分悒郁，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也有种种的跟狱方的冲突和一些牢狱生活的多多少少显著的事实。现在我只叙述一段我们用绝食九天的方法来表示我们的集体抗议的故事。

我们的监狱跟一切的国家机关一样，也得接受定期的视察。这种视察向例是每年两次，每次都会使我们大受惊扰。在我们所处的单调的环境中凡是破坏我们这种呆板的日常生活的任何办法或举动都使我们感到难堪，每一件破坏狱中生活常规的事情，都使人感到痛苦的刺激；我们紧张，不安，头痛，好久都不能恢复平静。监房的门一道一道地陆续打开，许多人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嘈杂地响起来，于是人声喧闹成一片。原

来他们正走进你的监房来了。他们是一大群人，让宪兵们护卫着，都是些陌生的人，有的很冷淡，有的流露出敌意，都是完全不能了解我们的。他们问了一些话，有的也许会笨拙地触到了我们心灵中的创伤。这是一种叫人讨厌的官方的问话，我们只能匆忙地糊里糊涂地回答个“是”字或者“不”字；而宪兵们则排在那位贵人的两旁，两眼直瞪着你，好象你是一只野兽，会伤害到尊贵的来客，需要他们随时准备用他们的胸膛去保护他似的……后来他们走了——然而那个囚人还是激动不安，他的生活的常规让人破坏了，他锐敏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囚徒，他不停地在监房里踱来踱去，只想恢复自己的安静。

啊，那些参观！那种视察！那种打扰！并且也跟每个国家机关的情形一样，在视察之前，监狱的官员们就从一个肯帮忙的朋友那里得到秘密的通知；在头几年他们还守着秘密，只是暗中准备视察大员的降临，可是后来他们便公开地布置一切了。

一八八九年秋天的这一次，督察长费多洛夫已经得到通知，他便到各个监房去巡视了一通，吩咐我们每个人要小心，不得把额外的图书放在显眼的地方；要不是把它们还回给图书馆，就得藏起它们来。他所谓额外的图书就是指我们关进席吕塞尔堡时随身带来的

书，那些书经过我们多次的要求监狱图书馆才答应收藏了，大概并没有先将书单送给圣彼得堡上峰去审查过。他的劝告倒是好的，我们都遵从了，就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警察总署署长杜尔诺渥① 从容地到每个监房里看过了。他走进了二十八号的监房，那是赛尔该·伊凡诺夫住的地方。在那放下来的睡箱② 上放着一本书。杜尔诺渥拿起它来。"哼，哼！" 他不高兴地哼道。这是米涅③ 的《法国革命史》。他们走出这个监房以后，他对督察长表示他的惊讶，说他想不出怎么会让这种书在监牢里传阅。随后他就下令检查图书馆的书目，凡是跟囚人的政治与社会的见解多少有关的书籍一律拿开。这样被拿开的书一共有三十五部，都是我们这个小小图书馆中最好的书，我们的心智方面的活动就是单单靠着他们来供给的。那些书是玛特立④ 的《荷兰共和国

---

① Durnovo，在一九〇五——六年间做了内务大臣，他用了残酷的武力镇压的方法摧毁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他后来还是被恐怖主义者暗杀了。——英译

② 白天放下作椅，夜晚拉起做床的木箱。

③ 米涅（F.Mignet，1796—1884），法国历史家。《法国革命史》共二卷，出版于一八二四年。

④ J. L. Motley（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荷兰共和国建国史》出版于一八五六年。

建国史》(二卷)；杰微拿斯[①]的《十九世纪史》(五卷)；斯宾塞[②]的《社会学原理》和《社会静学》；莫兹立[③]的《身与心》(英文)；《林肯传》一册；《美国内战史》一册；皮沙列夫[④]的著作(一卷)；还有别的著作。这些都是我们带进监里来的书，而且是我们看得最宝贵的。然而这些已经得到认可的图书现在又遭摈斥和查禁了。他们夺去了我们唯一的精神财产，谁又能够给我们保证在这第一次的劫夺之后不会接连地发生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呢？这是一个精神上的灾祸，把整个监狱都惊动，扰乱了。

在这件事发生以前不多久，有几个特别渴想跟别的同伴谈话的同志发现监房中的排水管并不是每根单独的，却是互相连结，只有在四个地方是隔开了的。因此在管子排空的时候，每一部分监房的囚人都可以和同一部分监房的囚人们互相通话，就跟在圣彼得堡拘留所中的情形一样。为了便于传达消息起见，我们分

---

① G.G.Gervinus(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

②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静学》出版于一八五一年；《社会学原理》共三卷，在一八七六、一八八二、一八九六年分期刊行。

③ H.Maudsley(1835—1918)，英国精神病研究者。《身与心》出版于一八七〇年。

④ D.I.Pisarev(1841—1868)，俄国虚无主义的文学批评家。

别成立了四组。所以当我们的书籍被搜去的时候，我们便各组分别讨论这个问题。各组之间则通过敲监房内靠走廊的墙壁互通消息，这是一种极不完备的谈话方法，不过当时在费多洛夫管理下面，敲壁已经不再是应受处罚的犯罪行为了。等到大家全知道这些书籍被拿走以后，我们便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付办法。全体一致认为对这件事不来一个抗议是不行的。图书馆中本来就没有几本书，我们又不能够再得到新书；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有的寥寥几本书里面那些最宝贵的拿走了。要是我们默默地不作声，难道他们不会再把别的也给我们抢走吗？

有几个人提出我们用拒绝户外散步的办法表示抗议。自然，坐在自己的监房里面并不是一件困难事情；可是谁会注意到这个呢？命令是警察总署署长下的，但警察总署就一定不会注意到这上面来。放弃我们的散步的权利，失去呼吸新鲜空气（虽然每天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钟点）的可能性！永远关在监房里面，用这种折磨自己的方法消耗生命，后来便会明白这种办法毫无用处，终于不曾达到目的又慢慢地走出监房来！不！我们还是采用其它不拖延时日，而且较为严重的抗议方法，哪怕是消极的方法也好——别的人和我都特别坚持地这样说；我们提议全体一致不进饮食，并且这不只

是三四天的事情，我们要绝食到死。我们甚至设想到这事的结果不仅会使一个人牺牲，而且会有几个人因此死去；但是我们应该保卫我们看书的权利，那些书是唯一的使我们的生活有点快乐和希望的东西。

因此现在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了。多数的人（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和她的邻人们也都在里面）都主张拒绝参加户外运动。他们当即不走出监房了。少数的人却相信这种办法是不彻底的，坚持着要来一次全体绝食。我是在这少数人里面。这样一来，显然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全体一致的决定了，我们这少数派中的五个人不顾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开始单独绝食。我们实行了。这次我们犯了一个大错。只有在好些年以后（在一九〇一年卡尔帕维奇绝食的时候），我才充分明白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的意义。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决定是不公正的，不应当这样做。倘使别的同志们并不同情这种抗议而且不肯参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单独由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来进行这抗议。因为同盟绝食继续下去的时候，别的人一定会被拖进去参加的，而且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愿；任是什么人，只要一想到就在他旁边，有些同志为着某一个目的正实行绝食，他一定忍受不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迟早会被自己的同志感情和同情心逼迫着去参加这个抗议的。可是

我们却不能期望由这些动机来推动的抗议会支持长久。然而我却认为同盟绝食要么不实行，要是实行了，就得用决心和毅力使它坚持到底。自然谁也不会故意违反别人的意志，单只利用他们对于绝食者的同情，就把他们拖到死亡里去；可是暂时的支持和最后的退出却会招致全盘失败的结局。

不幸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完全不注意其余的同志们的感情和思想，我反而因为他们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就生他们的气。我认为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计划只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我不满意他们那种保全自己的精神。我想："他们不肯拿他们的生命冒险，可是人总得冒险，这是值得的！"

我们行动的结果很不利，尤其是对于我。我们的同盟绝食一开始，所有先前反对我们这种主张的人全都马上加入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在暗中决定了这样一个办法：他们尽全力阻止我们实行我们的计划，然而要是我们坚持实行绝食的话，他们便参加我们的行动，同时还决定：茶可以喝，不过不放糖；并且女人比男人迟两天实行绝食。差不多全监狱的囚人一致参加这个抗议。没有加入的只有这几个：乐巴丁，他从未参加过我们的抗议，并且他在原则上就不赞成任何联合行动，他认为在监牢里是做不到一致行动的；安托

诺夫，他只相信积极的抗议；阿新布伦勒尔，他坦白地承认他害怕他不能坚持到底；瓦西里·伊凡诺夫和马努恰罗夫，他们不赞成同盟绝食，不肯公开参加。（他们两人假装吃东西，却把食物倒在便所里面。他们担心自己不能够支持到最后，一旦放弃绝食，这种近似叛离的举动会损害公共的事情。）

我们这一组的几个人：尤可夫斯基，帕坡夫，马尔地诺夫，斯塔洛得伏尔斯基和我，我们整天躺在睡箱上，差不多不讲一句话。然而在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的一组里面，他们却时时讲话，互相询问各人的感觉怎样。几天以后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头发昏，另一个人不能够站立；布清斯基吐起血来，荒谬的是他们请狱医那利席金给他看病。狱医很有理由地回答说，医生没法治疗那些绝食自杀的人，他不肯去诊病。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实行绝食的第九天。不久布清斯基的一个邻人便提议终止绝食，他的提议被监狱东北部的大多数囚人接受了。帕坡夫告诉我这个消息，他还说，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他要遵守它，不打算继续绝食了。马尔地诺夫是一个强壮、健康的人。可是他一点也经不起考验，他在第三天就进食了。我当时非常严正，一生气就跟他绝了交。斯塔洛得伏尔斯基说过他要死得象辛尼加[①]那样，他割开自己的动脉

自杀，却做得很笨拙。宪兵们注意到了他在做什么事，就把他送到老监去，他给他们关在那儿以后，据他自己后来讲，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他没法抵抗它，只得吃一点东西。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尤可夫斯基跟我两人了。他敲壁传话给我说，他愿意照我的做法做，我回答他道，我的习惯是这样：我自己发动的事我总要做到底，我不以为我自己应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拘束，我要继续抗议下去。

我的同志们的退缩给了我一个大的打击。不用说，被人离弃的孤立的感觉使我痛苦。然而使我尤其苦痛难堪的却是另一件事。五年以前我给关进这个监狱里时，我对革命党人和革命集体都有一个理想的概念。我的这个"革命党人永不退缩"的概念是从热利亚博夫②、弗洛林科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的身上得来的，而民意社执行委员会的团结一致又使我得到一个革命集体的观念。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放弃这些概念了。考验来了，它完全摧毁了我的精神。

我四周全是革命党人，他们说过、表明过准备死

---

① 辛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大约生在纪元前四年，在纪元后六五年，奉尼禄命令，自杀。

② A.Zhelyabov(1850—1881)，民意社执行委员会委员，因参加三月一日事件被判死刑，同年四月三日受绞刑。

的决心。他们说起过牺牲，说起过抗议到底的话。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不是真心说的？他们在骗自己，还是他们想骗别人？那么他们想骗谁呢？是狱官们吗？因为我们敲着管子谈话的时候，敲声是很容易听见的，宪兵们会把我们的全部谈话向狱官报告。或者这些谈论是一种口头示威故意用来恐吓禁子们的吗？难道它们真是空洞的威胁，难道那些说话的人明明知道不会有人去死，不会有人拿生命为这次抗议冒险吗？然而为什么我的同志们当时不给我一个警告呢？倘使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幕趣剧，那么一个革命党人还值得去干它吗？革命党人不应当信口胡说，就是对待敌人也不应该。在另一方面倘使他们的话、他们的用意是认真的，那么他们的退缩便是他们的软弱的表现，他们没有勇气去完成他们已经开头的事情。然而我的同志们却是有毅力有决心的人，而且是俄国里面最强的人。要不然，他们在自由的时候，在他们来到这个石头坟墓之前，决不会做出那些事情来。不错，他们是刚强的人，并且应当是刚强的。然而，他们话倒说过了，他们却并没有照自己的话做去。

这是一个极大的幻灭，它使我充满了不能控制的愤怒。我心上起了不公道的、怨恨的猜疑，我好象对每个人都憎恨。我的同志们，他们是我生活里残留着的

唯一的亲近的人，可以说是唯一的东西；现在他们出卖了自己以后，在我看来他们好象是一些陌生人了。我曾经相信过他们，相信过他们的坚定，相信过他们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我现在才看出来在我面前的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个牢固地结合起来的群体，却只是一些游移不定的个人，他们软弱，不坚定，并且跟常人一样准备着随时放弃共同的目的。我的整个心灵都让这些思想搅乱了。我的绝食已经继续了好些日子，而我那坚持到底的决心也跟着一天天地增强了。在经历过了那一切的事情以后，我觉得死比活着还容易。我整个身心都在渴望着死。是的，我要绝食至死。我要把这件我已经做起了头的事一直做到最后。让"他们"抛弃他们的目的，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我要实行我决定了的主张，达到我要求的目的！

我已经跨过了那一道界线（走出了这界线，坚定的意志便不能再回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抛弃这生活，摆脱这个可怜的、屈辱的、寻常的生存，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一班同志中间有两个人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打击。

一个有着自主自制的力量的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又有充分的认识，他既然决定了做一件事，要是有人去干涉他，阻止他表白他的坚决的意志并且逼他屈服

让步，那么对他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侮辱了。这种干涉，这种对于一个人的力量的损害无异于对这个人的精神本质的侵害，对他那天赋的决定他自己的行为、表示他自己的个性、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形态等等的权利的侵害。现在我的同志们侵犯了我的决定，损害了我的意志。

尤可夫斯基跟我已经又单独绝食了两天了，然而帕坡夫和斯塔洛得伏尔斯基两个人，事先并没有商量，却分别地先后通知我，倘使我因绝食死去，他们也要自杀。这是道德上的要挟，它激怒了我。想想看！这两个人事前是赞成我的主张的，可是事后并不先征求我的意见就背弃了我们的共同目标，现在居然敢来要求我做那同样的事。他们的男性的虚荣不能容忍一个女人表现得比他们更坚定，更有恒心。他们自己感到惭愧，想把我拉下来，拉到他们的水平线上；他们自己不愿意死，所以他们强迫我活！我也许应当嘲笑他们的这种表白，应当不相信它，可是他们的话里却有着使我不得不相信它的地方。我真相信了。对这两个刚才还表示过他们珍重自己的生命愿意活下去的人，我真的能够把他们领到死亡的路上去吗？不，我不能够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把他们拖到坟墓里去。我不愿意叫他们不是为着共同的目标、却单单因为我一个人的缘故死

去。

于是我停止了绝食，然而我是怀着万分绝望的心情去做的。从这时候起我中断了我跟整个监狱的精神联系，我自己立下一个庄严的誓愿，我把我这个誓愿通知了我的同志们，我说：从现在起我跟他们的团体完全脱离关系；我不再参加任何集体的抗议；我倘使要抗议，一定由我自己发动，单独地抗议，因为我们这次同盟绝食使我明白了连两个真正同心同意的人也没有。以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决定我自己的行动，决定我自己的做法。

若拿积极的结果来说，我们这次的同盟绝食自然是失败了，监狱当局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的惊扰；那些书也没有发还给我们。绝食反而多给我们带来一重压迫。我还在绝食的时候，有一天司令官多布洛节也夫（我记得他只做了一个月光景的司令官，就给调走了）来视察监房。他宣读了一道命令说，我们每个人当初关进要塞里的时候身边带的钱全数没收，当由我们的亲属去领回。[①] 可是在绝食的事发生以前不多几时，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可用这笔小款来充实我们图书馆。这事情是部分地办到了：莫洛左夫订购了一部部可倡的

① 事实上款子并未发还给我们的家属。——原注

卷帙浩繁的《世界大地理》①。我们其余的人却还没有利用过这种机会，现在我们完全失掉这机会了。

我们监狱历史的这一章就这样地结束了，我不能忘记：它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许多的痛苦，它还把我放在灭亡的边缘上。我所经历的道德上的灾祸把我在绝食等死期间所保持着的沉默和平静破坏了。我整个的内心都给震动了，一直到好些年以后我的精神才恢复原状。可是我这一段经历的记忆与后果在今天还是很鲜明的。

在我不吃食物的那九天中间，我一点也没有感到饥饿的苦。我那班身体比我的强壮、神经比我的健全的同志们在绝食的第二天第三天中所感受的痛苦我完全不曾感觉到。那个强壮结实的马尔地诺夫连三天也支持不了。相反的，我丝毫没有想吃东西的欲望，我也看不出我自己的感觉有什么变态的地方。我平和地躺在睡箱上读书。我的头脑非常清楚，我高高兴兴地读着法文原本的莫里哀戏剧；我读着，觉得阿巴公②和他跟厨子的谈话好笑，可是《鞋匠变为绅士》这个戏特别

① 邵可侣(Elisée Reclus，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著有《人与地》、《地与人》、《世界大地理》及《进化与革命》等书。

②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的名剧《吝啬鬼》中的男主角。

使我开心。只有后来我才渐渐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到了第九天以后，我一走动时，眼前立刻发黑，这是一般在床上躺久了的人的通常的情形。所以要我坚持我继续绝食的决心，事实上用不着多大的努力，也不需要任何忍耐力。在这方面我的处境比较我那些有着不同的心境的同志们容易得多。我之所以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痛苦，也许是一部分由于我在绝食的开始就抱了安静的坚定的决心。可是我的身体虽然经受住这次真正绝食的大考验，但是那余威却是很可怕的。除了精神沮丧意气消沉外，我的整个神经系统全给破坏了；每个控制中心都失去作用。在好些方面我的意志力不是减弱，而是完全丧失了。我对于声音的反应以前就是很锐敏的，现在越发厉害得叫人不能相信了。从前每一个意外的响声都会使我激动地战抖起来，现在我一听见那声音就会不由自主地大叫，再后来我甚至会抽泣，使得整个监狱都给我的呜咽声扰乱了；最糟的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想止住它们。要不是我无意间听见了乐巴丁对别人讲到我的那句话（我在本书这一卷的第二章中提起过），我不知道这种紊乱状态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乐巴丁的话使我的精神更新了。

一个社会的义务！一个社会的使命！难道在这儿，在生活的界线以外，仍然能够有一个我可以担任的使

命吗?难道我真的是别人所需要的,我真的不只是我自己和我朋友们的吗?我以前相信社会抛弃我,生活不要我,把我赶了出来。难道真的我还有什么用处吗?

我前面说过,我觉得我扮的社会脚色已经演到最后一句话和最后一个动作了。在我还没有被捕入狱的时候,我总认为我所担任的脚色是不重要的,我从来不曾想到会有人记着我们的姓名。我觉得我们距离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仍旧非常远,因此我们很可以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期看作只是一个(譬如说吧)地质学上的很早的时期,而我们民意社的党员们也可以比作那些微生物,那些极小的有孔虫类,它们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陆续死去,沉到海底,经过了千万年之后,它们的尸骨构成了巨大的石灰岩层。一个单独的微生物是肉眼所看不见的,细小易脆的甲壳是渺小不足道的,可是整个的群体,石灰岩层却是强大的,它构成了高山峻岭。

我反复地思索着我无意间听到的那句话,我开始感觉到,我开始相信对于我们狱墙外面的一切我还没有完全死去;现在狱墙好象裂开了,我的眼睛注视着远方,望着我从前曾经在过的远方,为着它的缘故我应当保持着一个相当的高度。

母亲的祝福

在我所珍惜的物件中，有一座廉价的小磁像。这是在我的审讯完毕后我们母女分别之前我母亲拿来祝福我的。我最爱这座像，我小心翼翼地收捡着它，看得比我的任何东西都贵重。他们也没有把它给我拿走；我带它到席吕塞尔堡来了，就是现在我还是一样地宝贝它。这像的一面有一个刻得很精巧的人像跪在圣母的面前，另一面刻着一行字："意外的快乐之圣处女。"

我母亲在祝福我的时候说："也许有朝一日你也会得到一种意外的快乐。"

在我们母女分别前我母亲对我说这句话（不是别的话，而是这一句）的时候，她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呢？她指的是我的运气的转变，指的是我跟她再见的快乐吗？或者她想用她的祝福的话来激励我，鼓舞我，使我明白：不管生命怎样残酷地被人摧残了，生活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快乐吗？

岁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然而快乐，重见母亲的快

乐始终没有来。我渐渐地离开了“现在”，越离越远，我不再朝前面看，却只是回顾“过去”，在这些时候我总是想在我们牢狱生活的大小事情中找出母亲的祝福的一个应验，我身边那座小磁像使我常常想起我母亲的祝福来。难道在席吕塞尔堡里面还有快乐吗？是，有的。的确的，要是这儿没有一点快乐，我们还能够忍受下去活到今天吗？最初的几年是一个初进监牢的人的最大难关，那几年中我们唯一的快乐就是跟同志们交际：用敲壁的方法默默地互相问好；用敲壁的方法传诵彼此的诗；庆祝彼此的生日和命名日；在纸条上写几句关切的话偷偷夹在书里面，借此传递——所有这些事都使我们多么激动，多么高兴！然而这些快乐里面总含着一点痛苦，含着点叫人掉泪的东西。在我们应该忘记的时候，它们却唤起了我们的回忆来。……几年过去了，又给我带来一些别的，纯粹的快乐。

这一类快乐的第一桩便是报纸——一张报纸。有一个时期，设在那个历史上的监狱中的小工场全是由一个身材高高的漂亮的军官管理的，我们通常在那些小工场里做工，用铁锤和粗刨的声音来驱散我们对曾经在这儿无声无息地耗尽了生命的众多囚徒的回忆。有一天我们正在做工的时候，那个军官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他读完报以后，就把它放下来，也许他并

不是无意地留下报来的，这样，谁想要，可以在经过那儿时悄悄检起来带走。果然是这样，报纸从一个人的手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辗转地传遍了整个监狱。

坐在“弗南号”上驶向北极，在不动的冰山丛中快冻僵了的南森，① 或者穿过中非洲原始森林记录下这第一条路的司坦来，② 要是忽然得着一份凭空飞来的报纸，这张新鲜的报纸给他们引起的快乐，绝不会象它现在给我们这班绝望地监禁在一个要塞里面的人带来的那样多。报纸上刊载的全是些国内生活的枯燥无味的记载，而且都是让检查官弄得极干枯了的。显而易见的，这些年来，在我们俄国这片广大的荒野上连一棵小树，连一根新苗都没有生出来。可是在那张报上我们找到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广大而辽远的天际。

这文章讲到德皇威廉企图召开全欧会议商讨劳动立法的问题时，还说起德国政府已将仇视社会主义者的法令取消；这文章更说到社会民主党运动脱离了秘密活动的阶段，打破了这个束缚着它的镣铐以后，发展

① F.Nansen（南森，1861—1930），挪威博物学家，北冰洋的探险者。“弗南号”（Fram）是他的探险船。

② H.M.Stanley（1841—1904），英国人，非洲探险家。

得很快，而且以不可抗拒之势传遍了全德国。我们快乐而激动地读着关于集会和会议的消息，关于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报刊迅速发展以及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大量增加等等的记载。这一切虽然发生在德国，而不是俄国的事情，但这个毫无关系。对于我们这班在"国际"①的旗帜下面成长的社会主义者，各国劳工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监狱的高墙第一次退后了，而且开了一点儿。我们看见了片刻的亮光，呼吸了一口自由的气息。

第二个快乐是——书。

我们的监狱图书馆起初可以说是毫不足道的。藏书一共只有一百六十种，这里面除开伦理和宗教方面的书籍外，就只是些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旧书：一八四六年出版的《印度杂记》(某英国军官著)；巴西尔的《君士坦丁堡旅行记》和《希腊旅行记》(一八四八年刊行)；德文《蒙古西藏旅行记》；法文《比利时地质学》；《高加索的风俗、习惯和传说》；邓加波尔斯基的关于俄国生产力(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讲起的)著作，等等。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和恳求，我们才得到许可将我们中间有的人

① 即"国际工人协会"。

从前带进监来的少数书籍拿出来供众人借读。然而这些书很快地就被大家读光了。至于由警察总署送来的新书起初是数量极少，后来索性一本也不来了。

一八九四年我们因为缺少有益的阅读物，特别感到生活无聊，我想起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便向司令官韩加尔特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既然狱中图书馆内书籍非常缺乏，他是否可以给我们向圣彼得堡的公立图书馆登记几个名额，由宪兵代我们去借书还书。这个要求只算是一种尝试，我们认为很少有希望办到的，因为要是它给办到了，那么我们这个石头的、棺材一般的要塞就跟一个自由的机构建立起联系来了。可是韩加尔特居然回答说："好吧。我会安排它！"

几天以后我们收到了一份目录，再过一些日子一整箱我们挑选的书跟着来了。我们的快乐不用说是很大的。落到我手中来的第一本书是颜述尔夫人著的一册论英国的小书。就是在正常的生活情形之下，这本书也会产生一个良好的印象；我现在在监牢里读到它，它简直是一个清水的泉源，一个意外的新发现。只有在监禁生活的憔悴凋零的气氛中才会有我这样的感觉。我读到英国的大规模的职工组合，组织得非常之好的煤矿工人的罢工，英国合作团体的蓬勃发展以及英国知识分子中的合作运动(表现在组织"民众大学"

和"大学区"等等)时，我真高兴得不得了。

英国知识分子跟七十年代的俄国青年一样，把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爱带进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等的工业区里去——这事实不是可以鼓舞我们，温暖我们的僵冷了的灵魂吗？面对着这个蓬勃的生命和它那为民众谋幸福的新的分枝，我忘记了我的监狱，忘记了我的不能活动的处境，忘记了我自己个人。

报纸来到我们这儿，只有一张报，它象电光似的，在黑暗中一闪，就消灭了。接着是书来到这儿，书本把监狱的高墙推开了，使得监牢亮起来，但也只是一会儿，不久又消灭了。……警察总署坚决地禁止我们在公立图书馆里借书。

一八九六年，一个新的勇气和力量的泉源又给我们开放了。快乐跟着它同来。莫洛左夫偶然从狱医的口中听说圣彼得堡有一所流动博物馆，收藏极富，博物学各部门的东西都很齐全。医生甚至还给他拿来一两盒从这个博物馆借来的化石标本。鲁加雪维奇、莫洛左夫和诺瓦鲁斯基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特别高，至于我呢？我几年来就在努力温习我从前在苏黎世念医科时所荒疏了的几门功课。要研究博物学我们非常需要那些丰富的收藏，因此我们便起了向博物馆借用标本的念头，我们决定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们使用它们。莫

洛左夫向韩加尔特提出了这个要求，韩加尔特一向都是尽力给我们帮忙的。可是这一次他却说我们应当向警察总署去要求，他自己并没有权处置。

我们应该怎样对警察总署说明我们这个请求的意思呢？莫洛左夫想来想去，最后才决定：先陈述他的请求，然后解释道，他正在写一篇关于物质结构的论文，需要那些石头参考。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用这样一个荒谬的解释，我们都笑他，认为这不会有什么用处；然而不许我们在外面借读书籍的警察总署，却居然答应我们借用石头了。

从那时候起差不多一共有四年的功夫，柏兹洛得诺夫医生①给我们出了很大的力，他做我们跟博物馆中间的联络人。每隔一个星期他会给我们带来整盒整盒的科学仪器和标本，以后再由他送还给博物馆。这样我们居然能够饱览博物馆中地质学、古生物学、矿物学方面的丰富的成套标本，使用它的物理学仪器，参考它的干腊植物标本以及组织学和动物学的标本——总之，我们尽量使用了博物馆的丰富珍贵的收藏了。

我们的特权渐次扩大了，而且可以说是相当地大

① 他是奈米索夫的后任。——原注

了。医生开始在博物馆替我们借了些科学书籍来，随后又给我们带来一般性的书。再后博物馆方面主动建议让我们替它工作。博物馆给我们送来不少昆虫学、植物学、矿物学方面的原料，委托我们做成各型的成套标本和干腊植物标本，预备给小学和中学采用。那时候我们自己手边也有很多做干腊植物用的原料。我们在各人的园地中一共种了几百种植物；而我们监狱所在的这个岛上的土壤是属于火成岩的古地层，充满着志留纪的冲积沉淀物的标本。倘使我们要采集花岗石、片麻岩或者别的矿物标本，不论多少，只要我们俯下身去，就可以采到。监狱里现在工作非常繁忙。细木工、金工、编篮工都在工作，他们绘图，设计，碾细，磨光；他们制造木盒，他们改良并且发明种种新的装置标本的方法。他们粘贴纸板盒子，将各种磨石制成板、片；而爱好博物学的人又制造大批干腊植物标本，如苔和地衣，海藻和蕈，果子和种子等等，都依据组织和构造分类排列，成为整套标本。他们做了几百张说明花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玻璃切片，收集了成套的岩石、矿石、生矿的标本，采集了大量的昆虫的标本，等等。这一切东西做好之后都由医生送交博物馆，还有那几十箱的物理仪器也是由医生代我们送还的。

这几年是值得回忆的。在这些日子里究竟有些可

触摸的实在的东西来占去我们的时间；有种种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有种种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博物馆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用了我们的劳力使博物馆的收藏更加丰富了)结成了连系死人与活人的一根带子。我们因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存而引起的痛苦也渐渐地消失了。我们因被人永久地从广大世界拖开，知道我们永远失去了社会工作和社会目标而引起的始终无法排遣的悲哀也渐渐地平静了。

然而后来他们连这个工作也给我们剥夺了。韩加尔特离开了席吕塞尔堡，连柏兹洛得诺夫医生也走了。监狱中充满了不安的情绪，规程也改变了。这种使我们精神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的工作，现在也被人从我们手中夺走了。

重见我母亲的快乐并没有来——它永远没有来。然而预言应验了：我的生活里并不曾完全失去快乐。在漆黑一团的悲哀与痛苦中曾经闪烁着一股一股的金线，那是晴天里的阳光；曾经有过快乐，那是巨大的快乐，是我母亲曾经鼓舞地对我说起过的。我那个小磁像现在慰藉地给我提醒的"意外的快乐"。

司令官

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和我是席吕塞尔堡中仅有的两个女人。我们只能够跟彼此见面，而那班可以结伴散步的男人，不久就争取到了更换同伴的权利。照这个办法他们可以一个一个替换地互相会面认识了。他们想使我们也能够享受这种权利，他们决定要去掉那个隔开我们的障碍。因此他们从工场里带了器具出来，起初在那些分隔我们散步的小院子和我们种花种菜的小园子的双层板壁上面开了一个铜钱大小的口，后来就渐渐地把口开大。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自由地交谈，见面了。

督察长和宪兵对于这种破坏我们的单独禁锢的狱规的举动非常不高兴，可是司令官却装作没有看见或者没有听见什么的样子，其实当他偶尔登上瞭望塔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谈话的情形。因此我们这次的重大胜利才能够保持下来。

我不能说我当时十分重视这个胜利。孤寂给我的

影响实在太大了，我已经渐渐地感不到跟人们交际的需要了。一两个朋友对我就很够了；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跟我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好交际的人，监狱生活一点不曾使她改变。她很喜欢社交。她能够跟同志们一连谈几个钟头的话；相反，我却止不住地渴想避开他们。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苏非亚·金斯堡被押送到席吕塞尔堡里来了，说是奉了警察总署的命令，她应当跟我们完全隔开，单独监禁在老监中一个监房里面。这时狱方借口说工场需要修理，就把它们暂时关闭了。苏非亚·金斯堡仅仅忍受了三十八天这种可怕的孤寂之痛苦。尤其使她痛苦难堪的是她隔壁监房里还关着一个狂人谢德林。到了一八九一年一月七日她便用她为缝补内衣而弄到的剪刀割开脉管自杀了。

我们一点也没有料到她给关在老监里面，至于她的死我们还是好些年以后才知道的。

在我给关在席吕塞尔堡里面的二十年中间，要塞的司令官已经换了好几个，在那些人里面，韩加尔特无疑地占了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在我们的牢狱生活中，除去密纳科夫、麦秀根和格拉切夫斯基牺牲他们生命给我们争来的一部分改善外，除去由于我们自己共同的努力而得到的一部分的权利外，另外的一切较大的

生活改善都是由韩加尔特实行的。他总是设法不让警察总署和内务大臣的复仇的手挨近我们。他以为，失去自由、工作、亲戚、朋友，这已经是重的处罚了，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什么，那就是过分地残酷了。无疑地那些在政府的内部占势力的反动分子对民意社的党员抱着强烈的复仇心。尤其是象杜尔诺渥和卜列威①那样的人，他们的复仇心最强，民意社反对专制政治的斗争就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个在这个斗争中所担任的职务、所做过的事情。

韩加尔特就职以后，他一定看到了我们自己在板壁上所开的窗洞，可是他并不把它们堵起来，恢复隔离状态，他反而为我们做了一件有利的事。他不愿意用暴力和报复手段打消我们这个胜利，他反而请求警察总署准许他将密实的板壁的上面部分改装为木格栅。他的理由是园里缺少阳光，因为要塞的围墙和高高的板壁把阳光完全挡住了。我们把自己在细木作里做好的长凳放在板壁前面，我们不仅可以站在上面互相见面、交谈，而且相邻两三个"笼子"里的人还可以三、五个在一起学习，这一点我在《沙托夸》一章里还要谈到。这等

① V.K.Pleve(1846—1904)，曾任俄国秘密警察领袖和内务大臣，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被革命党人沙若诺夫暗杀。

于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合法的革命。韩加尔特在席吕塞尔堡中做司令官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宪兵敢用手指头挨我们一下，韩加尔特曾经当着我们的面对宪兵们发过这样的命令。

在韩加尔特做司令官的时候，小工场的数目也增加了，每个囚人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每天到小工场里去做工。在那时候我跟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也想学点木工手艺，我们两人各得了一个细木作。在韩加尔特的筹划下，两架很好的车床买来了。接着他又为我们争取到做有酬报的工作的权利。这样一来我们便用我们自己慢慢地学出来的细木工、车工和钳工的技艺挣了一些钱。这笔钱里面有一部分给用了来改善我们的伙食，并且后来又用了来为我们的图书馆添购书籍，这自然是靠了韩加尔特的帮忙才办到的。对我们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

在韩加尔特的筹划下，狱里又成立了两个装订作，他借口说给我们做订书的工作，却使我们读到了很好的书籍和杂志。

在韩加尔特到任两三年后，他让我们选出组长，实行日常生活自治，使我们因此省却了跟督察长或宪兵个人接触、发生冲突的麻烦，在以前冲突的事差不多天天都有。他还使我们有机会从圣彼得堡的国立图书馆

里借书进来，虽然为期很短，一共只两三个月。也是靠着他的热心，我们使用了流动博物馆的教学标本——这在《母亲的祝福》一章里已谈到了。

他究竟靠了什么方法，居然能够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难道在我们监禁期的第二个十年里面政治路线有了新的改变？或者是他跟警察总署有密切的关系，他可以照自己意思办事不受上级机关的支配吗？大概他在就任以前曾经提过条件，要得着对待我们处置事情的全权吧。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他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的确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想着他就不由得不充满了感激，他曾经帮助我们渡过了痛苦的时期，保全了力量，在他不能完全作主的条件之下这已经是他的极大的努力了。

波希托诺夫

我已经说过我们里面有几个精神病患者。谢德林、伊格纳季·伊凡诺夫和阿龙齐克给人关进席吕塞尔堡里来的时候，他们的神经已经不是健全的了，在正常的环境里，他们是应该让人送进疯人院去的。柯那舍维奇开始发病的时候，我们彼此间的联系还很有限，所以我们不能看出他的病症来。可是波希托诺夫呢？我们明明看着他生病，从他的精神变态的最初的病象起一直到他的精神完全崩坏为止，我们都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波希托诺夫以民意社军事组织的参加者的罪名被判决死刑，然而他递了一份请求减刑的呈文给沙皇，因此免掉一死，给关进席吕塞尔堡里来。他是一个有教养的、智力发达的人，可是他却缺乏特殊的精力和毅力，性格也不坚强。他生性柔弱，需要同志们的友情的支持。他爱生活与生活的欢乐。席吕塞尔堡的生活对于这个娇生惯养了的军官比对于任何别的人都更难受，

他在这地方的生活的确是充满了痛苦，并且到头来还得着一个悲惨的收场。

一般人都知道，在监牢里，想着同志们在近旁跟自己一块儿受苦这一个思想常常给人以忍受的力量。无疑地在头几年里这种想法在波希托诺夫的身上也是有影响的。而象我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这样跟他一样地在困苦情形中生活着的女人，我们的命运尤其使他感动。在一八八八年他给我的一张字条上就这样地写着："要是没有你这个榜样，我绝不能够在这儿生活下去……"

外国语文的研究，读书，体力劳动等等占据了波希托诺夫在席吕塞尔堡中的全部时间。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手艺人，喜欢车工，尤其爱好细木工的工作。一直到一八九五年他的健康状况还是很好的。由于他那活泼的天性，他老是忙着活动，并且充满着创意力，他的一切的劳动都是为着换取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的快乐的。他为她制造了各种的小橱和扶手椅、书物架、小盒子以及其他许多小东西。到了圣诞节，他居然做成功一棵圣诞树，一棵真正的道地的圣诞树，上面还插了许多支彩色蜡烛。

然而不管监牢中有这些劳动和乐事，愁绪还是不断地折磨着他。有一次，大约在一八九四年，他出来散

步，带着发光的眼睛，一只手贴着胸口对我们说："医生刚刚给我检查过，他说它已经在我身上'开始'了！"他指的是肺结核。

另一次他甚至对着鲁加雪维奇说，他不能够这样活下去了，他要自杀。

波希托诺夫终于疯狂了。在从不注意的人看来，这是突然发生的。然而事实上一个精神病学者早就可以断定他的病已经开始了。他以前是一个软弱、温顺的人，现在却突然变得急躁、傲慢了。他的许多古怪的不近人情的行为当时实在叫人不能相信；只有在后来他的理性完全丧失了的时候，我们才明白。

目击着一个友人的精神逐渐崩溃，这在我们实在是说不出的痛苦。到了一八九五年九月中旬，事情已经十分明白：波希托诺夫完了。打这以后他不再跟同监的人来往交谈了。他不肯离开监房，整天就躺在床上，说是在生病。

宪兵们对待他跟对待健康的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分别；所有的囚人都得一样地受苦。他完全不到工场里去了，好象他完全忘掉了它们的存在似的；而宪兵们也不再带他去那个地方。

别的囚人们看到波希托诺夫的病象一天一天地增加，感到很大的痛苦，大家神经都紧张到顶点了。我们

都在等待着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看来是没有出路的，因为除去波希托诺夫以外，监牢里面还有两个患精神病的囚人，谢德林和柯拿舍维奇，他们已经在这儿痛苦地挨了两年了……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几乎要引到一个流血的结局。那天差不多全体囚人都在老监内那些小工场里面做工，那些专为男囚人开设的工作间都开着，只有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跟我两人工作的工作间是关着的。马尔地诺夫突然出现了，他非常激动地向大家说，宪兵在打波希托诺夫。所有的人全愤激地聚集在走廊上；有些人在叫，有些人痛骂宪兵。宪兵们申辩着，说不会有这种事情。可是马尔地诺夫坚持说他不会错。那个宪兵还是坚决地否认他打过病人，于是雅诺维奇激动地大叫："你是一个浑蛋！"那个受了侮辱的宪兵便用全力拉警钟，这警钟是通到看守本部的，同时他又把那扇将走廊跟前室隔开的格子门关上了。我们来不及思索，就听见了急忙的脚步声，并且从格子门望见了一些枪上插上刺刀的兵。枪弹大概就要飞出来了。帕立瓦诺夫在激动中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跑进工场里去抓起一把斧头来保护自己。幸而瓦西里·伊凡诺夫及时把这个危险的器具从他手中夺去。同时那个把兵找来的宪兵也醒悟过来，设法把兵遣

开了。

为着这个事件狱方的唯一的处罚，就是将马尔地诺夫的散步的权利取消三天，“因为散布不实的谣言”。司令官韩加尔特明白这次骚动的真正原因，答应设法将波希托诺夫移送到病院里去。狱医向我们提议暂时先把这个病人移到老监里去，以免吵扰众人。可是我们想到将我们生病的同志孤单地关在那个隔离的建筑物里面，让看守们随意去处置摆布，——那班看守们的拳头我们好些年前就已经尝过了，这些年中间它们一定没有变软的吧——我们实在不能忍受这个想法。监狱当局经过一番讨论后便决定从我们中间派一个人陪着波希托诺夫到老监去看护他，免得他遭受看守们的任意的虐待。这是十分要紧的，因为他的病势发展得很快。尊大狂、宗教狂、癫狂的发作和自杀的渴望搀合在一块儿成了一种最厉害、最危险的精神错乱，在他发狂的时候，必须靠体力去制止他。我们选出鲁加雪维奇去陪他，鲁加雪维奇已经跟他很熟了。他一方面有着坚强的体力，另一方面又有善良的心。狱方赞同了我们的建议。鲁加雪维奇还可以在散步的时候将病人的状况和所受的待遇如实地告诉我们。

波希托诺夫的病势发展得极快。后来警察总署答应了监狱当局的要求把他移到圣彼得堡一个病院里

去。一八九六年二月五日我们忽然看见医生住处的附近停着一辆黑色马车。他们把波希托诺夫搬走了。狱医陪着他去，这医生倒始终是囚人们的朋友，对我们一向都不错。还有一个穿便衣的宪兵坐在车台上。

十二年前波希托诺夫给人押进席吕塞尔堡里来时，他是一个健壮、活泼的年轻人。现在他给人从这里带走，却只是一具没有理性的活尸了；他完全失去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感觉。

波希托诺夫进了圣彼得堡的陆军医院。他在那儿没活多久，于一八九七年四月四日死了。对于那些爱他的人，对于那些跟他一样为着自由而斗争、为着自由而受苦的同志们，他放下了帘帷，不让他们看见他最后日子里的痛苦。他是应该被祝福的！

别

“从这儿他们只有给人抬出去，他们绝不会走出去的，”某一位官员参观我们这个要塞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的确有许多许多人是抬出去的；然而关在这里的也并不只是些被判决了终身苦役的人（俄国人叫他们做“老没根”①），这里还有一些囚人，他们的徒刑是有期限的，等到期限一满，他们便离开我们了。

第一个释放出去的是海军军官尤瓦切夫②，他是跟我同时受审讯的，他的刑期并未服完，就早早地被赦免了。

尤瓦切夫是由阿申布伦纳吸收进民意社的军事组织里面的，他隶属于海军官佐们的尼可拉也夫团。这团体的团员，在水兵中间作革命宣传时的热心，使得那个

① “老没根”倒是中国用语，照原文直译应该是“永远永远的”。

② 伊·帕·尤瓦切夫写过一本回忆录，叫做《我国的巴斯底》，有拉坡波特的英译本，一九〇九年伦敦版。

比较冷静得多的阿新布伦勒尔大为惊叹。在审讯的时候，尤瓦切夫并未给人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他竭力否认他参加过党的任何革命活动，然而他还是跟军事团体的其他团员一起被判决了死刑，后来他递了一份请求减刑的呈文上去。他的死刑才改作了十五年的苦役罪。他到了席吕塞尔堡以后不多久，就渐渐地发起变态性的宗教狂来。监狱当局存心要拯救我们的灵魂，给我们每个人送了《圣经》来，尤瓦切夫常常整天整天地跪着读他那本《圣经》或者祈祷。逢着星期三和星期五，狱方要我们实行部分的断食①，而尤切瓦夫却不满意这种不彻底的办法，他在这些日子里连一点东西也不吃。他的宗教的热诚，自然不久就被狱方注意到了，他们做了报告到警察总署去。他只给关了两年，到一八八六年他就被带出席吕塞尔堡，流放到萨加哈林岛（库页岛）上去，在当地充当一名海军军官。靠着这个职务，他才有机会去岛上各处观察流放人的生活，以及当地官厅跟这班被夺去了人权和法权的流放人之间的关系，而描写出来。

第二个离开席吕塞尔堡的囚人是瓦西里·安德烈

---

① 宗教上的断食，禁绝平日的全部或一部分的食物，以表示节欲、忏悔等。

也夫·加老罗夫，他是在一八八四年基辅的“十二人案”（十二个民意社党员案）中被判决了四年的苦役罪。加老罗夫是一八八三年俄国亡命者季霍米罗夫和奥沙尼娜在巴黎组织的委员会的委员。他以外的委员还有乐巴丁、沙罗娃和苏雄林，他们跟他一样，当时都在国外。他们回国以后又加入了一个雅库博维奇—麦尔新。可是还不到一年他们先后被捕了。他们从事于恢复民意社中央机构的这种没有希望的活动，何况从一八八三年起在党的核心已活动着那个叛徒、奸细赛尔该·德加叶夫。①

加老罗夫是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被判刑的，一个月以后他就跟他那班共同受审的同志雪巴林、马尔地诺夫、潘克拉托夫等一起给关进席吕塞尔堡里来。一八八一年，我还没有被捕的时候，我在圣彼得堡见过加老罗夫一两次。他是一个世人所谓的“漂亮结实的汉子”，身材魁梧，肩膀宽大，活泼愉快，脸颊白里透红。然而在他被监禁的四年中间，他老是生病，他有出血症，不只一次病得快死去了。他或许是因了生病的缘故，或许是因了刑期短暂、有出狱希望的缘故，在牢里

① 德加叶夫的事见本书第一卷。妃格念尔的被捕便是由于德加叶夫的告密。

非常安静，谨慎。他并不参加我们争取敲壁传话的权利的斗争，也不参加我们争取结伴散步的权利的消极抗议，他从来不曾跟狱方争执过什么。

一八八八年加老罗夫出狱之前我们就拜托他办点小事情，要他带个口信给我们的亲属。我把我那首《给母亲》的诗敲壁传给他，他答应用心记住，以后抄写出来邮寄我的母亲。然而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他出狱后虽然住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1]那样的大城市里，但我们拜托他的事情他一件也不曾办到。我们猜想大概是象外间所谣传的那样，他受到了当局的威胁，据说如果他吐出一句半句关于我们任何一个囚人的话，他就得回到席吕塞尔堡去。不过他自己在几年以后曾经发表文章声明他并未受到任何威胁。

加老罗夫在狱里他的政治信仰就动摇了。后来他被选为第一届帝国议会[2]中立宪民主党[3]议员。他不再拥护民意社所主张的普选；根据他的修改后的主张，俄国民众知识程度还不够实行普选的水准；土地问题本是我们纲领的中心点，然而他对这问题的态度也已

① 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城。

② 即杜马(Duma)，指一九〇五年的俄国国会。

③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米留科夫等创立的俄国自由党。

由那个支持他竞选的政党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来决定了。加老罗夫在杜马中是个风头人物，他由于坚决而能干地拥护信教自由，博得一般人的尊敬。“黑百人党”① 在议会中辱骂他为“罪囚，”他勇敢而巧妙地答复了这个侮辱。他大声说：“你们现在可以坐在这儿开会，还是靠着我也流过一滴血呢！”他这话倒是真的，他为着人民代议制（民意社当时就为着这个斗争）不只流了一滴血，他流过许多滴血。这个大力士一般的人初进监狱时身体非常健康结实，但离开席吕塞尔堡的时候，脸上却毫无血色，就跟死人的脸一样。他在西伯利亚才逐渐恢复了健康。他在一九〇七年病故以后，一般的“旧信仰者”② 为了感激他替他们争取信教自由的权利起见，在他的墓上立了一块纪念碑。可是专制政府忍受不了这种“反叛行为”，下令将那块石板移开了。

在一八八八年以后，中间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没有人给关进我们这个监狱里来，也没有人给释放出去。在一八九〇年拿哥夫斯基的刑期满了，他们应该给他

---

① 当时俄国反动派所组织的党，目的在打倒、扑灭自由党和急进分子，党的名称本来是“俄国人民联合会”，因手段残酷，被人称为“黑百人党”。

② 一六五四年俄国正教教会发生分裂。一班守旧派不赞成教长尼公（Nikon）的改革，脱离教会，称为“旧信仰者”，大多数都是贫穷的人，几百年来备受政府和教会的迫害。

自由。

这个人的命运是相当悲惨的。我们大家都是经过所谓审判后定罪的，惟独他连一次审讯也没有，就让人关到席吕塞尔堡里来，并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只是由内务大臣下个命令，就把他在这个要塞中监禁五年。他原是一个步兵军官，一八八三年受着充军的处分被派到托姆斯克省[①]去，他在半路上逃走了，加入了民意社。一八八四年三月他在圣彼得堡大街上被捕。从他身上搜出一份制造新的爆炸物的配方，这就足以使他不经审判被送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到席吕塞尔堡的日期是一八八五年十月。

他在席吕塞尔堡头两年的生活倒是相当安静的，他并没有跟狱方发生过特殊的冲突。然而到了一八八七年秋天，那时还是沙科罗夫在做督察长，他就因了敲壁传话的缘故被移到老监里去过了，正是在格拉切夫斯基在那儿烧死自己的时候。这以后他又不间断地为着一些小事跟新督察长费多洛夫斗争。他的监房的窗户正对着囚人们散步的菜园。拿哥夫斯基想看看同志们，便跳上窗台，用手紧紧抓住窗框，打开上面的气窗。任是怎样申斥或惩罚都不能够叫他退回去。他们送他

① 在西伯利亚西部。

进过惩戒室，给他穿过“紧背心”，给他戴上镣铐，有一次甚至把他捆起来，使劲地把他扔在地上，弄得他失去知觉，血染全身。然而他始终不屈服，永远把督察长认作一个大仇人。

最后他五年的刑期满了。不只是他，连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怀着希望，又带着疑虑，不知道他会不会得到自由。

就在他应该出狱的那一天，司令官亲自走进他的监房里来，对他朗读一遍内务大臣的手令：拿哥夫斯基在牢中“品行不好”，应将他的刑期延长五年。

这五年又过去了。他们释放了拿哥夫斯基。他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妹妹，他非常爱她们。他很久都找不到她们；在他被监禁的整整十年中间，他没有接到过她们写来的一句话或一个字，因为在那些时候我们并没有享受到通信的特权。拿哥夫斯基起初被流放到加拉科尔去，后来在一八九八年他又搬到萨拉托夫[①]省，在巴拉绍夫城度过他的最后几年的岁月。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珂卜拉洗澡给淹死了。

拿哥夫斯基出狱后不久，我们大家所爱的同志奥瓦涅斯·马努恰罗夫（我们都简称他为“曼”）的十年的

① 东俄的一个省，在伏尔加河流域。

徒刑也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满期了。

马努恰罗夫一八八四年一月十一日在哈尔科夫被捕。他锯断铁窗逃跑了。十一月十六日又在罗斯托夫被捕。他曾开枪拒捕，他毫无杀死任何一个警察的意思，只不过想利用这场骚扰警告他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他担心他们会在他家里遇到埋伏。他给关在哈尔科夫的监牢里。在一八八五年受过审讯后，他才被押送到席吕塞尔堡里来。

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既未受过高等教育，也无动人的外表，然而我们却很难找到一个比他更仁爱、更善良的人了。他正直，敏锐，并且能够容忍别人的意见，在我们监狱生活的困苦情形中，实在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同志了；他对每个人的利益都很关心，对自己则很克制，所以他常常为别人做了一些事情，那都是任何别一个人做不了的。他对我们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因此刑期满了，他还不肯离开我们；只有在司令官韩加尔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要动手把他拖出去时，他才无可奈何地答应离开了。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在那里结了婚，可是在一九〇九年他就因了心脏病早逝了，遗下两个小小的男孩。

马努恰罗夫出狱以后不过一两年的光景，我意外地在韩加尔特给我们的那本一八九六年的某一期《俄

国财富》[1]中读到一首我自己的诗：

告诉我，我敬爱的朋友，告诉我为什么：
春天的太阳是这么明媚，温暖，
一切的生物都沐浴在它的光辉中，
为什么只我一人是如此忧烦？
告诉我：这个晴明的蔚蓝的天，
它温柔地回视着我仰望的眼，
为什么它把那些接连不断的愁烦日子
装满了难堪的苦难？
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寂寞，无聊，
带着苦闷地痴立，
从不抬起我憔悴的眼睛
望一望光辉的旭日？
要是你知道，我求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只在温暖明媚的五月阳光中
停留片刻便匆匆离去。
在我的窒闷的监房里消磨长日？

我翻过这一页；在另一面上印着答诗：

---

(1) Russkoye Bogatstvo，接近民粹派的一种月刊。

当你的心里充满着痛苦，
你不由自己地又掉下眼泪，
你躺在你那简陋的小床上
想着那些深爱你的人们
（他们住在你的母国内
捱着那漫长的艰苦的岁月）——
当忧愁守在身边
你还在希望仍旧存着希望——
勇敢地压下方生的恐惧——
你并不曾死去。
生活与爱仍旧可以属于你；
知心的朋友会将你的手紧握。
在船失事后怒涛汹涌的海滩上
总有一个好梦获救而存在。
坟墓不能关住一切
可爱的东西不能全遭杀害
愤怒的霹雳也不能将希望全毁。
黑暗并非不死的东西，
那日子即刻就要到来。
看，黑影在惊愕中仓皇失色，
因为黎明已快来临！

这首诗后面署了一个首写字母"M"。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姓名——米海洛夫斯基①！我还用得着提说那种使我感动得流泪的喜悦吗？我的声音居然飞过要塞的高墙，到了我朋友们的面前，又引了他们的爱的话语越过石头障壁回到我身边来②。这个快乐是亲爱的"曼"给了我的。

这以后在一八九六年又有人离开席吕塞尔堡，这次出狱的五个同志，是一块儿给带出去的。

一八九四年尼古拉二世做了沙皇。他的父亲并非凶死，却是病故的。我们都兴奋了一阵；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次大赦——说不定连我们也会给赦免的。狱方相信席吕塞尔堡会空了出来。督察长费多洛夫恭贺我们快得着自由了。"马上你就要再过着太太样的生活了，"他带着愉快的微笑对我说，他显然以为世间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了。

那位管理工场的军官因此便采取自由放任的办法：工场车间都不上锁。我们大家聚集在细木工场里面；

---

① N.Mikhaylovsky(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素来同情民意社等革命党。

② 一九一八年我才获悉，这首诗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写的，而是谢·巴黛夫应尼·秋切夫之请在狱中写的。——原注

同志们把我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伏尔铿席太因两人围住，雪巴林起先拉起我随后又拉起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跟他跳瓦尔兹舞。我们的快乐的确表现得太早了。韩加尔特对于俄国官场情形比较熟悉，他并不存一点幻想，他把那个军官申斥了几句。于是那个军官提前给我们的自由又给取消了，而我们的兴奋的心情也逐渐消失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再看看我们的生活中始终没有发生一点新的变化，渐渐地我们也就绝望，不再期待什么了。

一年又这样地过去了。然而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初我们正在老监的小工场里面做工，看守忽然走进来，陆续带了几个人出去，说是要塞司令官传见他们，鲁特米拉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惊惶着，激动着，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而他们不久就回来了。他们很兴奋地叙述那事情：根据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礼的敕令，瓦西里·伊凡诺夫、阿申布伦纳、斯塔洛得伏尔斯基和帕立瓦诺夫的无期徒刑给减成二十年监禁；而潘克拉托夫、苏洛夫柴夫、雅诺维奇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伏尔铿席太因四个人的刑期则减少三分之一，因此鲁特米拉、苏洛夫柴夫和雅诺维奇三个人便应该马上离开席吕塞尔堡。这个部分特赦使我们其他同志的情形毫无改变，它并不曾给那些遇赦的人带来一

点快乐，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甚至因此异常恼怒。可是我们一想起居然还有几个人会离开这个坟墓，我们也觉得高兴，便急忙向她道贺，然而她气愤着，连理也不理，只有后来才慢慢儿平了气，承认了这事实。于是各人开始忙着出狱的准备。

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和我们同住了十二年，经历了种种苦难以后要离开我们，的确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她爱我们，而且知道我们里面有几个人简直离不开她，就象她是阳光和空气一样。在她和我最后几次的谈话中，她时时表示对这几个同志的柔爱的关切，她要我牢记住对于他们她的离去是特别难堪的。……十一月二十三日[1]她和别的四个同志马尔地诺夫和雪巴林(他们的十二年徒刑刚满期)、雅诺维奇和苏洛夫柴夫(他们刚遇着特赦)五个人应被带出席吕塞尔堡了。

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出狱前的最后一点钟是在我的监房里度过的。她不停地哭着，我安慰她。临行时她说的一句话极其感动人，她说她把她一生中所认识的最好的人留在席吕塞尔堡而独自去了。

在下午一点钟我们这几个出发的同志陆续地被带

---

① 德文译本作"二十四日"。

出了他们的监房，然后再被人领出监狱。他们走出狱墙正进入要塞的天井里时，每个人都止了步，默默无言地挥手和我们"诀别"。我们从各人监房的窗户里注视着他们的渐渐退去的背影。他们全都转过身子向着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每个男人脱下他的帽子挥动着，表示问好的意思，而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却站住了两三次挥舞着她的手帕，我们也拿了白手帕在手里，监房的两重窗户和铁格子遮拦不住它们，它们也可以容易地给他们看见。我们的眼光跟随着这几个回到人间去的朋友，同时一个新的黑暗的空虚似乎在我们身边涌现出来。他们走到大门口，便不见了。对于我们他们是不再生存了，仿佛一个大洋张开巨口把他们吞食了一般；至于他们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再没有一点消息可以传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变幻不定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好象是梅特林克的那"一群盲人"了。①……

五个同伴的离去在我们的生活里留下了一个空隙。鲁特米拉·伏尔铿席太因在这空隙里自然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至于别的同志呢，雪巴林和雅诺维奇由

---

① 莫利司·梅特林克生于一八六二年，是比利时的诗人和戏剧家，《一群盲人》是他在一八九〇年发表的一个独幕戏。

于他们的性情和品格得着我们大家的热爱，而苏洛夫柴夫更是一个难得的人。

鲁特维席·雅诺维奇是波兰革命党“无产阶级同盟”的党员，一八八六年进席吕塞尔堡来的。他在被捕的时候实行武装抵抗，并且伤了一个秘密警察。人绝不会相信象他这样一个拘谨、内向的人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并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会看出他是个“不吃烟火食的人”。他出身富裕家庭，丝毫不知道一切物品的价值。我相信要不是宪兵在一定的时间内给他送食物进去，他连饮食也会忘记的。他在这要塞里也不设法保持他的健康，这一类的事他一点也不做。他整天坐在闷罐似的监房里，自然对他的身体会有损害。可是他并不去找医生。他老是捧着一本书坐在那里埋头读着。他的兴趣偏重在国民经济，他专心在研究统计学。他离开席吕塞尔堡的时候，还带了一堆订好的抄本出去，抄本上全是些关于经济问题和俄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波兰工业的发展等等的摘录、统计表、表解和成篇的论文。鲁特维席·雅诺维奇还给我编制了一本统计学手册，凡是一个俄国社会主义者所应具有的关于他本国的那一切的知识他都用简明的格式表示出来。要是这本书出版了，它会是第一本简明的俄国统计学的入门书。雅诺维奇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是非常谨慎的，而且

很诚实很客观；他绝不轻易拿出一个主张，没有经过一番批判，他不会接受一种学理。

雅诺维奇总是埋头做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不大管我们那些日常的事务，他专心致志于他的精神的劳动。在我们的同志中间他特别喜欢那些热心研究学问的人。除开一八八九年死去的瓦林斯基以外，鲁加雪维奇便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将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纯粹科学的和学理的问题，并且还有那共同的国籍，他们两个都是立陶宛人。我们看出来，他精神上很痛苦。有一次他跟我两人在我们各自的"笼子"里单独散步，大概当时我们都没有感到交谈的需要，可是我却想知道我的邻人是谁，我便从缝隙里望过去；然而我马上就把头掉开了。雅诺维奇额头皱紧，两眼深陷，不停地走来走去；他那惨白消瘦的脸上悲哀和忧郁的表情是很可怕的，他的整个外貌给人一种无限痛苦的印象，使得我的心也搐动起来了。他的面貌给我印下的这忧郁的印记常常使我惊扰不安。

从他身上发出来的纯洁与真实的气息实在是一种超脱了日常生活的拘束的神圣的东西。他的拘谨的天性使他不能跟别人密切交往，可是大家都非常敬爱他，而我们这些跟他常常接触的人更加爱他，把他的形象永久地刻印在我们的心灵上。

跟雅诺维奇同时离开席吕塞尔堡的马尔地诺夫是和加老罗夫、潘克拉托夫、雪巴林一起在“十二人案”中被判处十二年苦役罪的。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他和他那几个命运相同的同志一块儿给押送到席吕塞尔堡来，他在这儿一直住到一八九六年。他关在要塞里的时候，跟督察长费多洛夫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把我们大家都惊动了。他不满足于两人结伴散步的办法，因此每逢同志们在散步的时候，他总要抓住窗板爬上去看他们一眼。有一天督察长接连捉到他三次。督察长申斥他几句，他却吐了一口痰在督察长的脸上。象这种举动在监狱里算是对官吏的重大的冒犯，依照军法是应该判处死刑的。这件事情发生过后他们就把马尔地诺夫移到老监去了。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关进老监去，我们应当要求全体都跟着他关到那儿去。

这个提议使我很为难。我并不赞成马尔地诺夫的行为。他是一个人，督察长也是一个人，象马尔地诺夫对督察长施过的侮辱，不管是对什么人，我都认为是绝对不应当的。为着这件事我对马尔地诺夫的反感很深，我费了大力才止住我自己没有向督察长表示我对这件事情的歉意。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要脱离同志们单独行动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这酝酿中的集体抗议并未成为事实。马尔地诺夫并没有受军法审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乐巴丁递了一份详细报告到警察总署，陈述马尔地诺夫的病情，说他正患着一种癫痫病。

马尔地诺夫在老监里住了一个月。他给戴上了脚镣。他的散步和读书的权利都给取消了。过后那件事情也就慢慢地被人忘记了。

一八九六年离开席吕塞尔堡的同志们中间的第三个人是米海尔·雪巴林。他是一个数学家。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的党做过了种种的事情。

一八八三年春天由于雅库博维奇的建议，雪巴林成立了一所专印革命传单的秘密石印局。以后又决定再创办一个专印书报的印刷所。雪巴林假装和卜拉斯科夫亚·波哥拉斯结了婚，然后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夫妇一块儿搬到那个预备作印刷所的住处去。一个聪明的少女玛利亚·库利亚卜科扮作老妈子。他们三个人对印书的技术一点也不懂。可是他们非常热心，不久印刷所居然印出了一些传单、一本小册子和许多别的东西。印刷所同外界的联系工作是由德加叶夫担任的。那时德加叶夫在彼得堡的奸细活动已经开始了。这年八月或九月德加叶夫便动身到国外去，他在国外见到季霍米罗夫和玛利亚·奥沙尼娜，向他们认罪，表示

愿意脱离特务的关系。季霍米罗夫和奥沙尼娜跟他谈好了条件：倘使他能帮忙党把苏杰伊金[1]杀死，则他的生命可以保全。德加叶夫带着这个命令回到俄国，继续扮演他那特务的角色。

德加叶夫在他杀死苏杰伊金之前不多久，曾经劝告雪巴林离开彼得堡并且另外取一个名字。雪巴林真的离开了彼得堡，先到莫斯科去，后来又到了基辅，不过他并没有改换姓名。在基辅他又继续着印刷的工作。因此不久在一八八四年三月四日他的印刷局就被警察查封，他们夫妇同时也被逮捕了。

这年秋天经过了审讯的手续，卜拉斯科夫亚·雪巴林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米海尔·雪巴林得到十二年的苦役罪，给关到席吕塞尔堡里来。

他关进席吕塞尔堡的最初半年中间，他要求遣送到西伯利亚去，并且为着这事情绝食了三十天。据他自己说，他前十天里面很感痛苦，可是过了十天以后，他的饥饿的感觉就没有了，他反而觉得毫无所谓了。监狱当局想尽方法使他停止这个绝食的抗议。阿尔澜夫斯基想来说服他：他想用那种方法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雪巴林问这个内务部次官为什么把他的西伯利

---

① 苏杰伊金是俄国政府派去跟德加叶夫联络的宪兵队军官。

亚的苦役罪改成了席吕塞尔堡中的监禁，阿尔测夫斯基回答说这是沙皇的命令。人们为了想引诱绝食的人进食起见，每天放了一罐牛奶在他的近旁。雪巴林说，他在第三十二天里，看见一只苍蝇落进牛奶里面，他完全机械地捞了它出来，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到唇边舔了舔。从此他就终止了绝食。他一口气喝光了整罐的牛奶。

在席吕塞尔堡中雪巴林专心研究数学和外国语……他已经在牢里度过了十年的长岁月，忽然在一八九五年得到了警察总署来的通知：他的妻子和小孩还来不及押送到西伯利亚，就在一八八五年病死在莫斯科的兵站监狱里了。

第四个人是狄米特里·苏洛夫柴夫。他是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在沃洛格达的神学校里念书毕了业。他有着沉静、平和的天性，因此对一切学理的与思想的论辩他都不参加。可是很奇怪地他竟然加入了我们的党：虽然他反对任何的暴力，他却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担任印刷局老板的脚色。

在一八八二年我们便不得不把印刷局从莫斯科搬到敖德萨去，在敖德萨改由赛尔该·德加叶夫充任老板，而由苏洛夫柴夫担任排字的工作。可是一个月不到印刷局就被查抄，工作人员全体被捕。苏洛夫柴夫得

着十五年苦役的判决。

在席吕塞尔堡中苏洛夫柴夫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凭着他那单纯、温和的心灵，他居然向警察总署要求，希望能允许他将他的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带到席吕塞尔堡里来，由他自己教育，并且由他自己做工来养活他们。苏洛夫柴夫的想法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更惊奇的是他对于警察总署的好心会有那么天真的信仰。我们自然劝他不要把请求书送去，这个除了引起官吏们的讥笑侮辱外不会产生别的结果。苏洛夫柴夫又反对对于任何生物的残杀，因此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起初看守给我们送肉来的时候，他总是坚决地拒绝。

苏洛夫柴夫在被捕以前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我在莫斯科团体分裂[①]以后在沃龙涅什的河边找到他，他当时正患着疟疾，连个住处也没有，遇上坏天气，他就躲在小船里，并且只吃马铃薯过活。他在监牢里也是这样，出狱以后仍旧是这样。他在这次（一八九六年）遇赦出狱后就被流放到雅库次克省

---

① 指土地与自由社的分裂，这分裂是在沃龙涅什大会中发生的。后来又在奈斯诺开会，决定取消土地与自由社，另外组织两个团体，多数派的是民意社。

去，在那里他顽强地劳动，后来他回到欧俄① 以后，也是这样。他象一个真正的农人那样在地里工作。他从来不顾到自己的需要，他总是愿意拿他自己有的那一点东西去帮助别人。一九一八年俄国发生饥荒的时候，有些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帮助从前在席吕塞尔堡里面关过的人，也按月送了三百卢布给他，他当时生活很苦，也需要钱，可是他立刻把第一个月收到的款子送给沃洛格达的学校作为偿还他三十五年前领用过的公费。

一九二〇年我知道他迁居在沃洛格达，住在托特玛的一所自己修的小屋里。他自己种着一块小小的菜园，靠了菜园的出产，维持他半年的生活，其余的半年他就靠着他按月领到的十五磅的面粉过活（这个小城里的居民都是按月领到这么些面粉的）。这么一点东西实在不够维持他的生活，他只好挨饿忍苦，后来他便把屋顶上的钉子拔出来，拿去交换食粮。他写信给我说："七根钉子可以换到二十磅马铃薯。"为了御寒他拆下他的篱笆生火。"等着春天到来，我会到林子里去采折树枝编个新篱笆"，他在那封信里还说过这样的话。

---

① 欧俄即俄国的欧洲部分，指俄国本部。雅库次克省在东部，属于亚洲部分。

然而他仍旧是十分谦虚和客气，任何的困苦都不能迫使他向别人伸手求助。

莫斯科的看守和西伯利亚的警察对苏洛夫柴夫非常信任，而且都很尊敬他。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让他一个人在前院里散步，在那儿逃走的机会是有的。然而苏洛夫柴夫完全没有想到。"我怎么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信任呢？"有一次他跟我谈起那件事情，他这样对我说。

事实上他那无私的牺牲精神，他那对于外表和物质的淡漠，他那对于人与生活的孩子般的单纯的信仰使他高出于一般人之上。

“沙托夸”

在一八九二年或一八九三年，司令官韩加尔特要我们替他装订一本大得出奇的杂志《处女地》，这是由乌尔夫刊行的。在这刊物里我读到一篇短文，它给我的思想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它引导我开始了那些构成我监狱生活中一个新阶段(一个充满了光辉和健全的快乐的阶段)的学习。在这篇论文里我读到在美国开展了一个为着成年人开设补习课程的运动；这运动的起因是：一班中年人在实际活动与生活的扰攘中大都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他们盼望着有温习的机会。这种思想本身虽然很简单，可是它好象是一个启示似的，并且得着了大多数人的拥护。这运动的中心是大湖岸上的一个小城沙托夸，这个地方很快地就让那班渴想温习并且增加自己的学识的成年男女挤满了。“我现在四十岁了，”我想道，“我也要把我在大学里面学过的功课有系统地温习一番，并且还要开始研究那些我从前忽略了的问题。”

在这以前，凡是我在我们图书馆里找到的书我全读过了，可是我从来不曾做过有系统的研究。我受过医学的训练，然而我跟别的苏黎世的学生一样，对于我们在大学头两年中念的自然科学的功课并不注意。我听过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的课，因为那几门功课是必修的。可是在这些学科中只有化学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念过门德烈也夫①编的教科书，在伯尔尼②我又在席瓦程巴赫教授的实验室里面实习过；而别的学科却被我忽略了。我虽然承认自然界是一个美学的快乐之泉源，而非常重视它，并且对于自然界的美十分敏感，可是在当时我绝不想多知道一点自然界的事情。国内女学校中教的那些可怜的零碎知识只会毁灭人家对那门学科的一切兴趣。医科课程的狭窄的眼界培养了我的这种对自然界的淡漠，而后来革命的活动又把我的兴趣集中在社会问题上面，此外的任何兴趣都遭受排斥。只有在关进了席吕塞尔堡以后，我离开了人群，离开了自然界，在这儿我的整个的宇宙就只有这么小小的一片天空和这么小小的一块土地，到这时我的对自然界的态度才改变了，我才明白我对于自然界的一

① D.I.Mendelyeev（1834—1907），俄国化学家。
② Bern（Berne），瑞士的一都。

切现象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我不知道天空的历史，也不知道大地的产生和发展，更不知道岩层的构成和进化，而我们要塞的围墙就是用岩石建筑的，我们脚下践踏的也是它的碎片。要是我俯下身子，在一个沙堆上抓起一把给春天太阳晒热了的沙粒，然后慢慢地张开手，象一道细流似地从我的手里流下来那些浅红色的碎屑和漂亮的发光小粒，那些透明的小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儿有种草跟我们村庄公墓里面长的完全一样；还有一种花是我们从前采集铃兰时我在林子里常常看见过的，可是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我也认不清它们。我起了许多疑问，我自己却回答不出来。

我这种迟缓的觉悟（即对于自己知识浅陋的自觉）确实是我读到关于沙托夸计划的论文时发生的，可是起先我却走了一条错路。我关进席吕塞尔堡的时候，随身带来了我所有的医学书，这次我便下了决心要把它们全温习一遍。然而刚一开头我就明白我这种办法是错误的。既然我永无希望把我的医学知识应用在实际生活上面，那么我为什么还要重读病理学和治疗学呢？既然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领域还有很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温习“过去”呢？“过去”并不会扩大我的视野。自然科学便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一个领域，我便专心去注意它了。

我们的图书馆在那时候是十分贫乏的，然而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却有一本很好的书，奥尔士华特的《植物学讲义》，还有着精美的彩色插图。我热心地读完了这本书，然后开始在显微镜下面研究植物的组织。我们有了一架显微镜。这是韩加尔特用了五十个卢布替我们买来的，这五十卢布还是我们一班同志在彼得大帝的阵亡将士（他们是在彼得大帝攻取席吕塞尔堡时[1]战死的）的公墓四周修筑一道围墙时候挣来的。我们需要的试剂却是由狱医奈米索夫给我们弄来的，他很周到地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

这时候我也开始在研究化学。我又在研读门德烈也夫的那本广博卓绝的教科书《化学基础》，我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这本书给我的知识真不少。可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满意——我希望的是活人的语言，是我那些更有学识的同志们的指导。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自然科学家约·杰·鲁加雪维奇，他是在一八八七年他快要毕业的时候被捕的。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教授们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他们还想留他在大学里继续研究。他非常熟悉科学研究的方法，又有着完备而精确的知识，因此对于他那门学问中的任何问题他都可以

① 一七〇二年彼得大帝由瑞典人手中夺回席吕塞尔堡要塞。

给一个十分确定的回答。他对自己的学识非常谦虚，他做概括时绝不草率，接受假定时也很小心。同时他并不是独占知识，只要有人找他帮忙，他就肯把他的知识分给任何人。我也去找他，请他给我们作有系统的讲课，并且指导我们对自然科学作实际的研究。鲁加雪维奇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诺瓦鲁斯基、莫洛左夫跟我一块儿做他的听讲者，潘克拉托夫偶尔也来参加。诺瓦鲁斯基加入听讲，全是因为他以前受的是神学校的教育，他完全不懂自然科学；而莫洛左夫从小就喜欢研究自然，连对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他也从来听不厌，所以他也来听讲。

鲁加雪维奇跟莫洛左夫结伴在"第五号笼子"里散步，在那儿他放了一块自制的画图用的黑板，我当时在他的隔壁"第六号笼子"里散步，所以能够听见他的话，而潘克拉托夫和诺瓦鲁斯基两人那时候正在第一号园子里面做工，他的话他们也听得见。我们就这样地学完了无脊椎动物学和植物学的课程，关于植物学我们图书馆里倒有几种好书。鲁加雪维奇的灵活的手用日本蜡做了一些精美的标本作为讲解的说明，在这些标本里面，他的水母和萨尔帕是非常之好，而他那些组织学的标本和许多幅图更使他的讲解十分明白易懂。

到了一八九六年我们开始从圣彼得堡的流动博物

馆里借来它的丰富的收藏时，我们便能够详细地研究我们极感兴趣的矿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了。后来博物馆方面把我们由被动的阅览人的地位提升到增加博物学方面的收藏的主动的合作者的地位，那时制造干腊植物标本和采集矿石的实际工作又使我们从书本上以及从鲁加雪维奇的讲解中得来的知识更加充实了。诺瓦鲁斯基有一次把我们经过柏兹洛得诺夫医生的手送到博物馆去的东西统计了一下列出一个表来，我们自己也想不到我们居然在三、四年中间替那个文化机构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可是我们出狱以后才知道我们做的东西并没有完全交到博物馆去，许多的标本显然是遗失了，这是一件痛心的事。鲁加雪维奇、诺瓦鲁斯基和我把成千的植物弄干来做干腊植物标本，它们整堆地放在我的工场里面，等候着诺瓦鲁斯基跟我两人来把它们贴在白色的纸板上(我们叫它做太太的纸板)，那些保持碧绿色的草在白纸板上看起来十分美丽可爱。对于这种工作我们后来变成了熟练的专家，我们擅长把带有纤美的叶子的植物制干，然后贴在白色纸板上，结果颜色的新鲜和设计的美丽不仅博得我们一班同志的称赞(他们在狱中要求过展览我们的出品)，并且在巴黎博览会中还得到了一致的赞扬，那是由博物馆送去的，自然不曾说明这些标本是从俄国的

巴斯底里面来的。

一方面我们有着很多的空暇，另一方面在监牢里又必须用少的东西求得大的效果，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激发了我们一班同志的发明才能，提高了他们的技巧，他们的的确确做出了许多的奇迹。他们为了研究物理学，便将就我们所能使用的那一点点的材料制造了一个简单的起电盘，一个验电器，连一架小的发电机也制造出来了。诺瓦鲁斯基非常热心地在采集昆虫学的标本；他为了想得到昆虫发育的各个阶段的材料起见，便在牢里养起昆虫来。为着这个目的，他造了一座两层的玻璃小屋，里面再隔成许多小房间，我把他的这座玩具般的小屋叫做“孤立的监狱”，他就把各种的雌雄两姓的昆虫分锁在这些小房间里面。它们就在那儿下卵，从那些卵又孵出了幼虫来。各种的昆虫都需要新鲜的植物做食料，诺瓦鲁斯基居然有耐性每天花掉两个小时的光景到处去找寻它们需要的植物。他的这个大家庭渐渐地兴旺起来了，等到昆虫发育的各个阶段全有了的时候，他便拿它们做起标本来。这些标本都是放在精美的小盒子里，外面糊上一层花纸，盖顶是玻璃的。盒子里面放得有完整的昆虫，另外又放得有那昆虫的分解了的肢体，连最小的触角和管状吸吮器官都是很完备的，他就只靠了一把放大镜和一把小镊

子的帮助居然完成了这件工作。在同一个盒子里面他还把昆虫发育的各个阶段(从卵到成虫)完整地展示出来。

当我们需要材料来制造孢子植物的干腊标本时，鲁加雪维奇表现了他的绝顶的聪明;按照他的要求,从矿物肥料商店买了一磅干的海藻，从药房买了一磅地衣，地衣是拿来培养黏液的。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开,他怀着极大的耐性把它们浸湿,他又非常仔细地修整它们,压榨它们,然后靠了一把放大镜,一架显微镜和一个移液管把它们一一分类,最后才交给莫洛左夫、诺瓦鲁斯基和我做成干腊植物标本。

我们研究地质学的时候，鲁加雪维奇绘了一些很漂亮的彩色图。图上面有一直栏画着动物和植物的形态，说明它们在地壳各个发展时期中的进化。另一栏表明在这些时期中地球纵剖面的变化，第三栏列举每一个时期中的代表性岩层。鲁加雪维奇还不满意这些图，他又做了一个长而直的盒子，配合着动植物形态的图画安放了这些岩层的小标本，这盒子里面画着一幅地壳的纵剖面。我们为了实习起见，靠着从博物馆借来的偏光显微镜的帮助，把我们采集的矿石和岩石标本拿来跟博物馆借给我们的标本比较了一番，并且根据它们的表面来分了类。至于结晶学的研究，鲁加

雷维奇用木头做了许多的模型，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我们就练习从这些模型中认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个工作在诺瓦鲁斯基做起来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却常常因为我的匆促而错误的分类引得他们发笑。一个人的眼睛怎样逐渐地给训练好了，观察起来倒是很奇怪的。譬如一个旅行家刚刚到了日本或中国，不能够辨别每个日本人或中国人的特征，却以为他们全是一样的相貌，我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我起初在那些复杂的标本中间就只看出一种形状。后来我的眼睛渐渐地学会了在角、棱、面的中间看出种种的区别来。

博物馆派给我们做的工作中有一件是制作花的标本，就是把花和它们的各个部分完全配置好，装在玻璃盒子里。这个工作由诺瓦鲁斯基和我两人担任，我们做了几百件这一类的美丽的标本装置，每一件都附了说明。在替博物馆做的种种工作中，诺瓦鲁斯基的效率最高，我以为在他之后就要算我了，莫洛左夫应该列在第三名，他专门采集青苔和地衣，他非常仔细地把它们装置在一些干净的硬纸盒子里面。

我们也没有忘记研究化学。在鲁加雷维奇的指导之下，诺瓦鲁斯基和我学完了一门实用分析化学课程，这一门学科在我算是复习，而在诺瓦鲁斯基，它却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在老监里面有一个专供我个人工作

的工作间，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做我们的分析实验：我站在我工作间门上那个小窗洞的旁边，而鲁加雪维奇和诺瓦鲁斯基却站在外面走廊上。这样一来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想观察的化学反应了。每次我们做完了一套实验以后，我就会转身向着鲁加雪维奇，高兴地对他说："鲁加，你真想不到，你灌注在我心上的光明使我多么快乐！"过后我又会添上一句："可是这儿还有一个黑暗的角落，你把它也照亮吧！"于是我们又准备着别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了。

因此在几年中间我们把自然科学的几个最重要的部门都一一地研究过了。对于我，这些讲解和这些集体的实地研究使我这空虚的监狱生活也有了意义。除去精神劳动所给我的快乐以外，我还有另一种快乐：观察我们这位没有人比得上的讲师的永不枯竭的利他心（为了帮助别人他从不吝惜他的时间和精力），便是一个流不尽的快乐的泉源。我们自己的手所做出来的东西一方面使我们因为想着自己参加了文化教育工作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还使我们得到巨大的美学的快乐。监狱里面没有一样美丽的东西，然而我们却创造出令人不能不赞美的美丽、精巧的东西来。

这一切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把鲁加雪维奇、莫洛左夫、诺瓦鲁斯基和我四个人结合成一个亲密的圈子，由

于共同的工作和继续不断的见面来往，我们的友情逐渐地增加了，并且在大家离开席吕塞尔堡以后，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通　信

来迟了的快乐并不能温暖我们的心，所以经历了十三年的牢狱生活以后，我们得到了通信的权利，当时我没有一点高兴。在这十三年的长时期中间，我的家族亲戚们都已经渐渐地退到远处去了。我们的生活的路分歧了，而且愈走愈隔得远。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好象是死了一样。象这样长期的没有再见希望的分别不是就跟死一样吗？倘使当初我们进监狱的时候就有着通信的权利，——那一定会是多大的幸福；接触我们的亲属就等于接触活人的世界。可是他们不愿意我们这样，连这一点权利他们也给我们剥夺了；他们故意给我们安排一种反常的处境，使我们跟一切习惯的正常的事物隔绝，想由此为我们造一个奇怪的野蛮世界，一个"洪荒世界"，让我们住在这里面。

通信的权利也许会恢复我们跟我们亲属的联系，缩短我们中间的距离，增加我们的感情，可是我们一年里面只能收两次来信、发两次回信。只有两次！单是

这个限制便妨碍亲密的接触，迫使我们的热情冷却。并且我们还不可以保存外面的来信，读过的信函都得一一退回。可是谁都知道，人在某一种的心境之下重读旧信，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怎样，在我呢，看见亲人的笔迹的确是一件愉快的事；当我看着一封信的时候，在我的心上就涌现出写信的人的面貌，并且联想到他的主要的精神特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件却不同了，它们是没有人性的，我一点儿也不想收藏这样的信件，它们并没有笔迹的分别，并且只有在看到签名以后才能够断定写信的人是谁。

在我们这样的生活情形里面，外面的来信并不曾给我们带来快乐，它们带来的反而是焦虑；我们很兴奋，然而没有快乐的感觉。不！这是一种痛苦的兴奋，这样的兴奋是那班宁愿忘记一切的人才有的，当他们的平静的心境因一件使他们记起外面世界的东西的闯入而被扰乱了的时候。

冈察洛夫① 告诉我们，在奥勃洛莫夫村里，收到一封信，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它扰乱了奥勃洛莫夫村里

① I.Goncharov(1813—1891)，俄国小说家，奥勃洛莫夫是他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在奥勃洛莫夫的身上体现了当时一部分俄国人的惰性和多愁的性格。

人的日常生活，给他们带来了紊乱。在他们看来，信就是苦恼和麻烦的使者，那里面不会有什么好的东西，他们并不忙着拆信，却让它等一会儿！得让他们看惯了那个信封，准备好了接受那信的内容——这样他们总是在三四天以后才来拆信。在我们中间，也有跟这个类似的情形，譬如乐巴丁，要是他在饭前接到一封信，他总是把它放在一边，不让它败坏他的胃口，他认为信里一定有什么不愉快的消息；他吃过了饭，还是不去读信，免得它妨害他饭后的休息。自然，我们里面并不是人人都象他这么镇静理智的。

究竟我们的亲属给我们写些什么呢？他们的信里没有一句关于公众事务、社会生活的话——那是警察总署不许可的。在这些信里面唯一的例外就是那封最先寄到牢里来的信函。那是我最小的妹妹奥莉加写来的十六页的长信。这信里并没有什么问好、关切、感伤、解释一类的开场话，那样的话会使我兴奋感动的；她跟我讲话，就好象我们姊妹刚刚在极寻常的情形下面分别一样，也可以说，好象在我们分别了的十三年中间，她已经写过了很多的信，这不是第一封，这至少是三百零一封了。她描写着一八九六年下诺夫哥罗德的俄国工业展览会，以及在同时举行、而且引起了当时一般人非常注意的“大会”。由这一点，我的妹妹又讲到威

特[1]的财政政策，以及由它产生的俄国工业的发达。她又讲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由于俄国工业的进步而受到很大的鼓舞；她又讲到民粹派和马克思派的斗争，马克思派这时正经过了他们的最初的狂飙时期；她又讲到在文学中，在家庭圈子里，经济的唯物论引起了意见分歧，引起了论辩，而且几乎引起了争吵，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中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热烈的争辩。这封信的内容不象是私人的，它完全带着一种社会的性质；我们在信中感到了生命的气息，我们听到了年轻的、挑战的声音。这封信传遍了整个监狱，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绝大的关心读了它。然而，我已经说过，这第一只燕子，就是它这一类的唯一的一只。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得到过这类的信函了。这一封信之所以逃过了警察总署的关口，不曾引起注意，完全是因为我的妹妹很巧妙地将社会事件织在普通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闲谈这一类的场面的中间。

我们亲属的来信通常总是讲些关于天气的话；什么天旱啦，暴风雨啦，冰雹的损害啦。他们还讲些麦子

---

① SergyeyY.Witte(1849—1915)，俄国政治家。在一八九二到一九〇三年间他是俄国的财政大臣。

的收成，果子的收获诸如此类的事；还有不少的篇幅便让家庭中的记事占了去，象什么结婚、生产、死亡等等，都详细地记录着。不管这些信的内容是如何地单调，它们仍然传遍了监狱；我们热心地读着它们，就象我们在头几年中间那样，不论抓到什么东西都拿来反复诵读，连那份毫无价值的神学刊物《进香客》，我们也仔细读着，我们总想在什么地方，哪怕就是一行一句也好，找到一点与生活、与时事有关的暗示。

这些信虽然不曾满足我们那个想知道在外面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愿望，但是那唯一的可谈的话题——家事，却给我们不少的同志带来悲哀和痛苦；这方面有时候是很悲惨的。有一个同志得到信说他的孤寂的年老的母亲连一个住处也没有。她显然是患了忧郁病；她常常在夜里离开家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荡来荡去。有一次她把她所有的东西全堆在一块儿，正要放火烧掉它们，给人发觉了。大概那些跟她同住的人因为时时都要看住她，觉得太麻烦了吧，这位老太太便不得不搬到另一个城里去住。可是在那个城里她没有亲戚，没有熟人，也没有任何的进项可以过活，她只好到孤老院去。谁都知道孤老院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这母亲是一个平常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她有她的自尊心——她一辈子就讨厌那些给无家的人居住的慈善的

收容所。我们的同志要求准许他把在监牢里挣的钱给他的母亲寄去。警察总署不答应，不过警察总署自己寄去了五十卢布。然而钱给退了回来，警察总署通知儿子：钱到时，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在另一个人的家里，情形更坏，招致了破落的结局。母亲早就精神失常，已经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好些年了。父亲是一个地主，孤寂地住在一个单调无味的外省小城里自己的庄子上，害着重病快要死了。一些陌生的人围着他，在计划分他的家产。他的两个妹妹吵得厉害，居然到了彼此不讲话的地步，第三个妹妹被他们疏远了以后，堕落到社会的最下层里去了。这许多事情是在好些年里面一件一件地发生的，可是现在它们却象铁锤的一击似的，一下子全打在那个囚人的头上来了。

安托诺夫的不识字的母亲的来信是简单而恳切的：自然这都是她口述而由别人写下来的信。她抱怨她的寂寞，伤心跟她儿子分开不能见面，又说到她晚年的孤苦无靠，在悲痛的句子后面她一定要加上一句："可是上帝啊，求您的意志实现吧！"

可是我们呢？我们应该写些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写我们的同志的事，也不能说到监牢房屋的构造，建筑的式样，连我们住的监房的情形，监狱的管理条例等等

也都不能写出来。警察总署的检查员老是用一种猜疑的眼光读我们的信，而他的猜疑已经到了可笑的程度。有一次乐巴丁写信给他的弟弟，信里讲到失眠症时，他引了一句普希金的诗："午夜的明月在哨兵的枪头刺刀上发光。"警察总署把信退了回来，要他重写。一个卫兵在要塞的围墙上走来走去，在要塞的上空就跟在整个大地的上空一样，照耀着一轮明月！无怪乎警察总署的检查员会在普希金的诗里面找出暗示牢中监房的位置的意思。事实上，警察总署在规定我们只能抒写个人自身事情的时候，倘使他们盼望着在我们信里看到我们心境的反应，发现我们见解的改变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失望了；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谈到我们自己的感受。

既然我们这个生存的外表是这么贫乏，而我们的内心生活又被我们密密地封闭起来，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既然我们都尽力避免把我们灵魂的任何一个角落打开让外人看见，既然他们不许我们提这个说那个——那么在我们的信里难找到自由、亲切的调子，也是很平常的事。信里的话多半是勉强的，不自然的；我们常常不得不花费很多的功夫写信，只是为了勉强凑成够多的材料去填满大幅的信纸。不用说，我们不能够让半张信纸空着就寄了出去！幸而这些检查员读

长信读得厌烦了，即使规定一年只寄发两次信件，他们也嫌检查起来麻烦，不久他们就改发普通的信纸了。

在过去的十三年中，亲戚的关系疏远了，记忆淡了，对于亲属的感情改变了，也可以说是有点变怪了。当我知道我所喜欢的舅舅已经死了时，我也只是觉得遗憾而已。我不好说这遗憾是一种多么冷淡的、纯粹理性的感情！可是那只跟我一块儿住在我监房里的小鸟发了一阵痉挛死去时，我却感到真正的巨大的悲痛。那只鸟已经养驯了，它坐在我的肩头啄食我手里的花椒果。我能够用我的手掌盖住它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它站在我桌子上愉快地叫着，它在通着水管的净水盆里洗澡的时候，高兴地拍着翅膀往四面八方溅起水花。它死后，我整整哭了两个星期。我一看到它平日栖息的那只木钉，我就止不住我的眼泪。为了制止我的悲伤，我不得不要求督察长给我暂时换一个监房。不，我无意写语短情长的信。

有一次莫洛左夫为着确定他给母亲和妹妹写的信里并没有犯忌的话免得让检查员退回起见，在我们一块儿散步的时候，他特地把那封长信念给我听。等着他念完了，我便说："好，这倒是你的讣闻的好材料。"我们两个都笑了。在本来是应当哭的地方我们却笑了起来！我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〇一年中间寄回家去的那些信

里面也尽是这一类的缺乏自然和坦白的、苦心写出的文句。只有在一九〇三年，我的麻木的灵魂才给唤醒了，那是在我被强制长期停止通信之后，我忽然得到消息说我母亲在生病，快死了，我才明白我是永远，永远再见不到她了。

不错，通信不是一件快乐的事，而是一个负担。警察总署并不明白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那些官员们以为他们减轻了我们的痛苦，可是事实上这是一种嘲弄。要是狱吏们在允许我们通信之前先来问我是否愿意，我一定回答一声："不，"不过同时我得请求他们不要对我母亲提起我的这个答复，免得伤了她的心。

潘克拉托夫和帕立瓦诺夫

一八九八年潘克拉托夫离开了席吕塞尔堡，一九〇二年帕立瓦诺夫的刑期满了。

瓦西里·潘克拉托夫是一个车工。他小时候很穷苦，他的父亲死得很早，遗留下一大家人，都是些小孩子。"我们真是很穷，要不是我们邻居的农人们帮忙我们的话，我们已经饿死了"，潘克拉托夫有一次对我谈起他这时期的生活情形时，他这样说。

潘克拉托夫在彼得堡作工，他很早就加入了革命党。后来他的一个同志向官厅自首了，他因此不得不躲藏起来。一八八三年他同工人马尔地诺夫、安托诺夫参加了民意社的军事组织。

那时我们的党已经到了衰落的时期。潘克拉托夫在基辅被捕的时候，他实行武装抵抗，打伤了一个宪兵。他因此被判处二十年的苦役罪，跟加老罗夫和马尔地诺夫一块儿给送到席吕塞尔堡里来。在基辅的监狱中，人们把他们当作普通徒刑犯那样剃成光头；这

个办法曾经引起他们的坚决的反抗，这反抗还得到其余的囚犯的支持。

潘克拉托夫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了席吕塞尔堡，那一天在我是值得纪念的，因为看守把他带进了我隔壁的那个监房，他算是我被捕以来的第一个邻人。在彼得堡罗要塞中我是完全单独的监禁着，以后就来到了席吕塞尔堡，我，一个陌生的囚人，不懂得监狱里谈话的方法，也不知道敲壁的技术。我们许久都无法交谈，只好失望地、困恼地离开我们中间的那堵墙壁。后来我们终于学到了敲壁的方法，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潘克拉托夫关进席吕塞尔堡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他这样年轻就结束了他的自由生活，这情形唤起了我对他的深切的同情。我比他大十二岁，我觉得象他这样一个充满新鲜力量的年轻人会比我更难忍受我们的这种生活。所以我怀着母亲般的慈爱对他，在我为他写的诗里面，我也曾表露过这种感情。

潘克拉托夫性情急躁，又激烈，不肯向人低头，又不能忍耐，可是他对我却不是这样。他憎恨宪兵恨到彻骨，连极寻常的事情，他也归咎于他们，其实据我看来，这些事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我常常安慰他，解除他的病态的怀疑，设法避免他的发作，我知道他的病态

的愤怒一旦发作，就会给他招致不幸。督察长沙科罗夫知道他拒捕的情形，也知道在基辅的狱中剃头时他发狂的情形，便非常小心不去激怒他，也不象欺负别人那样去虐待他。因此潘克拉托夫在席吕塞尔堡中还平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在我们头几次的敲壁谈话里我就知道潘克拉托夫很想好好自学，我便鼓励他，并且尽力给他帮忙。事实上他在席吕塞尔堡中的漫长的岁月并不是白白地浪费了的，等到他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极丰富的学识，这使他后来在西伯利亚能够参加科学考察，并且在地质学上有新发现。

一八九六年的大赦把他的刑期减去了三分之一，他本来应当在一九〇四年出狱的，却在一八九八年就离开了我们。

帕立瓦诺夫一八八二年被关进亚历克赛半月堡中，两年后才移到席吕塞尔堡里面来，一九〇二年他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被释出狱，流放到阿克摩林斯克省去。帕立瓦诺夫从那里逃到了外国，然而一九〇三年他却莫名其妙地在法国用手枪自杀了，当时他正在跟阿柴夫[1]商谈什么事情，并且后来我听见人说，他正准

---

[1] Y.Azeff，是俄国革命党中的一个奸细，他是德加叶夫一类的人，不过比德加叶夫能干。他的秘密后来被蒲尔切夫揭露，但他本人却逃掉了。

备着跟阿柴夫合作在俄国国内干一桩恐怖主义的暗杀事件。

彼得·帕立瓦诺夫是萨拉多夫一个阔地主的儿子。他是革命阵营中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还是在中学校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热诚和信心。他的浪漫气质鼓动他一八七八年到塞尔维亚去做义勇军，参加塞尔维亚的独立战争。一八八二年他已经加入了民意社，他计划把他的一个同志诺维次基从萨拉多夫监狱中救出来。他实行这个计划时杀死了一个警察。然而计划却失败了：他们逃走时坐的车子翻了；诺维次基、帕立瓦诺夫和另一个同志拉伊可被追赶的人捉住，并且受了酷刑。拉伊可因伤重死去了，诺维次基和帕立瓦诺夫被判处死刑；被告们递了请求减刑的呈文上去，于是两个人的死刑减成了终身惩役。帕立瓦诺夫解释道，他希望由这请求减刑的呈文减轻诺维次基的恶运。他对我们说："我想他愿意活下去，可是没有我他不会递什么请求减刑的呈文的。"其实他是觉得自己应对劫狱一事负责。

在亚历克赛半月堡中帕立瓦诺夫受了很多的苦，使他几乎自杀。不过他写下了一部艺术价值很高的回忆录，这是在席吕塞尔堡中写作的，出狱以后凭着记忆写了出来。他的神经衰弱很厉害，并且还常发忧郁

病，这使我们大家非常担心。他在发病的时期中竭力避免跟同志们见面谈话：他整天不肯离开监房，就在里面不停地走来走去。这时候他的心境很郁闷，充满着疑惑和猜忌，跟他平日那种和善的性格完全不合了。

帕立瓦诺夫非常爱读书，他是用了快得令人不能相信的速度在吞食书本。有一次我对他表示我的惊奇，他便回答道："我同时看读十五行。"我记得我在什么地方读过一则记事，说只有著名的小说家左拉读书时候是这样地快。帕立瓦诺夫读书并非随便浏览，我们有好些证据证明他把他所读过的东西记得非常清楚。例如他有一次对着我们把很厚一本伦敦《泰晤士报》的周刊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他的非凡的记忆力使他能够在席吕塞尔堡中积累了很丰富的知识。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史和社会科学。除了他那部亚历克赛半月堡中的回忆录外，他还写了一本监狱生活的故事。这两本书表现了他那卓绝的文学才能。在我们大家热心写诗的时期帕立瓦诺夫也写了不少俄文诗和法文诗。

在我们中间帕立瓦诺夫得到不少的朋友；我们不能不爱这个聪明而又和善的同志；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豪侠的气概，同时他又有着单纯的孩子气。

当他得到了自由，有机会从事广泛的活动并且满足个人的抱负的时候，他却在国外自杀，我们这些跟他一块儿度过阴暗愁惨的狱中岁月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大为吃惊。

工场与园子

从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起，牢里开设了很多的小工场，因此凡是愿意做工的人都有使用那些工场的权利，在那时候，体力劳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政府支付购买各种材料的花费倒很慷慨，我们便开单购买了很多的木板、木块（留待车旋后使用）、镶盖板（常常是很贵重的木料的镶盖板）、漆、薄纸板、厚纸板和纸。我们中间有的人做了精致的家具，有的人却做一些粗的用具，譬如：衣柜、书物架、安乐椅和普通椅子之类。有几个人擅长用枫木、胡桃木、栗木等等材料做匣子；或者车出菜盆、花瓶、碟子之类来，这些是司令官和狱吏们定做的，有的则供我们自己使用。我们的工作因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做的，所以出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美观，而且常常是很雅致的。其实我们中间只有三个同志是工人出身的（潘克拉托夫、马尔地诺夫和安托诺夫），此外谁也没有拿过凿子、刨子，我们全是从

那本涅基次的手册里学到的。我们试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并且有过一些小小的发明，这在那班为了糊口而工作的人是办不到的，我们有时候居然完成了一些使我们自己得着不小的审美的愉快的杰作。那些特别美观的出品常常要陈列在走廊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它们。例如安托诺夫花了半年功夫雕刻出来的碗橱就这样地陈列过。他为了这件工作得到二十五个卢布，他把这笔款子分给我们大家。

安托诺夫多年来一直在争取弄到一个熔铁炉来做钳工工作。后来在一九〇〇年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可以安置这个熔铁炉了。为着这个目的，我们一班同志自己动手在卫城的大院子里建筑了一大间房屋；提到这个院子，我们都会记得，我们中间有好些人（连我自己也在内）曾经穿过它走到惩戒室去，惩戒室就在那个极象拷问室的神秘的古建筑物里面。可是从一八九三年起情形就不同了，现在在这个旧拷问室的十个监房里面，每天总有十五个到二十个人快活地在工作；到后来这些人在工场里作工的时候，宪兵们也难得把门锁上了。那个老监从前总是显得极荒凉、可怕的样子，现在它的宽阔的走廊却堆满了细木工使用的各种木板。在铁匠铺里我们的同志们自己造了一个熔铁炉，于是工作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给制造了出来：剃

刀、小刀、木工工具、糖钳、小斧子。安托诺夫自信地对我说，他能够造一架汽船的发动机，还能够给我制造一架钢琴。

我们的园艺也很发达。我们根据目录开单买来了各种蔬菜和花卉的种子。到后来我们栽培了四百五十种不同的花。在这方面鲁加雪维奇特别擅长，他从小就是一个养花能手和植物学爱好者。至于蔬菜呢，我们甚至在一个园子里举办了一次蔬菜展览。在一个用罩布装饰着的宽阔的坛上（罩布是用一些彩色蝴蝶结系住的）陈列着鲁加雪维奇的大萝卜，安托诺夫的大洋葱，我自己的草莓，瓦西里·伊凡诺夫的蔷薇，帕坡夫的番茄等等东西……。参观者中除了囚人外还有司令官韩加尔特和医生。鲁加雪维奇开单选购种子时，他记起那班抽烟的同志（他们在席吕塞尔堡中很感到没有烟草的痛苦），他便写上一个拉丁名字 Nicotiana，这样居然让他弄进来了一种上等的烟草，后来又弄进来了马合烟草① 的种子。我们下了种，等到叶子长大，我们便把它们采下来，晒干，于是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便抽起烟来，起初只是秘密地抽，后来就索性公开了。我们没有火柴，只好设法找火种，这样我们就经过了人类在

---

① Makhorka，一种又粗又烈的下等烟草。

制造火种的历史中所经历过的一切的阶段。诺瓦鲁斯基想出一种摩擦的方法，用一根旋转的金属杆，但它只冒烟，不发火，一个火星也没有。苏洛夫柴夫提议用火石和钢的办法；他把烂布烧起来了，拿朽木给抽烟的人引火。在我们花园的土壤中有着不少的火石：他甚至用硫磺同木屑制造了一些硫磺火柴。烟草的烟雾和气味很使狱方担心，他们便设法索性使抽烟成为公开许可的事。一八九六年内务大臣郭列米金视察监狱时，柏兹洛得诺夫医生便向他要求允许我们抽烟，说烟草可以预防坏血病，郭列米金居然答应了。可是火柴的分配量很少，许多抽烟的人都把一根火柴分作两根，这样满足了他们的嗜好。

我们一些同志对种花种菜的事非常热心，非常爱好，所以单是那六个指定种菜的园子和那六个我们在监禁期的第二个十年中间种花的“笼子”似乎太小了。我们后来得到韩加尔特的许可又开辟了两个园子，算是第七园和第八园。以后那两个热心家弗洛林柯和帕坡夫居然又弄到了旧卫城的那个大院子。他们跟别的同志们一块儿把它耕种起来，从前我给他们带到惩戒室去的时候，我见过的而且使我感到莫大喜悦的那块原始的草地现在给他们破坏了，但他们也毁掉了那个凄惨的刑场的一切严酷凶残的痕迹，在那个刑场上曾

经枪决了我们的同志密纳科夫和麦秀根，后来在一八八四年罗加乔夫和施特龙贝格又死在那儿，以后在一八八七年乌里扬诺夫[1]、射威列夫、安德烈尤席金、奥西潘诺夫、格涅拉罗夫全在那儿受刑。至于那个历史上的监牢，现在那里面开设了好些小工场，就在那个历史性建筑物前面，我们的同志们种了一大块地的烟草，一大块地的番茄，一大块地的胡瓜，并且还开辟了许多的温床，在温床里连甜瓜也给他们培养出来了，他们还给甜瓜起了那么响亮的名字：金善。爱好园艺的弗洛林柯在园子和"笼子"的每个角落里都种了果树和草本果子。当他为了购买插枝需要钱时，他向我们的共同的团体请求允许他个人单独接受订货，那么他便能够挣来他所需的款子（十个卢布）。可是这个要求却牵涉到"原则问题"了：它是不是跟集体主义的精神相冲突。我们辩论了许久最后才决定：不让弗洛林柯单独接受订货，不过他所需要的钱（就是超过了他所要求的十卢布，也无妨），可以在公共的基金中支出。

就靠着这些小工场和这些分给我们耕种的地，我们的监狱才逐渐进步（不过进步得很慢），而变成一个

---

①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是列宁的哥哥，因参加暗杀亚历山大三世的计划，被处死刑。

与外界隔绝的工作社会，跟一个正在忙碌劳动的蚁冢倒有点相象。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对于既没有确定的目的又没有系统地读书的事情都感到了厌倦；我们对于研究学问而没有希望把所得的知识拿来应用的事情也都感到了厌倦；还有，继续不断地想着那些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梦，永远因为那些同样的愁烦而痛苦；这类的事也使我们生厌了。我们既不能够献身于社会工作，也不能够创造或生产一件于别人有利的东西，而体力劳动倒使我们紧张的神经得到了松弛，我们的精力找到了一条出路，并且只有在这一个范围里面我们才能够主动地发挥我们的力量；虽然我们的目标也只不过是用我们的劳动把这个不毛的岩石的土地改变成柔嫩的草木场，把这荒凉的沙漠变为果树园。有时候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方面居然造出了奇迹。瓦西里·伊凡诺夫在他那块小小的土地上把各种的蔷薇全培养出来了。他这儿有月季花、苔状蔷薇、爱尔兰蔷薇、黄蔷薇、处女红蔷薇，品种之多，记都记不住。鲁加雪维奇和诺瓦鲁斯基做了一些洋铁管，把水引进他们的园子里去，他们在园里造了一个五尺高的喷泉。喷泉的细流落进一个小小的圆池子里面，池子是用杂色的石子镶底的，四周种了一圈水草、十字花和别的东西。当细股的水喷在空中，往四面射出水花的时候，池里的水也静静地

在飞溅，并且发出喁喁的低语。我常常管这个叫做“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①

诺瓦鲁斯基跟鲁加雪维奇两人特别热心美化我的环境。诺瓦鲁斯基沿着“第一号笼子”（大家都把这块地看作我的私产）的篱笆种下了多年生的牵牛花。每年夏天牵牛长得极繁茂，它那沿着篱绳盘旋缠绕的藤子，爬满了整个篱笆，造成一面厚密的绿墙，墙上点缀了一些大的白色铃子，这是新开的花。空气里只要有了一丝的风，这面活的墙就会象一幅可爱的绿宝石的帘子摇动起来。诺瓦鲁斯基又用一根洋铁管子把水引到“笼子”中央那个三角形的花坛上，在那儿给我也造了一个“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跟我以前赞美的他和鲁加雪维奇两人种的园子里面的那个喷泉完全一样。这一面完全掩盖了监狱篱笆的绿墙和那个在牢里很少见到的低语着的喷泉，把这个我最初几年散步的地方的面貌完全改变了。那时候这是一块光秃的不毛之地，连一片草也没有，地就象岩石一样坚硬，平滑，凄凉；这块地是给人处了死刑。这话照字面的说法和照比喻的说法都说得通，在这种被强迫的不生产的状态中它确实死了，僵硬了。

---

① 普希金的一首诗的标题。——英译者注

铁丝网

我们的农业家虽然得到了两个新的园子，并且开垦了卫城里老监前面那一片大院子，可是他们并不满足。他们就跟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地》里面的农人一样，只想着把自己土地的范围继续不断地扩大，他们只要看见一块荒地就得想法把它弄到手来种。他们想起老监后面的空地上长满了野草，而其实那块地很可以变为一个花树杂生的园子，让苹果树、忍冬、丁香……按照季节开花。他们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他们的积极的固执的努力终于在一八九八年或一八九九年得到了成功。“好，干吧！你们工作吧，把地种起来；只要牢里安安静静不出事就行”，监狱当局的想法好象就是这样。

老监后面的那块空地其实只是一块毫无价值的荒地，地长而窄狭，三面是要塞的高墙，地上长满了极繁茂的荨麻和牛蒡，中间还杂乱地放了一堆树皮，那是我们从车床上需用的木料上面剥下来的。土地的上面一

层约莫有三尺深，都是些夹杂着石灰石和小石子的土块，因此在那里只能够生长最普通的植物。在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株百年的山楂，它跟老监前面院子里的那株是一样地可爱，在这满目荒凉的景象中它是唯一的悦目的东西，而且更令人感到这个可怜的地方的荒芜了。我们那班园丁们就看中了这个地方，决意把它改变成可爱的天堂的一角。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们不得不把他们幽禁生活中的全部精力花在这件事上面。他们把这块空地的整个地面都翻了过来，石头全弄干净了；小石子也搬开，拿去铺砌花园和"笼子"的小径。要种树栽花，必须先得到肥沃的土壤。我们的同志们挖了一个又深又宽的坑，一直挖到深处的志留亚纪的粘土，把这种土挖出来，拿它跟沙粒和锯屑、腐植质等混合在一起，做成一种上等土壤，至于那些石灰石、小石子以及这块荒地上堆积的垃圾，我们的园丁们就拿它们来填洞穴。

这种真正艰苦的初步工作做完以后，他们节目中的创造部分就开始了，他们不肯让我去看他们工作的情形；我的同志们想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时候到了。他们唤道："薇拉！来！"

看守们把我带到那里的时候，已经临近黄昏了。我记得上一次看到那个地方，它还是一片杂乱。现在我

走进去，不由得我不惊讶地站住了。在山梣的近旁我看见了一个花园，一个装饰着灌木和花坛的美丽的小花园。花正在开放。高高的百合展开了它们的黄色的扇形杯子；耧斗菜打开了它们的中凹的紫冠；白色烟草花的旁边燃烧似地开放着深红的荷兰石竹，一株漂亮的大丽花垂下它的紫红色的头。在好些地方忍冬的暗绿色叶子遮住了丁香的深绿叶，可是老山梣的可爱的羽毛般的树叶和大串的红果却象华盖似地罩在整个园子上面。啊，这真是奇迹！跟一个真正的花园一样，这块小地方有一道铁丝篱笆跟其余的地面分隔起来。

在这傍晚的柔和光线中，我站在那儿，带着沉思看望四周，温暖的空气轻抚着我，木犀草的芳香从我的鼻孔沁入。这多美……多可爱！我眼前有一个花园，有花，有一道铁丝篱笆，还有要塞的高墙围在四周。一阵漠然的感情在我心上涌了起来，从我的眼里意外地淌出了泪水。"这眼泪从哪儿来？为什么我要哭？"我不由自主地问着自己，我看不出有什么悲哀的理由。我问着，却得不到回答。

等我回到"家"里（我已经习惯了把监房叫做"家"了）稍微静下心来的时候，我明白了。我那班同志在要塞的围墙内用劳力创造出来的有花有灌木的小园，和那道囚人们用自己不熟练的手简单地编成的网格不匀

整的篱笆，使我记起了另一些花园和另一些篱笆。过去的图画早已被我用意志的力量埋藏在我记忆的深处，可是现在它们却浮起来了。这些久已埋葬了的景象现在从它们埋葬的地方出来了，是它们用眼泪来表示抗议，它们责备我不该把它们看成已死的东西。

视　察

在最初的十年里面，每隔半年总有一位圣彼得堡的高级官员到我们这里来视察一次。来的总是内务大臣，警察总署署长或者一位将军。所以在我们的长时期的监禁中我们已经看见了一大串交替地担任着国家要职的大人物。

这类大人物中的第一个，就是一八八五年来我们这里视察的阿尔测夫斯基，他是当时的内务部次官和宪兵司令。提到他的视察，不由我不想起下面的一件事。

当时我隔壁的那个监房是空的，再隔壁的一个监房里面却住了人。起初每到晚上我总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向前五步，又退后五步！我反复地在猜想这究竟是谁呢。过了几个星期脚声停止了；在散步的时间内那个监房的门也不再打开了：囚人生病了。现在不论白天或夜晚我老是听见一个人的几乎是不间断的低声呻唤和咳嗽，这声音引起了我的不安：在我的近旁就

有人在受苦。这是谁呢？我认识他吗？我屏住气静听着每一个声音，想认出那个囚人是谁。

我的左边隔了一个监房也住着一个垂死的病人。这便是离我最近的两个邻居。所以当阿尔测夫斯基走进我的监房里来，问我有没有什么请求的时候，我便要求他给我免去这无谓的痛苦，病人的这种呻唤声使我日夜不得安宁。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把那两个病人搬开，离我稍为远一点。阿尔测夫斯基默默地听完我的话，并且默默地走出了我的监房。

我的左右两边的患病的邻人仍旧住在原地方没有移动。我们向阿尔测夫斯基提出的其他的申诉也是一样地毫无结果。

瓦西里·伊凡诺夫控告宪兵们在押他到惩戒室去的途中打他，他说查尔克维奇医生可以作证。阿尔测夫斯基便把医生找来问询。这个卑怯的人却证明并没有这样的事，然而事实上在伊凡诺夫挨了打晕过去以后出来救活他的正是这个医生。因此阿尔测夫斯基对伊凡诺夫的控告只耸了一下肩头作为答复。

一个害肺病的人诉苦道，他的虚弱的身体受不了囚人的饮食，黄芽菜和粗麦粉，阿尔测夫斯基带笑回答说，粗麦粉是上等食物，他自己就很喜欢吃它。

在最初的几年中，囚室里老是冷得很。也许是由

于他们舍不得把火烧旺一些，也许是由于我当时正患着贫血症，我的冷的感觉是从这个病来的，总之我在监房里面得穿着我出去散步时候穿的短皮衣袄。所以一八八五年秋天警察总署署长杜尔诺渥带着他的随从走进我监房里来时，我也穿着短皮衣袄。他脸上现出满意的笑容。“您为什么现在就穿短皮衣袄呢？”他向我问道。

“我冷，”我回答。

“奇怪，我一点不觉得这儿冷，”他接着说。

他的两颊通红，从他的口中发出葡萄酒的气味。我们看得出来，他在司令官那里吃过了一顿极丰富的早饭，司令官现在还陪着他在各处视察：他不冷，这倒是容易了解的。

“冷热的感觉完全是主观的，”我冷冷地回答他道。

约莫两三年以后杜尔诺渥还来看过我一次。他仍旧跟从前一样带了一大群随从，诸如司令官、督察长以及要塞宪兵队的好些军官全在里面。

这是高官们视察席吕塞尔堡时通常有的预防的手段。“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健康状态怎样？”总是这种官腔的问句。过后他们马上就走开了。

突然间我监房的门又打开了，杜尔诺渥一个人走了回来。我当时正站在房里，背靠着墙，人很激动，这

是每次我们的孤独生活给人扰乱了时都有的情形。他迈着快步向我走来，信赖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亲切地看着我，小声问道："您在这儿寂寞吧？"

我的眼睛透露了我的心意，可是我却说："不！"那只放在我手臂上面的手立刻抬了起来，他指着桌上的一把菜，用了完全不同的官腔问我道："这是从园子来的吗？"话一说完他马上就走出去了。

杜尔诺渥显然很想跟席吕塞尔堡里的某个囚人畅谈，还算不错：乐巴丁居然跟他大谈要塞里的生活情形。

这些先生们从来就不会对囚人隐瞒着什么不好的消息。雅诺维奇关进要塞以后大约五六年的光景，他们告诉他，他的七个近亲的死讯。杜尔诺渥对一个囚人说他的妻子改嫁了。

至于其余的到过席吕塞尔堡来视察的官员，我们要是一一描写起来，便有了各种性格的典型了。

有一次来过一个粗鲁傲慢的军人冯·瓦尔将军。他看见我的监房里没有一幅圣像大为吃惊，便问督察长这是什么缘故。督察长回答说："囚人把它拿掉了。"我不想找麻烦寻架吵，所以一声也不响，其实是宪兵们把它拿掉的，他们大概带回自己家里去了。

谢别科将军到我们这儿来过三次。在一八八七

年，我提出过一次控诉。在这以前不久他们发下了纸和铅笔给我们，我用一张很小的纸条写了几句问好的话给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利·波格丹诺维奇。我把这字条藏在一本书的封皮里面，我先把封皮弄开，然后再用黑面包把封皮粘好。这个办法居然成功了，这鼓励我再试一次。可是这一次却失败了。宪兵们发见了字条。督察长沙科罗夫气冲冲地跑进我的监房里来，粗暴地向我叫道："我们把你一直当人对待，你却不懂得爱惜这个。你再要写字条，我就给你颜色看！"后来谢别科到这儿来视察，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控诉，我向他说督察长粗暴、打人、把人逼死[1]，我还说，倘使沙科罗夫不改变他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便要反击。他的那种粗暴的方法和举动我们实在不能忍受。谢别科用同情的声调回答我："您不幸给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任何反抗只能使您的处境更坏。"

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个幸运，谢别科对我倒很温和。可是在雪巴林的监房里他问督察长道："这种无礼的怪相算什么？"特利哥尼的控诉中提到人民的权利，他用粗话回答说人民的权利应该全部取消，他走的时候还吩咐督察长说："鞭子，督察长先生，鞭子！"他在

---

① 指格拉切夫斯基。——原注

另一个囚人的监房里也说过跟这类似的话。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挨了他一顿骂，说是态度不好，他并且恐吓她说“狱规上有体刑的一条。”

我们决定，要是他下次再来视察，我们一致抵制他，对他的问话我们概不回答。过了一年或一年半光景，他又到席吕塞尔堡里来了。他最先到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的监房里去。“您的母亲”他开始说，他分明有什么关于她母亲的消息要告诉她。鲁特米拉到席吕塞尔堡以后还没有得过她母亲的消息，这是第一次。可是她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要听您的话，就是说到我母亲的事，我也不要听。”谢别科也不再访问任何人，就走了。显然是他从宪兵那儿得到了我们决定对他抵制的消息。

施威亚托颇克一米尔斯基的视察，在我的记忆中，是跟下面一桩有特性的事情关联着的。施威亚托颇克一米尔斯基根据赛尔该·伊凡诺夫的要求，允许我们把各人劳动的生产品送给自己的亲属。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想拿自己精美的作品给家属送去。我也给我母亲做了一套很漂亮的海草和苔藓的标本，还做了一个核桃木的小匣子，上面印着我母亲名字的缩写字母。可是我的家属并没有收到。警察总署的人对我家属解释道，他们不愿意让这些东西成为“遗物”。

书籍和杂志

我在前面已经提过，我们初到席吕塞尔堡的时候，监狱图书馆里并没有几本可读的书，然而在当时读书便是我们的唯一的消遣。我们住下来以后，图书馆的藏书也渐渐地增加了。除开韩加尔特买给我们的全部图书外，宪兵们还拿了一些杂乱的材料给我们装订。这些材料中间主要的是他们订阅的廉价杂志的增刊：书名极时髦动人，而内容全是浪漫故事、犯罪故事之类的荒唐小说。他们利用免费装订的规定，常常送来大堆这类的无聊东西，终于使我们不得不拒绝再去装订它们。在起初的十年里面我们白白地开了好些张书单，我们希望图书馆能够把它们买来。监狱当局把我们的书单送到警察总署去，那儿不是不理会我们的要求，便是讥讽地批驳说我们这种非分的要求得花费一两百卢布。有一次一位高级官员来视察我们的监房，我们里面有人向他要求给我们一些轻松的读物，他回答说，不给我们读文艺书籍是怕我们会受到刺激。然而在莫洛左夫

向那些视察的“大人物们”提出要求以后，我们的科学方面的资料逐渐增加了。不过大批好书的购进却是一八九五年以后的事，那时在韩加尔特的管理下面，我们开始用工作换钱，并且可以拿这笔钱给图书馆购买新书。我们一积起几十卢布，就把我们需要的书籍开列在一个单子上送给监狱当局，只要经过本地的和中央政府的检查员的批准，书籍便可以买进来。在这方面，也常常发生奇怪的事。有一次他们不准购买麦尔特瓦戈的《不走老路》——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本农业的著作。另外一次他们在我们书单上删去了柯林士版《斯宾塞社会学简篇》，然而却把他们在一八八九年没收的斯宾塞的《社会学》退还给我们。后来他们又禁止我们读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作品。

一八九六年郭列米金到这儿来视察过以后，警察总署答应我们每年拨款一百四十卢布给我们的图书馆添购新书，让我们自己开列书单，不过自然得经过检查员的审查和批准。当时我们一共有二十个人，那么问题就发生了：我们根据什么来选择书籍呢？有的人认为最好是凭多数人的表决。可是这样一来，象鲁加雪维奇、莫洛左夫和雅诺维奇那样的少数专家个人的需要就会完全给忽略了，因为只有多数人要读的书才有机会开列在书单上。另外的人提议把一百四十卢布分成

二十份，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名下那份钱购买他需要的书；倘使他那份钱用去买他要的书还嫌不够的话，他可以找别人合作共同购买。这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放弃个人自己的一份钱，或者只放弃一部分，去帮忙那些需要购买售价特别高的著作的人；我们辩论了许久，终于决定采用这个办法，于是我们把钱积在一起，互相帮助。我们为莫洛左夫订了一份《理化学会会刊》，后来又订了一份英文杂志《化学新闻》；我们也为着雅诺维奇订了一份很好的英文年鉴。我们又合起来订了一份德文的《自然科学周刊》和一份英文杂志《知识》，还有别的刊物。我得承认我们大家对于科学界的新奇的事都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读到镭和氦的新闻的时候，整个监狱都骚动了，我们不停地谈论着放射性物质。以太究竟存在不存在呢？关于这个问题莫洛左夫和鲁加雪维奇两人抱着不同的见解，而且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热烈的争辩。关于飞机的最初的消息得到了我们大家热烈的欢迎①。莫洛左夫在席吕塞尔堡中写成的论文《雷和风暴的启示》是根据天文学的天

---

① 我们散步的时候曾谈到航空术未来的发展有大的希望。看守们听见这样的话大为吃惊，他们连忙报告督察长，督察长立刻将《观察界》杂志的副刊收回，因为那本副刊上面登载了一篇关于这题目的论文。宪兵们以为我们要飞出去了。——原注

体图来解释《启示录》的著作，它使全监狱大为激动。乐巴丁摇着头怜悯地问道："莫洛左夫专心在研究《圣经》和神父们的著作，他是神志清醒的吗？该不是在发宗教狂吧？"可是安托诺夫非常高兴地说，莫洛左夫是一个天才，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全欧洲的著名人物。

在各种期刊中，《俄国财富》都是在出版以后一年光景才收到，其中的国内时事述评栏有时剪掉，有时留着，我们还收到《上帝世界》和《俄国思想》①。有一次我居然接到一本本年的《欧洲通报》，有时候我们也得到一些别的报刊。所以我们在一九〇〇和一九〇一年中间居然也知道当时俄国的觉醒，学生运动，一般的不安和游行示威等等了。

还有两种刊物对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有大的影响，一种是《经济家》，②这是地主们的刊物，另一种《财政使者》是专门替威特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辩护的刊物。《财政使者》由警察总署自动地按期送来。从这两种刊物我们了解到俄国经济的状况。我们对这些问题极感兴趣，并且发生热烈的辩论；我们中间多数人仍和

---

① 译者没有见到这些刊物，不知道它们的适当译名应该是什么，在这里只好按字直译。

② 这恐怕不是适当的译名。

过去一样关心农民，为他们的景况担忧，但也有人拥护威特的政策。

在一八九五到九六年的冬天司令官韩加尔特送了《新言论》①来叫我们装订。新言论！我们这些人相继跟外面世界隔绝，整整十五年中我们从没有听到任何新言论，我们中最后的一批是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八年关进要塞里来的，他们也没有带来什么新言论。现在从这杂志的篇页上许多新的思想象一阵雪崩似地对着我们倾注下来，把我们这种消极的被动生活扰乱了。年轻而热烈的思想向我们所极宝爱的民粹派思想挑战。农民公社被人攻击了，他们主张自由的、个人的开拓精神。那些作者认为通过放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而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就其效果而言是有益的。农民被看作小资产阶级；但是农民得变成无产阶级，那么他们"在工厂的大锅里煮过之后"就会变做社会主义者了。那个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切"新言论"象一个思想炸弹似的在我们中间爆炸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幼芽在一八八四年还根本没有见到；当时的出版物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示怀疑；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一般革命青年所持的见解是否定的。然而

---

① 这是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刊物。

现在这个已经变成强大了的新潮流却要向胜利冲刺了。问题出来了，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提出来了……我们要塞的高墙外面，在整个革命阵线中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论争，可是连一个战斗的回声也没有传到我们这儿来。现在一本杂志到了我们的手里，它很技巧地、很出色地反映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斗争。说是农民应当在那里面"给煮过"的"工厂的大锅"在我们的头脑中也沸腾起来。有许多地方伤害了我们，惹怒了我们；有许多地方很刻薄，侮辱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尊敬我们所爱的思想和人物，可是我们这份尊敬也受到侮辱了。这份杂志给我们留下一种深深地扰乱的印象；它的内容打击了我们最宝贵的思想和信仰。我们中间立刻分成了不同的阵线；有些人感到胜利了，有些人受伤了。鲁加雪维奇和诺瓦鲁斯基这两个企图再来一次"三月一日"[①]的一八八七年的恐怖主义者宣布他们是社会民主党，虽然他们也赞成民意社的战略。他们得着雪巴林和雅诺维奇的支持；莫洛左夫后来也参加了他们的阵线。其余的同志，连我在内，都是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社的社员，我们这班人民主义者（即民粹派）却反对

---

① 指暗杀沙皇的事。亚历山大二世是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被暗杀的。

他们。于是开始了讨论和激烈的争辩，这等于小规模地仿造了当时监狱外面的那个大论争。每个人都替他自己的见解辩护，并且在论争中使用了恶毒的辱骂，和自负的挑战性语言：相信自己主张会胜利，相信自己主张会得到现实生活的支持。奇怪的是，我们那位学者，我们那位客观的、审慎的博物学家鲁加雪维奇却是一个最厉害最好吵的战士。这论争愈来愈激烈，后来实在吵得太厉害了，我不得不出来讲话，我说："同志们！在我们大家过的这种生活里，和平地相处是比理论争论更重要。我们从此就停止我们的论争吧！"这些话究竟是成了我们那个小小的浪涛汹涌的海上的一滴油呢，还是我们已经明白，目前我们谁都不能说服对方，最好让那份刊物给我们带来的新思想在我们心里安静地经过一番时间的考验再说，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从这时候起我们的争论就渐渐地缓和了，虽然我们的意见分歧仍旧存在；可是战斗的心境却消失了。鲁特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和我两人在第五号、第六号"笼子"里常常跟我们那班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争辩，这样的争辩同时在狱中别的地方也发生着。后来我们想起当时我们怎样争得面红耳赤，并且鲁加雪维奇因为我主张土地公有怎样猛烈地攻击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笑。

我们图书馆的书已经增加了不少，特别是科学的书籍添得最多，因此，他们从一八八七年起发给我们的纸张现在也有了更重要的用处了。起初它被我们用来排遣寂寞，使我们能够写诗表白自己。现在那班选了专门学科来研究的同志有机会积蓄起必需的科学资料并且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利用着他们搜集的资料从事创造性的著述。

莫洛左夫有系统地一天一天地工作，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一部杰作《物质结构》，这部书写得很生动，叫人读起来非常愉快。他用了一大堆纸写出许多篇论文，记下许多笔记，并且作了许多很出色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方面的推测、假定；他出狱的时候把这些材料全带走了。至于席吕塞尔堡中其他的学术性活动，我前面已经提到雅诺维奇那些关于经济问题的有价值的统计表，这是他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做出来的。鲁加雪维奇在写一部题为《科学哲学基本原理》的巨著，他出狱以后出版了这部巨著中的两卷《大地的无机的生活》，得到地理学会的金牌奖和科学院的阿赫玛托夫奖金。

当上面这几个同志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其余的人则埋头于文学方面的创作。我早已提过了帕立瓦诺夫那部优秀的关于亚历克赛半月堡的《回忆

录》；弗洛林柯在写他的童年的回忆；帕坡夫在整理他在加拉矿山中写的有关"到民间去"运动的回忆录，他又写了一些描绘各种农民典型的短篇小说。赛尔该·伊凡诺夫写了一些西伯利亚生活的短篇小说。尤可夫斯基在写他的长篇小说《恐怖主义者之家》；莫洛左夫也写了他的美丽的《我的生活的曙光》，这特写散发出儿童的天真和青年的浪漫气息，我们都高兴读它。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到对七十年代青年的思想发生影响的主要是文学，诺瓦鲁斯基写了一篇辩驳的文章，将农奴解放运动如何打破了所有一切经济关系作了一个有趣的分析。我们里面还有人几次出版过"刊物"，但它们都寿命不长。

人通常总不重视健康和光明，除非到了他失掉它们的时候；在平常的生活里人随手都可以得到纸张，因此也没有人会看重它。可是一个熟悉监狱生活的人就会知道，好些年里面得不到一张纸，没有机会写下自己的思想，无法消愁遣闷，不能记下或许会得到的知识，那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我们在席吕塞尔堡中的生活是很单调的，没有任何欢快的鼓舞；我们同志们的赠品，例如安慰、鼓舞的诗，批评，或者唤起新思想的严肃的论文——都是受欢迎的礼物，然而要是没有纸和笔，就不能做到。

我们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是极其贫乏可怜的。当鲁加雪维奇绘他的最初几幅地质学图的时候，他用他所点的灯上的煤烟做黑色，用监房墙壁的灰泥做蓝色，还用了自己的血做红色。

我们的本哲明

布烈特·哈特① 在他的小说《咆哮营的幸运儿》中，描写在一群淘金者的帐篷里有一天一股山洪冲下来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孩，母亲不久就撇下那个孩子死了，那个孤苦无靠的小孩却成了这群挖金人的意外的快乐和幸福的泉源。当卡尔帕维奇给关到席吕塞尔堡里来的时候，他也成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泉源。我们非常喜欢他，马上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本哲明。

他的事情一般人都知道，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二日他从柏林回到圣彼得堡，两天以后在教育大臣波哥列坡夫的客厅里，他开枪打伤了这个摧残大学青年的人的颈子。在波哥列坡夫做教育大臣的时候，一九〇〇年发生了学潮，他便实施一八八九年批准的强制参加学潮的学生服兵役的条例，并根据教授们的判决，把一

---

① F.Bret Harte(1836—1902)，美国小说家。

百八十三个基辅大学的学生和二十七个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送进军队充当普通士兵。这种办法，再加上几次罚服兵役的学生的自杀事件激起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和大学青年的愤怒，自然在卡尔帕维奇的心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印象。卡尔帕维奇在去柏林之前曾经亲身参加大学生的骚动，并且两次受到开除的处罚。因为自己参加了学生们反对历届教育大臣在学府中推行警察统治的斗争，因为自己与学生们的目标相同，命运相共，关系密切，并且自己相信学生运动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卡尔帕维奇便下了决心，他要对那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首恶表示一次武装的抗议。他从没有加入过任何的革命团体，他决定一个人单独行动。他连忙从外国赶回来，他并不找任何一个人帮忙，就单独地完成了他这件英雄的事业。波哥列坡夫伤重不治而死，卡尔帕维奇在一九〇一年三月被判处二十年的苦役罪，给人押送到席吕塞尔堡里来。卡尔帕维奇的这行为居然保护了一般的大学青年；他的行刺事件发生以后，大学生便不再被强迫服兵役了。他的功绩鼓舞着一般的年轻人，他们称他做"勇敢的鹰，"并且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巴尔马雪夫①，这个青年在一年后用社会革命党的名义

① 巴尔马雪夫(Stepan Balmashev)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杀死了内务大臣西皮雅金，五月三日受绞刑。

做了一件同样的牺牲自己的行为。

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八年的那些审判以后的十三年中间，就再也没有一个人从外面世界给带到我们这个要塞里来过。到了一九〇一年我们留在这儿的人就只剩下寥寥的几个——我们一共只有十五个人，其中有九个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我们被判定了生活在这个小圈子里面，长久没有一个新人加进我们里面来，我们只是在我们生活的窄小范围以内，永远思索着同样的思想，产生同样的感情，经历同样的心境，始终没有一个与自由世界相通的气孔。在这灰色的监狱生活中，年复一年，希望消失了，期待死去了，连记忆也渐渐地泯灭了。我们曾经希望过让一些新的年轻的同志来接替我们，然而没有用——并没有新的战士出现。

在我们这种普遍的绝望的心情中，在一九〇一年三月的末尾，有一天安托诺夫来报告我们说，要塞的大门打开了，一个新人给带了进来，现在正在办公室里面，这天上午十点钟敲过以后不多久，我们还在散步，宪兵们忽然忙碌起来。他们走来分别地通知我们每个人，说要是有人想回到监房或者去工场工作，那就得马上去，因为过一会儿我们就不得离开天井了。我们推测大概是那个新囚人就要给人从要塞押到牢里来了，那些想从自己监房的窗户看到新囚人的同志便连忙回

到自己的监房里去。我没有去。我觉得难过，好象我在参加一个对我很亲近的人的葬礼一般。说真话，难道这不是一个葬礼吗？他们正是在这儿埋葬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充满着未花费过的精力和未使用过的力量的年轻的生命。十七年前我们走进这个要塞时，我们就得长年累月地忍受这种自知光阴虚度的痛苦感觉。他现在也得忍受这种痛苦了。

根据安托诺夫的报告，这是一个高个子而身材合度的青年，他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我们这生活里面来。他不象我们那样进监狱时戴着手铐，他也没有穿那种背上缝着类似纸牌红方块形 A 的黄色标记的囚衣；他微笑着挥着他的帽子向囚窗的方向行礼招呼。

卡尔帕维奇的出现使我们大家非常激动；我们旧一代的人现在得第一次跟一位新青年的代表面对面地相见了，而这一代的新青年却是在我们跟生活隔绝了的那些年中茁壮地成长起来的。我们怎样相见呢？我们彼此在对方的身上会找到些什么呢？我们会互相了解吗？我们彼此的世界观会和谐吗？这个从远方来的使者给这个监狱的沙漠带来的是什么？什么消息，什么心情呢？我们在他身上找到的又会是什么呢——一个真正的儿子，或者一个外来的宠儿？

在一九〇一年监狱的管理情形已经跟一八八四年

的不同了。卡尔帕维奇既然关在我们近旁，要想把他跟我们隔离，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走过他的监房或者他散步的“笼子”时，可以站住，交谈几句话。这几句话很容易延长为时间较久的晤谈，并且我们马上利用一切的机会来密切交往。我们通过敲壁通话和由门缝里交谈的办法，开始知道了一些外面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渴想更多知道一些，因此我们便要求他详细写下来，等他散步的时候把它埋在地里，那么会有人挖起它来，拿它传递给大家阅读。我们想知道每一件事情，俄国国内生活的一切详细情形以及在西欧发生的一切大小事件，我们全部想知道。对这个工作，卡尔帕维奇倒很能胜任，因为他做学生时候就非常活动，他到过好些地方，并且在国外住过一些时候。

他带来的好消息使我们的灵魂复活了。照他说来全俄国已经活动起来了。在八十年代中人们很难看出劳动阶级的存在，可是现在俄国的劳动阶级却变得跟西欧那种工业无产阶级一样的了。他们团结起来，堂皇地登上社会舞台，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组织几万工人的大罢工，并且在大街上游行，显出他们的正在生长的力量。大学青年的数目比从前更多，并且不再象七十年代那样地散漫无组织了，现在他们在全俄国结成了一个整体，一致地起来反对俄国的警察统

治（当时各大学都是捏在它手里的）。学生运动的浪潮遍于全国，结果几百学生遭逮捕，几千学生被开除。在每个都市里都有秘密的印刷所，出版了不少革命的小册子和报纸，并且散发了很多传单。要是某一处的印刷所被查抄没收了，马上就有一处新的建立起来代替；遭了一次挫折以后，他们会用更新的精力和力量再来工作。卡尔帕维奇预言道："过五年俄国一定会发生革命。"他说错了的只是时间，因为革命在四年后就发生了。然而我们当初进监狱的时候并没有听见群众的声音，一切社会分子都沉默着，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敢马上就相信这样一个预言——我们怕相信它。在我们的那个时候社会是停滞不动了；除了我们自己的抗议外再没有抗议的声音。一切都睡着了。难道现在真的醒来了吗？那么为什么还让我们孤寂地呆在我们这个活葬墓里面呢？要是战斗真的打得厉害，要是人民真的觉醒起来正在争取胜利，那么为什么他们不送些新的同志来呢？我们监牢里面还有很多的空地方，的确多得很！我们的死者留出了空位。为什么就不见有人来递补呢？卡尔帕维奇不是在说大话吗？他是不是耽于幻想而忘记了现实呢？这种情形在一个刚刚给人从政治斗争里活生生地抓走的青年，倒是很常有的事。

我们的整个心灵都被他的这一番话深深地震动

了。他的到来把我们的监狱生活整个地翻了起来。卡尔帕维奇现在应当在这儿身受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在前十年中所身受过的比较起来，已经是好多了，可是他仍然不肯忍受那些压在他身上的狱规的限制；他因为是新来的囚人，不能够在工场里作工，也不能跟一个同志结伴散步。卡尔帕维奇打从进要塞起就跟监狱当局不断冲突。我们知道这种反抗不会改变对他的限制，因为那是由圣彼得堡规定的，然而卡尔帕维奇还是想用绝食的办法来强迫督察长和司令官取消他所身受的种种限制。他第一次的绝食，由于他相信了从圣彼得堡请来的军医的欺骗的许诺而终止了。第二次他实行绝食，那是因为狱方禁止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停留在他的"笼子"门口跟他讲话的缘故，我们也从此拒绝出去散步，算是参加他这次抗议的一个表示。过了五六天以后，我们大家为着卡尔帕维奇的命运开始感到不安了。弗罗林柯请我去找司令官交涉。司令官坚决不许我们去跟卡尔帕维奇谈话。可是我试探地问他："要是我们不顾禁令去跟他谈话，我们会不会受到体刑呢？""不，"司令官答道。这样一来我们便取消我们的抗议，都出去散步了。我在卡尔帕维奇的"笼子"门口站着跟他谈了一个多钟点的话。事情就这样地结束了。

有一次警察总署根据我们几个同志的要求派了一

个牙科医生到牢里来。我们怕他回去会做什么对我们不利的报告，所以在事前就商妥大家好好维持着秩序。可是卡尔帕维奇却忽然想起要唱歌，他拚命提高声音唱着，整座监狱都听到他的歌声。督察长卜洛瓦托洛夫走去请他不要唱，一共去过两三次，都没有用。卡尔帕维奇并不理睬。督察长便把他带到老监里去，他在那儿住了两三天。

两年以后他所受的限制都取消了；他现在是我们这个监牢社会中享受同等权利的一份子了。卡尔帕维奇并不是一个擅长于脑力劳动的人，他不能靠读书来消磨狱中的时光。他非常热心地去做体力劳动，起初他在细木作里面作工，后来他又在铁工场里劳动。他变成了安托诺夫的分不开的同志；在安托诺夫的指导之下，他成了一个能工巧匠，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做出了各种漂亮的东西。

卡尔帕维奇对待我们的态度就跟儿子对待长辈一样，他那下垂的睫毛表示出他跨进这个俄国的巴斯底时，他对我们这班囚人所抱的亲切的尊敬，我们这些席吕塞尔堡的老居民都是卡尔帕维奇的长者，有的大他十岁，有的大他二十岁，或者更多一点，单是这个就决定了我们跟他的关系，一种朋友而兼父执的关系。我们非常渴望着新的同伴，我们待他特别地慈和。我们

这位本哲明常常连睫毛也不动一下就急躁地把我们牢里的规矩搅乱了，例如，有一次他象一只猫似地爬过篱笆，跳进隔壁一个“笼子”里去。乐巴丁管他这种急性叫做“青年人的敏捷”。事实上他这“青年人的敏捷”在我们看来有一种特殊的可爱之处，这是我们对于他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这种向我们忍受惯了的一切清规戒律挑战的一个响应。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知道在我们（一班老革命者）和他（一个新的一代革命者的代表）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我们对彼此的心理并没有什么不了解，这都是我们当初知道一个新囚人意外地来到席吕塞尔堡的时候所担心过的，可是现在我们高兴地发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①

---

① 卡尔帕维奇一九〇七年从西伯利亚的放逐地逃出，去英国。以后的十年中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英国度过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从英国搭船回俄国。这只船被德国潜水艇击沉，卡尔帕维奇不幸溺死了。

十八年后

跟从前一样，席吕塞尔堡的白墙同它们那些角上的高塔立在那儿，很象一些做得不好的复活节蛋糕；跟从前一样，席吕塞尔堡的大门紧紧地关着。跟从前一样，河水有时平静得象一面镜子，有时却带着怒吼冲向在涅瓦河源头的我们这个小岛的平平河岸。然而在监狱里一切都改变了。从前这里有过不少的“居民”，可是到了一九〇二年年终，就只剩下十三个人了。[①] 多数的人死于坏血病和肺病；另一些人服满了刑期；还有几个遇赦出狱，至于那三个精神错乱的病人则在一八九六年给人送到医院里去了。为着这最后的十三个人，监狱里仍然维持着象从前那样多的人员。平均有二十到二十五名看守照料一个囚人，那么每一个囚人

---

① 弗罗林柯、莫洛左夫、瓦西里·伊凡诺夫、阿申布伦纳、安托诺夫、乐巴丁、赛·伊凡诺夫、斯塔洛得伏尔斯基、帕坡夫、鲁加雪维奇、诺瓦鲁斯基、卡尔帕维奇和我自己。特利哥尼在一九〇二年春天出狱，帕立瓦诺夫在这年秋天出狱。——原注

一年的费用不会少于七千卢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囚人们通过顽强的攻击，一步一步地争到了各种权利，并且逐渐使这些权利扩大。虽然上了子弹的来福枪仍然象从前那样地挂在走廊里架子上，可是严格管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在好些监房里仍旧挂着一八八四年的狱规，然而实际上早已不提“良好的品行”和对它的奖励——如结伴散步和使用花园与工场之类的特权了。这一切的特权早已成了人人享受的权利，过去的种种的差别完全消灭了。在我们那次为了争取图书的同盟绝食之后，他们改善了我们的伙食，好象他们想用肉体的食粮来代替我们的精神的食粮似的；他们开始供给我们茶、糖和白面包，并且把我们每天的伙食费从十戈比增加到二十三戈比。

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因营养不良而死去了，我们这班剩下来的人的健康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散步的时间，以前只限于四十分钟，现在也逐渐地延长了。我们可以差不多整天地待在室外，只除了到工场去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夏天，我们就是在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在七点钟吃晚饭），还可以待在外面。在我们这班久已忘记夏天夜晚是什么样子的人，这是多么大的快乐！虽然我们只能多待半个钟点，可是这是多么美的半个钟

点！从近旁河上吹来的凉爽而湿润的风温柔地拂着我的脸，我的胸膛微微地起伏着。……天空布满了星星；太阳带着火光西沉；监狱的轮廓，那些石墙的轮廓已经不很显明，并且在黄昏里逐渐褪色，也不象在眩目的白日光线中那样损害我们的眼睛了。我那久已沉睡的感触又给唤醒了；周围的一切是这么异样，我的心头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监房的内部设备也改善了。它们不再象先前那样地阴郁了，房里有了充分的阳光和空气。窗户的上层可以整日打开。我常常倾听着单调的浪涛击岸声，我觉得好象看见了浪花击着要塞石墙而破碎了。……

从前那种只能用读书排遣寂寞的单调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整天有种种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格子篱笆看见同志们的面容，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们还可以一块儿在户外工作，并且轮流替换着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我们的图书馆当初只有一百六七十本书，但在十八年中图书增加到二千册，一部分是科学书，另一部分是纯文艺的书籍。

除了马尔地诺夫和拉哥夫斯基两人在九十年代初期还跟督察长费多洛夫有过冲突外，囚人们所受的待遇也比较合乎人情了。到了一九〇〇年光景圣彼得堡

的高级官员好象忘记了离那首都三十五公里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政治犯给监禁在一个要塞里面；他们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功夫来想到我们。机会民主党运动的迅速活跃的发展，学生中间不断的风潮，最近组织起来堂皇地宣称它的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之出现于政治舞台——这几件大事把政府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去了。革命已经公开地出现了，在俄国大城市的广场上公然地升起了革命的红旗。那么他们怎么还能够想到寥寥几个八十年代初期的革命者——民意社的党员呢！

自从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以来，差不多过了二十五年了，以前那种死一般的沉寂是没有了，现在生活里有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怒涛。一种活动的抗议的气息已经传遍全国。圣彼得堡的高级官员定期视察要塞的事也停止了。从亚历克赛半月堡调来的宪兵都已陆续退役，他们得到了恩俸，至于留下来的如今也已两鬓挂霜，他们已经和牢里的人混熟了……因此也变得相当温和了。

以前他们总是在督察长沙科罗夫巡视监房的时候呆呆地板着脸站在那儿。督察长从来不许他们单独跟我们在一块儿。现在他们有时候也对我们讲话了。他们也不再害怕负重大责任了，他们不担心我们暴动，也不耽心逃狱了，架子上的枪久不使用，大约已经起锈

了。既然圣彼得堡的高级官员已经把我们忘记了，那么监狱当局也没有理由要在席吕塞尔堡的高墙里面来压迫我们。严格的管理放松了。只要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就成了！只要不惊动圣彼得堡的高级官员，只要没有什么会引起他们斥责的事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就成了！在监狱里，在我们的围墙里面，我们暂时是主人。要是如今在监牢里响起了什么声音，一声叫唤，或者偶然的一句骂人的话，它们都不是从狱吏口中发出来的，却是某一个囚人的声音。叫喊的并不是督察长，却是囚人在对他叫喊！

我还记得特利哥尼出狱前不多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已没有一个人会作出激烈的抗议了。"他的话当时引起了我心里痛苦的反应。

是的，疑虑可能已经偷偷地进了我们的心中，那就是对于我们的精神逐渐变成迟钝这件事的疑虑。然而我们从何表示这种反抗压迫的战斗精神呢？我们应当抗议什么呢？我们应当要求什么，应当为什么战斗呢？我们的生活并不曾提供我们这样做的任何借口。我们在监狱里面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时代的力量争取的并且得到的一切，我们都已经争到手了。我们的敏锐的痛苦感觉已经变成迟钝的了，我们就象一些坐船遇险陷在大洋中一个无人岛上的人。我们这几个失去

了跟其余的人类重聚的希望的新鲁滨孙[1]现在只有一桩可做的事情：尽可能地维持我们的精神力量，耕种一个和平的工作园地。遗忘的帷幕垂落在我们的心上。

到了一九〇二年，我们中间多数人差不多都是在二十年前被捕的，我也在内。有的人还不只监禁了这么些年。倘使这时候我们的记忆还是象它们在二十年前那样的敏锐，那么我们一定不会活到现在。我们的精神为了自保生存的缘故已经渐渐地适应着环境了。

那个长而痛苦的适应时期已经结束了，凡是不曾在这时期中病死、自杀、发狂的人已经达到了均衡。时间使他那流血的伤口结了疤。过去的事都被忘记了，没有被忘记的也被我们用意志的力量压抑住了。剧烈的痛苦也被镇压下去了。我们的心已经静止，遗忘也已占着优势，因此我们也认为整个的宇宙都忘记了我们。不仅是首都的官员们，连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把我们忘却了。我们不能够相信我们的亲人还记着我们，因为连我们也把他们忘记了。要说追随我们的理想却并不认识我们个人的另一代人心里还记着我们的名

---

[1] 英国著作家笛福（D.Defoe,1659—1731）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孙航海遇险，一个人漂流在孤岛上，过了许多年。

字，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在给人监禁了二十年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人的记忆，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被风暴赶出来，被一切的人忘记了……
外面新的一代人已经起来了；
他们记不起我，他们笑着。
是我给了他们的火，
我给他们点燃了太阳，
我自己今天却在黑暗里，
呻吟，永远，永远呻吟。

（巴尔蒙特）①

① K.D.Balmont(1867—1942)，俄国象征派诗人。

肩　章

在一九〇二年我们的监狱里已经是很清静而且非常安宁的了，可是就在这一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那些一点一点地争来的权利本来好象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实的结构，现在却象一件破玩具似地打碎了。

三月二日这天我们在傍晚五点钟光景散步回来，关在各人的监房里面。过后我听见每个监房的门大声地依次给打开了，这表示要有什么不寻常的巡视了。我的监房的门上也响起了钥匙的声音，督察长带了两三个宪兵走进来。

"司令官不满意牢里的混乱，"他表情严肃，声音低沉地说。"这种混乱的情形应该终止了，从今天起狱规应当严格地遵守，"他说完了，正要走出去。

"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究竟是什么一种混乱呢？"我问道。"并没有谁来责备过我们。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您这次通告有什么理由。"

"司令官不满意。狱规从今天起就得遵守，"他重

说了一遍。"上面不许我多讲话。"

"是不是监牢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问他，我知道外面发生了事情照例会使监牢里采取压制的手段。

"我不知道。"

"可是这命令是从什么人那儿来的：从圣彼得堡，还是从地方当局呢？"

"从地方当局，"督察长答道，他转身向门走去。

"我们不能够服从狱规，"他离开时我对他说。"它绑住我们的手脚，它甚至不让我们呼吸；我们不得不违犯狱规。你们马上就得准备好惩戒室。"

"我们会准备的，"督察长平静地答道。

在别的监房里面也发生了这同样的短短的对话。我们又激动，又愤慨，又惊惶。这个灾祸是从哪儿来的呢？监狱里的情形使人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一个灾祸。我们和平地过着日子，并没有烦扰过谁，也没有谁来烦扰过我们。那么为什么他要来恐吓我们，说要恢复旧的狱规，要废除我们这许多年来一点一滴地从官方手中争取来的一切小的改良呢？我们已经在牢里住了十八年或二十年了，有的人还住得更久。我们在这儿已经倦了，老了。他们似乎应该让我们安宁，让我们做点和平的工作。可是他们不；他们又想寻事

生非，要我们再跟他们发生冲突和斗争。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旧的狱规。我们已经不是新来的人了；我们的心境早已改变了。我们的神经完全没有掩护，遇到任何事情都会止不住要起强烈的反应。那天晚上我们很烦恼不安。有的人激动地在监房里踱来踱去；另一些人却躺在吊床上动也不动一下；我们不能够读书——书拿在手里会自然地落到地上去。有些人便按照传统的老方法敲着墙壁跟邻人们轮流地谈话。我们的神经很紧张，就象拉紧了的弦一样。我们会遭遇到什么呢？他们因为什么要实行这种压制呢？现在我们又感到彷徨不定了。我们又变成梅特林克的那群盲人了。

十点钟光景，我们的灵敏的耳朵听见在走廊的另一头、楼上一个监房的门上小窗打开了，过后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大约在十分钟以后我们又听见了这同样的响声，还有人说了两三句话。第三次又是同样的情形。楼下的一层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随后楼上那个监房的门被打开了，宪兵们从监房里拖出来一个重的东西。他们明明是在抬一个人的身子；一群宪兵抬着一个人的手脚在拖他出来。我们听见了一声沙哑的呻吟。一忽儿的功夫全监牢的囚人都站到监房门口侧耳倾听。大家都以为有什么人自杀了，每个人都在叫看守，问他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宪兵听见叫声，走过来打开了门上的“洞眼”看了一下，可是一句话也不说。

突然响起了司令官的声音，他叫着：“放开他！”

那么一定有人上吊了……所有的囚人都用手、脚、书、布帚等等打着门，一面大声叫着：“出了什么事情？”

司令官的声音回答道：“二十八号犯了狱规。”二十八号就是赛尔该·伊凡诺夫。

什么！一个人要自杀，他们却说是犯狱规！所有监房的门全大声地响起来。有人大声在叫“救命！”整个监狱，左右上下都是震得人耳聋的打门声。监狱骚动起来了。

司令官阿布珂夫的威严的响亮的声音第三次响了起来：“去找医生来！”

一阵暴怒的疯狂抓住了我们；监狱变成了疯人院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们又疲倦，又激动，却照常出去散步。赛尔该·伊凡诺夫的最近的邻人对我们说明了昨夜的事情。伊凡诺夫讨厌督察长常常从他门上的“洞眼”监视他的行动，他便贴了一张纸在“洞眼”的玻璃上面，不肯扯掉。督察长三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也没有用。伊凡诺夫不肯依从。督察长叫伊凡诺夫到惩戒室去。伊凡诺夫连动也不动一下。于是督察长叫宪

发生的事，并且他们不能不派人来调査这件事情。

我写着：

“亲爱的妈妈：我正要给你写回信，可是牢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把一切都弄乱了。去请求内务大臣或警察总署署长马上派人来调查详情。

你的薇拉　一九〇二年三月三日”

我把这信的内容告诉了几个跟我最接近的同志，这天傍晚我便把信交给督察长了。

“他们不会把你的信送到署里去的，”莫洛左夫说。别的人也怀疑。只有我一个人相信他们会把这信送去。

第二天早晨，大多数的人都待在监房里；只有两三个人出去散步，我也是出去了的。他们把我带到第六号园子里去，那地方一向是被看作我专有的。隔壁那个第五号园子里也有人在散步，那是帕立瓦诺夫。我们的四周非常静；听不见一点人声。我们愁烦地站在格子篱笆前面，小声地谈话。一个宪兵站在守望塔里注意地听着。

“这桩事情倒值得用薇拉·沙苏丽奇① 的抗议方式来对付，”我提高声音说。“这个抗议是值得牺牲一个

人的性命的。”我又接着说下去，“死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跟所有的人隔离。要是他们把我关在老监里面，永远关下去，怎么办呢？单独……单独跟宪兵们在一块儿……没有书念……那比死还可怕。我们不能够再过我们在最初几年里面过的那种日子。我们的生命力不如从前了。我一定会发狂……疯狂，疯狂——使我害怕的就是这个。”然而薇拉·沙苏丽奇的形象始终在我的眼前徘徊着。

我对帕立瓦诺夫谈起我交给督察长的那封信的内容。他用他那双瞪羚眼似的悲哀的大眼睛望着我。

“要是你的信他们不送出去，又怎么办呢？”他问道。

然而我想都没有想到这一层。

“那是不可能的，”我气恼地叫起来。“督察长不敢扣留我的信；他不敢不把信送到圣彼得堡去。我连想都不愿意想到会有那种可能性，我也不愿意谈它。”

帕立瓦诺夫走开了，我还留在那儿。我不能够离开新鲜空气，它使我陶醉了，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觉得

---

① 俄国少女沙苏丽奇（V.Zassulich）因圣彼得堡警察总监特列颇夫视察监狱，鞭打政治犯，特地从南俄赶到圣彼得堡，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她以递呈文为托辞，见到了特列颇夫，向他开枪。特列颇夫受伤未死。

需要它，因为我不久就应该放弃它了；要是我的同志们都放弃了散步的权利，我还能够一个人再去散步吗？我们现在应当过多久没有新鲜空气的日子呢？一个月，或者更久一点，也许永远吧？

当我最后打定了主意，带着积雪的田野、洁白的雪花的凄凉的诗意，回到我的监房的时候，督察长跟着就走了进来，对我说："您的信不能够送出去。另外写一封。"

"为什么呢？"我生气地问道。"您必须送出去。检查是警察总署的事，并不是你们的事。"

"在信里只准讲自己的事。狱规是那样的。"

"我知道狱规。您把信送出去。"

"按照狱规，我不能够让它送出去；我会把条例拿给您看的，"说完他就出去了。

我非常相信自己是对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会得着胜利，我安静地继续脱我的外套。督察长又回来了，手里拿着政府法规，翻到有关的一段对我读出来。我提高声音命令般地说："够了！我知道——所有的信都得送到警察总署去；至于应当扣留或者应当送出，那是他们的事。"

"不要嚷"，督察长抗议地说。"我客气。您也应当客气。"

“您扼住我们的颈项，可是却要我们对您客气，”我气愤地说。“把我的信送出去！”

“请您不要嚷，您另外写一封信吧；那我就给您送出去。”

“我不写！”

“那么我们就要取消您写信的特权了。”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明白情形的严重了。我得动作。我必需立刻就在这一分钟定下决心，然而我还不曾决定，我也没有想到这种时候居然会来了。我得争取一点时间来镇定自己，恢复心境的平和，然后……我本能地拖长了争论的时间，我带着郑重的口气问道：“您怎么能够取消我通信的权利呢？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

“您不肯把那封信重写过，因此我们要取消您通信的特权。”

这时候我的思想迅急地流动着：“那封信不会送出去……警察总署不会知道。狱规要被强迫遵守。旧的管理方法要恢复了——我们会忍受不了。我的那些同志——他们会怎么样呢？”于是我的思想又转到我自己身上。“我会受得了那一切的后果吗？军法审判和死刑呢，还是寂寞的恐怖，疯狂和死亡？……我不会惋惜吗？我不会追悔吗？我会有充分的力量忍受这一切吗？”我

故意放慢声音，为了要弄明白督察长并不只是在威吓我，我问他道："那么你要禁止我写信吗？"

"不错，"督察长坚决地答道。

一个思想象电光似地打从我的心上掠过，推开了一切的疑惑："只有在行动里你才会知道你的力量。"

我立刻举起一双手；我抓住他的肩头，用尽气力扯掉他的肩章。肩章向左右两边落下来。督察长尖声叫道："您干什么？"便跑出监房去了。那个惊呆了的看守长爬在地上拾起了肩章。

我想他们马上要带我到老监里去，便连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同志们。整个监狱都骚动起来了。可是我要求他们给我帮个忙。我需要绝对的自制。但是只有他们保持安静，我才能做到完全自制。他们不用再做什么——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只要求一件事：让我安静。"

四周静下来了。是一片郁闷的静寂。每个人的灵魂给深深地震撼了，惊恐抓住了所有的囚人。彷徨不定的感觉紧捏着我们的心。从走廊的另一头时时传来帕坡夫的可怕的叫声："薇拉怎样了？"他是在问：我是不是已经给人带到老监去了。这不是叫声，这是一种野兽的怒嗥。它扰乱了我的心，快把我弄到发狂了。

死的威胁

三天过去了。他们并没有把我带走。监狱显得死气沉沉的，使人想起从前它还在沙科罗夫的铁腕下面的情形。

最后那个担任在窗口守望的安托诺夫告诉我们说军法官已经到了，并且在办公室里把宪兵们个别地审问过了。

随后这一行人便到我们这儿来。

司令官、督察长和好些宪兵陪着一个身材很高、面貌聪明而带严肃表情的三十五岁左右的人走进了我的监房。

“您怎么干出这种事？”他问我道。

我在前几天就仔细地想过了：我在审问的时候应当抱着怎样的态度。我担心他们会设法把这事情弄成纯粹个人性质的事件，解释作：因被取消通信权利而引起激动以致发生冲突，他们会设法来掩饰这事情。然而我却要尽力避免一切会使我那行为的判决减轻的机

会：现在应当不谈我已经在监牢里度过了二十年长岁月的事，应当排除一切个人的动机，这事是为了整个监狱的利益而有意作出的。

我便对他叙说三月二日那天的傍晚和夜间的实在情形，我说到督察长的巡视，说起他并不对我们说明理由就宣布从现在起要严格地应用旧的狱规；我又谈到我们的惊惶，以及我们怎样担心面临的毫无缘由的报复；我再说，在那天夜里宪兵们并不回答我们的问话，突然把某人拖了出来，使得我们大家非常激动，过后我们听见了那个同志的喘气咳嗽声，又听见司令官的激动的命令："放开他！"……"找医生来！"

我又说起那封信，督察长并没有权力扣留我的信。不管我那信的内容是什么，他都应当原封送到警察总署去；因为检查权在警察总署，不在他，可是我很清楚我那封信他并没有送到警察总署，却私自读了。

"大概是督察长对您的行为粗暴，因此引起了您这个举动吧？"检查官问我道。

"不，他并不粗暴。他通常对我们还温和，并不是他，倒是我提高了声音讲话。"

"那么也许是督察长对您说明他们要取消您的通信的特权，使您不高兴才发脾气吧？"

"不。我已经不再关心通信的事情了。要是他们

在头几年就让我有通信的权利，那么对我会是一个大的幸福。可是现在，在这么多年以后，通信只给我带来痛苦。”

“这么说，您只是要把这件事情播出去？”

“是的，”我答道。

我愈说下去，问话人的脸色愈是温和可亲。后来他鞠了一个躬，说声“再见”，就走出了监房。

过后他就到帕坡夫那儿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对我们采取那种报复手段的原因。前些时候帕坡夫曾想通过一个年轻宪兵的手偷偷送一封信出去。这封信是给他母亲的，信里并没有违碍的话。我们中间只有赛尔该·伊凡诺夫知道这件事情。

那个宪兵是一个脸颊红红的年轻人，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就由他来把监房的垃圾取走。有几次帕坡夫居然找到机会单独跟他在一块儿待一两分钟。那个年轻人每次都对他表示同情，并且说早就愿意给他尽一点力；只是担心会被发觉受到惩罚，所以至今不敢说出来。“没准也会给关起来，跟你们一班政治犯关在一起。”

帕坡夫决定利用这个朋友的一番好意，便把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他，请他代投到邮筒里去。可是就在这一天里信落到司令官的手里去了，并不是那个宪兵出卖

了帕坡夫，而是他的愚蠢误了事。

那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现在倒是容易明白的了……

于是开始了惶惶不安的日子。不知我们以后的命运如何，种种思绪纠缠着我们。谁都没有出来散步，呆在自己的监房里，想出了种种的假设。

事情并没有决定。我们的假设显然都是没有根据的。司令官奥布霍夫要我们把手头的利器全交出去。他还说他在一个星期内就要离开我们，督察长也要走。因此我们知道监狱里人事上的大变动就要实行了。这就表示我们的事情顺利，会得着完满的结果。

在三月的末尾安托诺夫告诉我们说新的司令官到了。果然他不久就来看我们。这是一个熟人，军官雅科夫列夫，从前我们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面，接见家属时，就是由他在旁边监视着的，他曾经押送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到绞刑台，他又是沙科罗夫在亚历克赛半月堡时的同事。

他宣读了一份文件，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从这文件看来，他们好象要多多少少限制一点我们的自由，取消一点我们的权利，总之，要处罚我们。然而事实上重要的措施只是：夜里监房得亮着灯①，不准我

① 我们通常都把电灯泡罩起来。——原注

们房里有小玻璃瓶子。

他们取消了帕坡夫的结伴散步的权利，期限是一个月；对我却没有取报复手段，只是从前那个不许我通信的命令仍然有效。

同志们很高兴，他们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地结束了。

第二天我们又出去散步了。我也走进了我一个月前在那儿散步的“笼子。”可是我这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在过去四个星期里面我已经体验了那么多的事情，这种体验是很痛苦的，很锐敏的。我一个人关在监房里面，抱定了决心要正面地跟命运对抗：要准备或是死亡或是永远单独地给关在某一处暗炮台里面。应当使自己心硬如石，甚至就变成一块石头。此外我什么都不想。我也不要同志们的同情。主要的是，不要让我那班同志和我自己给软弱征服——凡是一切可能引起动摇和软弱的，都得尽力压住。

在我入狱以后最初几年中间折磨我最厉害的那些可怖的梦，现在又来了，不过换了另外的内容：我不断地梦见监牢里的骚动和斗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帕坡夫把督察长打了一下。帕坡夫跟宪兵发生了一场厉害的格斗，他们打了他；然后又是麦秀根的情形，一八八四年圣诞节那天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重现了：这是晚上七点钟。锡钵掉在地上的响声，嘈杂的人声，脚步

声，和一个人的哀叫："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杀了我吧，只是不要打我！"

不然我就梦见鲁加雪维奇站在我面前，那个可爱的、温柔的、身材魁梧，却有着纯净、清明的儿童眼睛的鲁加雪维奇。他写过一封关切的信给我，信里充满了敬爱和忠诚的友情。现在在梦中我却看见这个温和的人为着我的缘故发动了激烈的抗议。他暴怒地扑到他的对手的身上去；一群宪兵把他推倒在地上，用脚踢这个漂亮、强壮的人。我恐怖地醒了过来。仿佛有一根锋利的针刺进我的喉咙里似的。我觉得呼吸困难，赛尔该·伊凡诺夫的颈部痉挛现在让我也得到了。①

再不然我就梦见我死了；沉重的墓板压在我的胸上，石头的寒气从我的四周袭来。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身体组织逐渐变凉，我的内脏慢慢在麻痹。最后我带着一声痛苦的惊呼醒了过来，眼泪象泉水一样不停地从我的眼睛里流出……就是这些苦闷的白天和痛苦的黑夜；以后又是这些痛苦的黑夜。

在我恢复散步的第一天，鲁加雪维奇就在我隔壁

---

① 许多年以后只要我受到较大的惊恐刺激，这种颈部痉挛马上就会发作，它好象是我在牢里经历过的大的恐怖刺激的一个后遗症。——原注

的"笼子"里散步。我不知道为什么恰恰是他在那儿，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最先看见的同志就是他。他是单独在那儿。要是遇到两个人倒更困难了。我简直讲不出一句话来；我的声音又变成尖锐而微弱的了，就跟我在最苦闷的时期中有的那种声音完全一样。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很艰难地从我的嘴唇里吐了出来。

我默默地在篱边我临时安排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们两人都不作声。

我在这些日子里就一直等待着军法裁判，我觉得死亡就面对面地站在我跟前。我一直在等着它，准备着去迎接它。因为我得事先准备好，不要到了那个时候胆怯。这四个星期的等死在我的身心两方面不能不产生破坏性的作用。

可是我也感到了巨大的快乐；我暗自庆幸我居然找到了发动这一个强硬抗议的力量。在我看来与其永久关在地牢里还不如死在绞刑台上。死在监牢里……自白地老死，这不是可怕的事吗？

不论你怎样安慰自己，怎样坚信你在牢中受苦仍是为了你进牢之前就为之奋斗的那个自由思想，坐牢仍然是一种消极的、无可奈何的状态。一种怎样的固定不变，怎样的麻木僵硬不仁！人身上最好的品质都被深深隐藏起来，不得显露，它被压抑，被窒息，就象没有

似的。于是疑惑来了，怀疑自己，怀疑同志们。因为你周围就剩下十几个人，这就是你的狱墙内的全人类，于是你开始忘记人类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你丧失了感受伟大的东西的能力。爱和热情并不曾得着培养，也没有一条出路，它们被人连根截断了。而生活，痛苦忧郁的生活仍旧没有终结地慢慢拖下去……一直拖到死在监牢里吊床上为止。不。我宁肯死在绞刑台上！不是死在消极状态中，而要死在行动中，死在为着朋友、为着同志而发动抗议行动中……

可是现在怎样呢？他们又把这个死的可能性给我抢走了！他们逼着我准备去死，折磨了我，宰割了我，然后却又让我活着……

现在再回到生活里来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日子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一切似乎已经定局了。狱规也不再应用了。

有一天在我们中间传遍了一个消息：宪兵们搬了好些木条和木板到老监的院子里去：他们正在那里建筑什么。忽然间一个消息传来：佛罗林柯从窗户里看见宪兵们往那儿抬去一部分绞刑台的架子。整个监狱都给惊动了。安托诺夫说："我们得向薇拉告别了。"

在监狱的暗雾中一切都带着一个夸张的、走了样的形状；生活里充满了幽灵——我们的生活纯粹是个

幽灵。现在又是生死未卜了；我们又成了“一群盲人”，没有一个向导，闭着眼睛，伸出双手，摸索着，每走一步，我们的脚都会踏进一个深渊。

不错，宪兵们搭了一座绞刑台，没有人知道这是为着谁搭的。不过既然有了一座绞刑台，就得有一个人被处死。谁要被处死呢？这绞刑台是为着谁搭的呢？这种惶恐不安的情形一直到五月四日的黎明才算是结束了。

绞　刑

五月三日早晨七点钟过后不多久，我的邻人安托诺夫给了我一个警戒的信号："你看！"我连忙跑到窗前。一群穿军服的人从监狱的大门口走进来，他们挨得紧紧的，在他们中间走着一个穿羊皮短上衣的人。[①] 我们明白了。一个囚人给带进要塞里来了。

我同时起了两种感情：悲哀和快乐的期待。我悲惜一个年轻的生命现在被他们埋在我们这个共同的坟墓里面；我感到近于喜悦的兴奋，因为一股新鲜空气，一股从那个在狱墙外面进行着的战斗中传来的空气就要吹到我们身边来了。虽是这么说，然而为着那个陌生人的痛苦还是要比为着我自己的快乐来得强些。不过这个囚人并没有给带到我们的牢里来；他们把他引到要塞的院子里那个办公室去了。

① 这是司节潘·巴尔马雪夫，他因刺杀内务大臣西比雅金被处死刑。

我们吃过午饭以后安托诺夫严肃地说："院子里有一个牧师……"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明白，便问道。

"要执行死刑了，"安托诺夫忧郁地解释道。

自从一八八四年以来在卫城的大院子里已经不止一次地执行过死刑了；密纳科夫和麦秀根死在这儿，随后是施特龙贝格和罗加乔夫，在一八八七年鲁加雪维奇和诺瓦鲁斯基的案子中有五个人在这儿被处死刑。然而这些死刑都是秘密执行的。他们秘密地进行这个工作，不让我们看见或者听见什么。

不透明的玻璃窗，厚的墙壁，绝早的时刻，趁大家都在睡眠的时候，使人完全想不到在近旁发生了一桩不寻常的事情。

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玻璃窗是透明的；我们看见有人被带进要塞里来，他们要把他带到卫城的院子里去，一定要经过我们的窗下；我们应当看得见发生的一切。

等待一次死刑的执行，这感觉是多么可怕！这是对于另一个人的逐渐逼近的、完全确定了的死期之一种肉体的预感。……他是早晨七点钟光景给带进来的，他现在没有二十四小时可活了。……现在只剩下二十个小时，现在是十五小时，现在是八小时……五小时。每

过一小时，生命的线又缩短了一些，就象一根有弹性的带子在我们的眼前渐渐地缩短，缩短。小时过去了，可是分和秒却好象停住不动了；它们是那么沉重，那么难移动，这些分钟是太长，太紧张了。

看守长轻轻溜过监牢的窗下，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他把身子紧紧靠住墙，怕被人看见。一个宪兵跟在他后面，也偷偷地走过去了，他衣裾下面藏着一把锯子和一柄斧头。从远处送来了绞刑台搭成时最后的一些响声。"他"一定会由他们带着在黑夜里走过我们的窗下。我们都不肯睡觉，我们至少可以用我们的眼光伴送"他"。

然而我们大家的警醒还敌不过宪兵们的聪明；我们中间并没有一个人看见在黑夜里那个定罪的人怎样并且什么时候被他们押出去了的。

五月四日三点钟，天刚发亮。在要塞的院子里白色的建筑是看得见了；一排军官们的住宅，前面有一条宽而光秃的小路，在小路的另一边是一座白色教堂和一些没有叶子的黑色树木，它们这时候在微光中显露了出来。这个院子在晨光中显得荒凉、死寂，晨光给这个阴郁的地方染上了一层淡黄色。可是看，已经有人影在动了：督察长，他的副手，司令官，卫兵队长，医生，牧师，宪兵们一个一个地出现了。他们排成一个单行

沿着褐色的小路向监狱院子的大门的方向走去。一个衣服穿得厚厚的工人模样的壮汉走在另一边，他好象是一个无赖汉和麻风病人似地单独走着，前后都有一个宪兵——这是刽子手！那一群人走过了我们的窗下，这一个人也过去了，他们都在卫城的大门里面消失了。在这黎明的黄色的微光中，一切又成了荒凉、死寂。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捱过去——这是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分钟了。

穿着黑衣服的牧师的影子又出现了，他独自拖着缓慢的、疲乏的脚步走来，他的背大概被他所看见的一切压驼了，他愁烦地落坐在教堂旁边的一根长凳上。

四周又是一片静寂和凄凉，在这静寂中埋伏着那个逼近的死亡。

……事情已经完了！司令官回来了，随后是督察长，宪兵，还有一个穿着司法部制服的人。那个衣服穿得厚厚的壮汉又出现了，仍然象是一个无赖汉和麻风病人的样子。他们走出我们院子的大门时，里面有一个人避着刽子手，不愿意同他走在一块儿，这个人佩着司法部的证章，这时便把头掉向着我们，望着我们的窗户，他当然会看见了我们那些贴在玻璃上面的苍白色的脸。他掉过来他那张光滑红润的宽脸微笑了——他无耻地、得意地、挑衅地微笑着。

然而一个宪兵（他的职务逼着他护送官员们到行刑的地方去了的）正要跨过大门的门槛时，忽然抓住自己的胸膛结结巴巴地说："大人，我不能够！……放我去吧！我受不了啦……我不能够……"

违　约

在一九〇二年三月和四月里那些骚动不安的日子以后，差不多又过去了一年了。这三百天的灰暗的日子已经把那些痛苦的经历给我们抹掉了。到了一九〇三年正月十三日那天，我平静地坐在我的监房里，一点也没有想到命运正迈着沉重的脚步来敲我的门，对我说："出来吧！"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门闩在响，锁也在响，于是门开了，司令官带着几个宪兵走了进来。他演戏似地举起手提高声音慢慢地、加重语气地通知我说："皇帝陛下因你母亲的哀求……开恩将你的终身苦役罪减为二十年徒刑。"然后停了片刻他又接下去："你的刑期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为止。"

我起初听到他用庄严的调子说出"皇帝陛下"几个字时，我想："这是对于'肩章事件'的过期的处罚吧。"其实这比我接着听见的后面的话要好多了。我呆呆地站在那儿；我以为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的地方，因为我母

亲知道我的思想，她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去要求赦免我。我便发出一句愚蠢的问话：

“这是一个普遍的敕令，还是单单为着我一个人的？”

“单单为着您一个人！”司令官不高兴地、短短地回答，他又添一句：“现在您可以写信给您家属了。”

可是我并不想写信。我生气，我觉得受了侮辱；我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跟母亲断绝一切的关系。跟她断绝关系，跟她，我所爱的人！跟她断绝关系，我跟她的分离已经使我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了！我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写信给她了，不曾接到她的信也有一年了。在这时期中间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被禁止通信的这一年半的长时间里面，我母亲知道我一些什么事呢？我还不明白真实的情形，我便勉强镇静地答道：“等我的家属先写信来吧——我会回信的。”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把我遭遇不幸的消息用敲壁法通知我的同志们（因为我的恩赦对我是一个不幸的灾祸）。这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的母亲，我那个坚强而勇敢的母亲怎么能够替我“哀求”恩赦呢？她先后送走了她的两个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女儿，她都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甚至不曾表示过一点软弱；而且当她跟我告别的时候，她不是答应过我不代我要求减刑吗？我相

信她就跟相信我自己一样，她出了什么事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逼着她违背了她跟我分别时候庄严地许给我的诺言呢？

母亲去要求皇帝开恩，她是违背了我的意志的；我不要谁开恩；我愿意跟我那班民意社的同志们一块儿忍受艰苦，支持到底。现在母亲不先问我，不让我知道，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她就毁坏我的生活。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吗？她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她素来尊重别人的信仰和别人的个性，而且她还教我也尊重这些。她怎么能这么粗暴地、这么专断地毁坏别人的生活！？摧毁别人的意志！？皇帝的特赦使我蒙受耻辱。是谁使我受辱的呢？我的母亲，我亲爱的，我非常尊敬的母亲。……她使我受了辱，可是她也叫她自己受辱。同志们安慰地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我听见这句话，心里多难过啊！

一个痛苦的思想不断地苦恼着我：我母亲究竟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她那颗母亲的心为什么忽然变软了？难道她获悉在十八年前判了罪的我现在还得给再判一次罪吗？难道她获悉他们在十八年前判了我死刑、现在还要再判我一次死刑吗？她获悉了——所以她变软弱了。是不是她因为我们长久的分别和对我的命运的担心而变得软弱了？是不是她忍受不下去，而且忘了

我们分别时她给我的诺言呢？

在监牢里的孤寂中毫无头绪地胡思乱想，这实在是难堪的痛苦。我不得不以为，她对自己不忠实，她出卖了我，而我又是在远处看不见，不能够对她叫一声"止住！"我不能够拦住她那只哀求恩赦的手。

三天以后解释来了。这是母亲的一封信，一封告别的信：她快要死了；她已经病了三个月；她开过了两次刀（我的妹妹们附笔说，是割治癌症）。我曾经气得那么厉害；我曾经准备跟我这个世间最亲爱的人断绝关系，——我不知道她已经站在死亡的门槛上了！我能够做什么呢？难道一个女儿还能够对她那个患病垂危的母亲说些责备抱怨的话吗？我得回答她，我的回信也许就是她活着见到的最后的一封了。

我的残忍的心软化而谦卑了。在我的记忆中抱怨和责备全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我所做过的一切对不起我母亲的事情，和她对我的一切的好处。我记起了我的童年，她在那时候就建立了我的人格的根基；在我被捕以前的恐怖时期中她又给了我以道义的支持；我在监牢里候审的时候我们难得有的几次的会面使我得着莫大的快乐，在那些关系生死的审判的日子里我们的会见又给了我无限的安慰。我记起了一切。她给了我的真是太多，太多了。而我呢，我又给了她什么呢？

起初是我的早婚使我跟她分离了，随后就是革命的活动以及这活动的结果分开了我们，我究竟给了她什么呢？就只有哀愁，而且是那么多的哀愁！冷淡，自私，这是年轻人对待父母常有的态度；缺乏了解，辛辣的话，令人不快的微笑，或者由于我那年轻人的自负而来的吹毛求疵……我全记起来了，这些醒了转来的记忆使我痛苦。在这一生中我所给她的除去哀愁外，什么也没有，真是一点也没有。现在结算的日子来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怀着悔恨的心记住她对我所做过的一切，跪下来；跪着用我的眼泪洗那一双亲爱的手，求她宽恕我，……我的确在恳求她的宽恕了！在她的回信中来了这一句我永不能忘记的话："母亲的心是记不得任何悲痛的。"

生的恐惧

那么我就得在二十个月后离开席吕塞尔堡了。从被捕到出狱我一共在监牢中度过二十二年的长岁月。我还有二十个月的时间让我思索，让我想到将来。在我的面前产生了一个伦理问题，这问题大得就象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命运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一个第二次的生活，不过我进到这个生活里面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知识和经验的婴儿，也不是一个前面有着种种的生活的可能性的小孩；更不是一个后面不曾留下什么、前途却有着万事万物的青年。我有过一个长的、复杂的"过去；"我的肩头压了一副重担：一条短的烧红的革命斗争的路，然后是一条长的使血冻结了的监禁的路。我现在得挑着这样一副担子重新走进生活里去。我已经五十岁了，也许还要再活二十年。我拿它们来做什么呢？我用什么来填满它们呢？我用什么来照亮它们和净化它们呢？想着这些问题是很苦痛的、可怕的，然而我的内心的声音却不分昼夜地反复提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帮忙我解决这些问题；书也不能够，同志也不能，朋友也不能。它们必须由我自己来解决，我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听见。我的前面就是生活，可是在我四周却没有坚实的土地；在过去二十年中我每踏一步，土地就从我的脚下退去，原先是土地的地方，这时却变成了一片空虚。最近二十几年中生活是朝着什么方向走的？在这些年里面死了些什么，压下了些什么？什么给排斥了，什么给毁掉了？什么又生了芽，长起枝，发育起来，或者还成熟了呢？究竟是些什么呢？

我的处境就象一个必须游泳而自己却不会游泳的人；又象是一个人：在过去有一个时候是会游泳的，可是已经忘记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办了。在这个人的前面和四周都是汪洋大海，而且海水慢慢地浸蚀着他站立的一块小地方。不管他会不会游泳，他却必须游泳。他还有时间，他趁着这时候考虑一下他应当怎样游泳。他考虑身体的动作，他应当怎样运用手脚，朝什么方向游去，大陆在哪儿，以及他的力气究竟有多大？他担心自己，并且也怀疑自己，他又害怕海会起大浪，他迟疑着：他应当做什么，他应当怎样办？没有人能够帮忙他，给他贡献意见，告诉他，下水后应当怎样办。

现在在我的面前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出了监狱以后我会遇着些什么事情，我以后应当怎样生活……

在那时候，他们让我们读契诃夫[①]的全部著作。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们把他的书拿给我们读，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书是不许读的。我开始读他的书，我贪婪地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到后来我悲痛地对自己说："不，我不能够再读一个字了。"我正站在一个第二次的生活的门槛上，却看见一大群意志薄弱甚或缺乏意志的人，失败者和忧郁病患者接连不断地走过我的面前。一页接着一页，契诃夫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不和谐的生活的场面，以及人们不能过正当生活的可悲的情形。"三姊妹"[②]没有目的地在生活中彷徨，希望搬到莫斯科去就会得着救星。然而事实上一个人是精神忧郁或是有创造生活的朝气都在于他自身；那些"姊妹"在莫斯科也会毫无结果地憔悴下去，就跟她们在外省时完全一样。

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并不积极地工作去改善生活，他们并不为着这个目标奋斗，他们却在沙发上面坐下来，一面说："我们来讨论一下两百年以后会发生些什

① A.Chekhov (1860—1904)，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② 这是契诃夫的一个剧本。主角是三个姊妹。

么事情！”他们没有播种，可是他们却要收获，他们梦想着这收获，好象并不要靠他们自己和大家的努力，这收获就会自己来的。……这种消极的“为人类追求一个快乐、幸福、美满的生活”的梦想便是在他们整个生存的黑暗中闪耀着的唯一的火花了。

难道现在这一代人是这样的吗？难道生活真的是这么无聊，不活动，死一般的吗？倘使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走出这儿到生活里去，又有什么好处呢？倘使生活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牢里憔悴和在牢外憔悴又有什么分别呢？人不过从要塞的墙后面走出来发觉自己是在一个更大的监牢里罢了。要是这样，还用得着出来吗？为什么要拿确定的沉闷无聊去换来不确定的沉闷无聊呢？不错，在一九〇一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送好消息的信差——卡尔帕维奇。不错，他是勇气和信心的化身，他给我们保证：我们的祖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前夜”时期。他说，全俄国都充满了为着争取自由，为着根据新的主义改造生活的年轻而奔放的热情。一切都在骚动，沸腾，不安静。他对我们讲起了城市无产阶级的觉醒，他们阶级意识的成长，以及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面的出现；又讲起那些觉悟了的大学青年怎样叫出了争取权利与自由的勇敢的口号。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了西部省份的匠人的组织作为例子。看来好

象有一种新的精神在俄罗斯平原的上空飞翔，而当初我们进监狱时,俄罗斯却是十分沉寂,没有组织,逆来顺受的。二十年过去了,俄罗斯现在却象一口大锅,里面装满了煮沸的浓浓的液体,满到锅边了;它已经开始在起泡了,一股一股的热气正从锅底升到面上来。不久,不久整个锅里的东西就要动起来并且要沸腾了。

我沉思着。卡尔帕维奇对我们讲的果真是事实的正确估计吗?难道他没有把现时的革命活动估计得过高吗?卡尔帕维奇,那个送信人,他到我们监狱里来用活的水给我们的死了的灵魂施洗礼，难道他没有生活在一个抱着过高的、热烈的希望的特殊圈子里面吗?也许这个圈子就是在全国的盖着冰的表面上一股小小的熔岩的热流吧?农民在哪儿呢?那八千五百万的农民在哪儿呢?那些落后的乡村地方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契诃夫就是这种沉闷无聊的外省生活的描绘者。卡尔帕维奇画的却是革命运动和工业中心的生活，在这些工业中心生命的脉搏,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的脉搏,跳得非常厉害。他只画出他们的大致轮廓。而契诃夫却绘出了一大堆人,并且是活的、有人性的个人，这些个人都是从极深处,从俄国的主要地层掘发出来的。就是这种平常人,这种普通的俄国典型人物,他们在日常生活的龌龊雪水中间,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去“讨论两百年以

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我连契诃夫所描写的那种外省未垦地也去不了，我也不可能跟它那些医生、农业家和爱说教的教授们一块儿生活，而会住在真正的、毫无希望的不毛之地。我会被他们送到萨哈林岛去，或者送到雅库次克省去，因为以前凡是服满刑期离开席吕塞尔堡的人都是给送到那边去的。我得住在那个可诅咒的岛上（在那儿虐待、凌辱、甚至笞刑等等都是天天有的事情），生活在一群法外之人、罪囚的中间。在那个岛上一方面是凶残严厉、无法无天的行政当局，另一方面是因了贪欲、谋杀、抢劫以及各种强暴行为被社会逐出的人们，要我在那地方生活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或者他们会把我送到北极圈附近积雪的荒原里去，住在一个雅库特人的游牧村子里，在那儿只有寥寥儿所雅库特人的小屋，并且除了那些未开化的土人外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与谈话的人。

这样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呢？为着这样一种生活就值得离开席吕塞尔堡吗？在狱墙外面怎样生活呢？靠什么生活？而且为着什么？

母　亲

这一类的思想正啮着我的脑子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妹妹们已经得到了许可，每隔三四个星期给我送来短短的消息报告母亲的病状。一直到她的死期为止(她死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整整有十个月里面，我都是生活在一种可怕的神经紧张中。来的消息常常是冲突的：她的病一时好了一点，接着又加重了，这些消息使我感到说不出的焦心和痛苦。我一直想念着垂危的病人，我的妹妹们相信从圣彼得堡来的消息会使我心安，其实却相反，这些消息却只有增加我的不安和痛苦。

我觉得好象有一根秘密的带子把席吕塞尔堡中我的监房跟圣彼得堡的我母亲的病房连接在一块儿；要是我情绪好一点，我就宽慰地想到，母亲的病有起色了；要是我感到非常的不安，我便相信我母亲病到临危了。

她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永闭了眼睛。好心的宪兵们不愿意叫我受到刺激（据督察长后来向我解

释），没有把妹妹们报告母亲死讯的那封信交给我，却让督察长口头告诉了我母亲病故的消息，可是他竟那么粗心，把事情搞错了，他对我说，我母亲要葬在圣彼得堡。

我知道圣彼得堡对我母亲永远是陌生的地方；除了她儿女的教育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她跟这首都中间的联系了。她所爱的、所宝贵的倒是喀山省的尼基佛洛沃村，我们的"老屋"在那儿，那地方的一切景物都使人记忆起她的童年和我们的儿时，以及我们共同生活里的种种悲欢。她愿意安睡在那儿，在我父亲和我们的保姆的旁边……

我还会看见她吗？……不，我不会看到她……不会看到……不……我会看到……这就是我在那十个月里面不间断地想着的问题，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狱的那一天。现在我用不着再担心了。母亲等不到我的释放了，她再也看不到我了。

也许这样倒反而好一点：否则她会看见我变得象当初我们分别时她那样地老了。并且她也不会再是我在一八八四年最后一次拥抱她的时候的那种样子；我见到的会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完全变了样子的人，二十年的长期等待和那可怕的疾病一定把她折磨得不象样

了。

紧张的神经突然间松弛了下来；我是整个地垮了，我落在这样一种心境里：我不想看，不想听，也不想说；我再没有一句话了，只有无穷无尽的身体的虚弱，和极端的心灵的麻痹。……

十二月这样地过去了，一月也过去了，来到了三月。

这年三月，圣彼得堡地区的天气是往年少有的。天天晴朗，太阳晒得特别热。我整天躺在那班照料我的同志照原始人的方法给我做的躺椅上。没有人来打扰我；在无云的春日天空的下面，我的周围非常安静。太阳向各处放散它的炎热的光；疲劳衰弱的身体和心灵在微睡了。

二月里我收到了去年十一月他们扣下的我妹妹们的来信。她们写着全家伴着母亲的遗体回到了尼基佛洛沃，把她安葬在那儿，这是遵守她的遗命做的。三月九日我给她们写了回信：

"我亲爱的！我现在不想跟你们谈我们母亲的事，也不想谈我自己的心境。我为什么要来苦恼你们呢？至于我的心境，我可以用两个词儿来形容：悲痛和疲乏。悲痛，因为这二十一年来她一直是我

的感情的中心；疲乏，因为整整一年里面我一直怀着惊惶、不安和恐惧站立在她那未封闭的墓前。我想到是你们大家一块儿伴送她到她的永久安息地，想到她并不睡在寒冷、生疏的圣彼得堡，却葬在她生前那么喜欢的尼基佛洛沃，那地方原是我们大家素来就热爱的，现在它对我们是更接近、更亲爱了。我常常想一个人要是有一个跟自己儿时的回忆相联的特别喜爱的地方，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学到爱天空和田野的广阔；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我们家庭中种种大小事情，并且我们亲爱的死者也就安睡在那儿。

"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象着你们回到尼基佛洛沃的旅行，我这样一想，眼泪就淌了出来。也许你们护送母亲回家的那一夜，就是我做了一个使我非常感动的梦的那夜晚。我梦见我们四姊妹坐在一辆雪车里面，路上没有一点雪，并且非常黑，我们的雪车经过一个村子，时而上山时而下山地跑着。我们走过一排排漂亮的农家房屋，到处都是为着步行者造的微斜的石级，长着无叶树的广场，和盖着金黄色屋顶的凉亭。在这村子的中心，在一座小山上，耸立着一座白石的教堂，这教堂有着不少优美的金色圆顶。当我仰起头朝上

看的时候，我看见从天空悬垂下来一个水晶的华盖，罩住了教堂和整个山，这华盖美得叫我惊奇，而且它使我想到了北极光。我们离开这村子时，看见前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油油的田野，上面蓝天里照耀着一轮火热的太阳。因了某种缘故，这使我想起了我以前见过的一幅图画：一群进香者徒步走着；在他们的前头远远地现出了一座城市的轮廓，这好象是挂在云里似的，画上面题着一句：'欢迎你们，找寻主的城市的人！'我醒过来时，有着一种非常兴奋的心境。现在，我在二月十一日接到你们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寄来的信函，读到你们怎样护送母亲的遗体回到尼基佛洛沃去时，我发觉你们的描写跟我的十一月里的梦境多少相合，我真愿意相信在你们护送母亲的那一夜我的灵魂也在旁边伴着你们……"

前　夜

时间不停地过去。我生活中一个大变更的日子，我离开席吕塞尔堡的日子愈来愈近了。

我想到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一点儿快乐。一点儿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我问一个应当跟我同时出狱的同志，他是不是感觉到了就要来的自由的气息，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站在生活中一个可喜的大转变的边界上？

“不，”他回答我说，“我什么也不觉得，我就象木头一样。”

另一个关了二十二年现在也应该出狱的同志对将来也不抱一点希望，他也不感到丝毫的快乐。自由来得太迟了。

我那位邻人兼朋友的同囚者对我谈起广阔无垠的天空，谈起夜晚的星星，谈起跟自然界的接触以及由这种接触而得到的快乐。

然而我那时候并没有想到无垠的天空，也没有想

到星星。我正在思索着生活的目的与意义。……当我还不知道怎样去生活的时候，天空和星星怎么能引起我的兴趣呢？

我还记得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多么渴望着“自由的”天空和它的星星呢！现在连这个渴望也死了。心灵麻痹了，冻僵了，一切对于美，对于世界的渴望都泯灭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片无限的空虚。……

只有一次我起了一下颤栗，这是一种模糊的自由的预感，生命的脉跳。那是在晚上，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桌前，脸对着窗；我象往常那样拿背朝着门，避免碰到从门上“洞眼”望进来的宪兵们的讨厌的眼光。这是七月的末尾，离我出狱期只有六十天。在闷热的监房里我清楚地感到从外面吹进来的潮湿空气的新鲜气息。突然间我听见了船轮的击水声，不多久就响起了一只小火轮的汽笛。

我打了一下颤。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次伏尔加河上旅行的回忆。天色阴暗中我站在甲板上，我努力想看出水跟岸分界的地方，却看不出来。只有在很高的地方，一些小屋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孤寂的灯光，在阴暗中闪烁。山上散布着很多很多小小的光亮。……

咳，这个伏尔加河上的黑夜，我站在小火轮的甲板上！船轮的响声，汽笛声……灯光和树林的声音……自

由……自由的生活……

一阵颤栗通过我的全身……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与疑惧——伏尔加，小火轮，夜和灯光，以及人们渴望船靠码头的心。……是的，畅快地呼吸大口的自由的空气！渴望！……

于是一切又回到静寂里了，在我心里，在我四周都是静静的。好象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七月里我在狱中最后一次收到我妹妹的一封信。我回答她们说：

“这的确是你们的最后的一封信，可是我读了它，我仍然跟往常一样，不能不感到悲哀和痛苦……你们说我上次的信很使你们担心。然而我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我不给你们写信，你们一定会着急起来又要到官厅去质问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总得写完它。并且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们告诉我，母亲坟上的碑要做成神龛的形式。不过我更喜欢十字架和围篱。……可是照我看来，主要的装饰物应该是花木。往常在冬天，月光总是照进我的监房里来，使我常有一种特别的心情，这是我从前在乡间度夏时的那种愉快的散步的回声。……然而在这一个冬天一切都改变了。月

光也特别显得毫无顾忌地乱闯进来，我总是看见积雪的田野和我们尼基佛洛沃村的墓地：一片冷雪发着寒光，雪风咆哮着，天空中高高地挂着同样的一轮明月，它就是照进我的监房里来的那个月亮。我看见那儿一切都是多寂寞，多荒凉，多寒冷，多凄惨。……随后我想起了，要是在这墓地上新种上一些枞树，那是多么地好，不论在夏天冬天枞树都是常绿的。那么看起来它也不再是那么凄凉的了，并且这个给绿树环抱着的小岛使得整个地方都显得好看多了。枞树又是那么细长，那么漂亮，看起来使人的眼睛非常爽快。就是在瘦瘠的土地上它们也会谦虚地长得很茂盛，我以为它们是我们那地方的植物中最美的一种。我们母亲在克利斯托弗洛夫加，在那条到凉亭去的路上种了两排枞树，这美丽的枞树荫道使我自小就爱上枞树了……

在契诃夫的一篇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卑鄙无聊的人，作者责备他的最后的一个缺点是：他一棵枞树也不种，一株小花也不栽。我们母亲在这方面却占着很高的地位：她总是在想法使大地美化，尤其是她住过的地方，她把它装饰得比她初看到它时美得多了。

你们一定会奇怪，在我生活中这么一个重大的转变的前夕，我给你们写信，竟然没有关于未来的话。可是我的头脑里只有一片混乱和不安，在我内心一直在活动，但我不能够把它具体地写出来。一个人跟生活的程序完全脱了节，就会让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抓住。生活变成了谜一样地难解，而且复杂。……人本来也可以正视未来，理解命运，向它索取答复，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问题仍然原封地摆在那里；一切都给包围在雾里，未来的事情一点也没有给透露出来……

我的外表的生活并没有一点改变，我仍然象往常那样地忙着，可是我也渐渐在清理我的事务，把一切逐渐地整理清楚。

再见，我吻你们大家，大的小的都在我的念中。要来的事终归是要来的。"

烧 信

离我出狱的日期只有四天了。我坐在我的监房里桌子前，对着面前一堆抄本和信件，我不禁百感交集，我时而哭，时而笑。

司令官刚才还对我解说过，凡是我要带走的抄本，都得先送到警察总署给检查过才能够带去。“关于席吕塞尔堡，不许提到一个字。等到检查过后会退还给您的。”不许一个字提到席吕塞尔堡！检查过后退还！

我最后一次翻阅我的旧稿，我动手毁灭那些曾经给过我很多的安慰和快乐的东西。我的手颤抖地烧毁我的同志们的宝贵的字迹，它们也曾不只一次地使我感动过，使我欢欣过。我永远不会再看见它们了，并且得由我自己一个人来做这种毁灭它们的卑鄙的工作。我把每一张字条重读了一遍，我始终记着：这是最后一次在读它们。

这是一大堆东西；有严肃的，有诙谐的，有悲痛的。我所经历过的狱中的欢乐，误会，和解，感谢，以及我们

生活中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在它们里面全都反映出来了。这里是些漂亮的文雅的字迹：乐巴丁的全部文学论文都在这儿。那里是鲁加雪维奇的笔迹，那个亲爱的鲁加雪维奇！他是那么了不起，那么好——单看他那对深透的孩子般的眼睛。就是放在一千个人的笔迹中间，我也会认出他的字来。这一幅地质学的图是他送我的礼物。又有一张他的字条上面还留着一九〇二年三月的日期，它曾经使我非常感动，而且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真的应该把它也烧掉吗？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那是波希托诺夫写给我的一张字条，当时他还没有发狂。这一张是——瓦西里·伊凡诺夫的字条，因为他开了一个不适当的玩笑说拉哥夫斯基给人搬走了，我责备他，他写这字条向我解释。接着是一张乐巴丁的画：画里一根圆柱，圆柱上面有一只小老鼠（就是我），下面有一只狮子（这是乐巴丁自己），还写上一句格言：我服务，我却不伺候人。啊，你这只骄傲的狮子乐巴丁！又是鲁加雪维奇：几行字和一只彩色小鸟的画。诺瓦鲁斯基的诗和字条。帕坡夫的一张英文字条。我读着，实在不能够止住笑；他带着滑稽的笔调叨唠不休地为了我送给他的我花园里的果子向我道谢。莫洛左夫的诗。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严肃的和诙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么真挚和亲切！

我读着，我心里充满了伤感和感激，我感激这班跟我一块儿受苦的同志对我表示的爱。我觉得奇怪，象我们所处的这种生活环境很可能使人变坏，使人心肠变硬，然而我那班同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居然能够保持着那么多的永不竭尽的爱和温情，并且以他们那永不消灭的热情和精力一块儿倾注在我的身上。我不由地拿他们跟我自己相比较，这比较对我多么不利！我常常觉得好象我什么都不再爱了似的。我痛苦地感到，我缺乏着那种德行，那种在任何情形里面都能温暖人心的德行。

我把我的全部的宝物一一地重读过了。它们已经被我撕毁了；我擦燃了火柴。剩下来的只是一小堆纸灰。

我失去了某种东西，我埋葬了某种东西。这几乎是一些男性的忠诚的灵魂，他们信任地把它托付给我，我现在把它焚毁了。

再见吧，亲爱的友人！你们，再见吧，你们给我的是那么多；你们，再见吧，我所给你们的很有限，而你们回报我的却是你们的无限的爱，你们，再见吧。

“帕龙德拉”

在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受审讯被定罪以后已经过了二十年了，我应当就在这一天离开席吕塞尔堡。然而在二十七日的晚上本地官吏来通知我，我的出狱期不是在第二天，却已改为二十九日。而我在二十七日准备着第二天动身，就已经向留在要塞中的九个同志辞过行了。一切想说的话我们全对彼此说了，一切的祝愿也都说过了，一些小小的请求和委托也都记在心上了。然而意想不到的，来了一个延期：整整二十四小时，我们除了忍耐地等待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来填满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二十七日告别的时候，各人极力镇定、自持，虽然明知分别以后永无重见之日，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在离别时现出十分伤心的样子。有的人眼里含着泪珠，有的人声音嘶哑。“不，不，你们不要这样！”我说，连忙掉开身子，为的不使自己哭出来。

在我临行前几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离开席吕塞

尔堡时，一定会哭。"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热烈地抗议道。"哭！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还要哭？"

啊！不是在动身的时候，而是后来，在小火轮上，当席吕塞尔堡的圆塔和白墙看不见了的时候，我真的绝望地哭泣了。我向着同志们说那句话时，我只想到那个地方，我只想到那个把我活埋了许多年的石棺，却不曾想到那些仍旧被埋在那里面的活人。我不曾想到那些我不愿意离开而不得不离开的同志们。我的思想一转到他们身上，我对于那个摧毁精神的堡垒的愤懑立刻消灭了，忧愁与绝望代替了它；我替那些仍旧留在要塞中永无希望出来的人忧愁；我因为我自己遭受的无限的损失而感到绝望。不错，我就要失去二十年来在非常的环境中跟我亲密地一块儿生活、一块儿受苦的人们。这二十年来只有这些人是跟我一块儿处在平等与团结、爱与友情的地位中的。我只有从他们那儿得着了帮助、安慰和快乐。全世界把我关在门外，所有人间的联系都断了，可是他们，只有他们，代替了家庭、社会、党、祖国以及全人类。非常的环境用非常的锁链联结着我们。然而现在，在目前这种对我们中的一方特别艰苦的环境里，这些连锁却被弄断了。我的眼泪，我的绝望，我的哭都是有原因的。

"那些人"仍旧留在这儿，在绝望中消磨光阴，也许会死在这儿，然而我——我失去了精神方面的一切，正在走进一条生活的路，这条路可以称为"解放"或"复活"，可是在这来迟了的偏颇的快乐中有着讽刺、讥笑的意味。

九月二十九日四点钟，看守长打开了我的监房的门。我最后一次跨出了监房的门槛。我带着严肃的神情，非常紧张，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我沿着走廊走去，它那绳网和露台的布置，我当初刚进这要塞里时还不能够了解。我走过了那道架在绳网上面将这建筑物分为两层的桥——叹息桥。这桥通到二十六号监房，我一进要塞就给人关在那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在这桥上不知走过了千百次。后来我每天被带出去散步时，也要经过它，现在我是最后一次走过这桥了。小小的一方天井和那座看守们驻扎的建筑物便是我们这个死国的境界线，许多年来，只有死去的人才给人抬着跨过了这境界线出去。

我迈着平常那样的坚定的脚步走过那些熟悉的地方，就跟我以前千百次走过那里一样。我走着，好象我是去作向例的散步似的，或者是到工场里去做工，并不象是去迎接我生活中的一个大变动——回到"世界"中去的大事。……可是我一跨过境界线，进入一个新的陌

生地方时，我感到晕眩了；我的身子失去了平衡，地板象棉花似的在我的脚下退去，我用手去扶墙壁，墙壁也象舞台布景似地一下就逃开了。"我不能再往前走！"我抽泣地说，"我不能再往前走——墙壁在动！"

护送我的宪兵们抓住了我，不让我跌下去。"这是新鲜空气的作用，"看守长安慰地对我解释道。他这句关于新鲜空气的话是在一间永远不通风的屋子里说的，这屋子里驻扎着十二名卫兵，不分昼夜，不分年月，永远不会空着，而现在他们就列成一排站在这儿，可是他这话却使我马上清醒过来。

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走到外面了。我转过身去，朝着监狱的方向最后一次鞠一个躬。我的同志们靠着窗户的铁格子，这些铁格子窗支持着他们的身子，他们也挥着手帕，一边说："再见！再见！"那只要载我去圣彼得堡的小火轮还不曾到，所以我不得不在一间不通气的办公室里等候着，司令官和他的下属们匆忙地而且毫无必要地跑来跑去。

"您要喝点茶吗，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司令官问道。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不错！这二十年来，对于这班人我是没有名字的。二十年来对于他们我只是一个号码。第十一号，他们总是这样叫我，十分钟以前我还

是第十一号……现在突然间我就变成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了。不，我并不要他们的恩惠。

一个小时过去了，或许时间还长一点。后来督察长出现了，这是一个叫人讨厌的又卑鄙又顽固的人，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他。“请来吧，”他说。于是我们一小群人便向着要塞的大门走去。只要再走几步，我那些同志们还留在里面的这个监狱就会在我的眼前消失了。然而我并不曾回过头去——我害怕回过头去；我要控制我的感情，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成。

走出大门朝右便是拉多加湖。[1]落日正照在湖面上，湖水映着霞晖发出眩目的光，仿佛一只浅碟子上面涂着的水银似的。在岛的尽头处那个小岬的头上，涅瓦河的水灿烂地发亮，有无数的铅色涟漪在那儿打漩。一只小小的白色轮船静静地停在中流，对岸淡红色的薄雾中隐约露出一个村落的模糊的轮廓。一切都是安静而美丽的。我知道这种美，可是我却感觉不到，它并没有使我快乐，我并不曾让它迷住，我奇怪我自己怎么这样冷静，我只是眺望着。太阳在一个自由的、广大无垠的地平线上徘徊着。然而这个美景并没有给我

① 一半在俄国西北部，一半在芬兰东南部，欧洲最大的湖，约七千平方英里。

什么深的印象。暗云在向西方移动。我想：这云象哪一种颜色呢？我断定：天然色的墨水。我仰望着浮云，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景致跟我在某一份刊物上看见的一幅插图相象，但这是哪一幅插图呢？

督察长和几个宪兵一块儿押送我上了一只小艇，开到小火轮那儿去：轮船上没有一个人。“帕龙德拉！”我念着这个名字并且牢记在心里。“帕龙德拉”在水手们的隐语中是“当心”的意思。这是几天以后我会见我弟弟尼古拉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这个字后来常常折磨我的心。我在经历了那一切的痛苦以后，现在站在一个新的生活的门槛上，迎接我的并不是一句鼓舞的祝语，反而命运威吓地站在我面前，恶狠狠地吐出一句“当心”来！难道它是在警告我：“不要存着任何的幻想”吗？难道它是在说：“你还没有受够苦！以后还有多的”吗？这个不祥的警告折磨着我，使我想到在狱墙以外还有麻烦和苦恼在等候我。

小火轮离圣彼得堡不远了，我问督察长，他带我到哪儿去。

他答道：“昨天我把您的两个同志送到了拘留所去，可是您却是到彼得保罗要塞去的。”

我的心紧了。还是到一个要塞里去！

涅瓦河畔的华丽码头上灯火辉煌，晚上十点钟光

景，帕龙德拉在彼得保罗要塞附近靠了岸。

"上岸吧，"宪兵指着平常安放跳板的地方对我说。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站住动也不动一下。

"您为什么不上来呢？"督察长催促道。

然而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这儿什么都没有，"我答道。

"怎么没有！跳板明明在这儿；现在上来吧。"

"不，不，那是水。我怎么能够走那儿呢？"我坚持地说。

两个宪兵搀着我的膀子，引我上岸去，一辆马车等在那儿。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科伊侧厅的铁格子门对我是熟悉的。二十年前，我"抛开一切的希望"走出了这儿，那个"保证"看守的怜悯的眼光同情地送我出去，我的身上穿着灰布囚衣，背上缝着纸牌方块形A的标记。阶梯和走廊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每隔一个星期我要走过那里一次，去会见我的母亲和妹妹。这就是四十三号监房，我在候审期中在这儿关了差不多整整两年。可是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监房，并没有停留下来。这次他们给我换了一个地方，是在另一道走廊上。

监房大，可是天花板低。房里燃的是电灯，不象从前那样点煤油灯了。

新的环境常常是不舒适的。我刚刚在吊床上坐下，

正要集中我的思想，忽然听见门锁响，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军官迈着快步走了进来。他的脸瘦削而无血色。他有一对叫人讨厌的突出的灰色眼睛。

“您会高兴在这儿住下的，”他开始称赞我这个新居，并且做出得意的样子夸耀监房。“现在什么都两样了。电灯和卫生设备，”他说时，指着灯和没有盖子的抽水马桶，我后来才知道盖子是他们取掉了的，他们害怕囚人们在表示抗议的时候打着盖子响。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安地问自己道。我惊慌起来了。他分明是准备着我在这儿住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难道他们不送我到西伯利亚去，却把我留在这儿，他们不过是把我从一个要塞送到另一个要塞就算了事吗？这真是可能的吗？然而他却拿了种种关于席吕赛尔堡的问题盘问起我来。我在那边的生活是怎样的？我有书念吗？我可以接见家属吗？最糟的是，他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就不客气地在吊床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坐在我身旁。我受不了这个。我在监狱里变得非常孤僻，不惯于跟人接触，而且从来没有跟一个男子单独在监房里待过。我害怕这个翘着二郎腿坐在我吊床上的没有礼貌的陌生人。

“出去！出去！”我提高声音带怒地说，同时站了起来。

督察长显然没有想到会受着这样的接待；他从吊床上跳起来，立刻就不见了。现在我终于是一个人在屋子里了，然而我还是不能够静下心来。我这一天的经历已经是够多的了，并且还有更多的焦虑在等着我！他们会把我送走吗，或者就让我待在这儿？我怎么跟我的家属见面呢？母亲已经死了——她不能再等待了。这样倒好一点。不然我们母女的相见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啊？她躺在死床上；我让宪兵们押着走到她的床前。……我们能够对彼此说些什么呢？一个患病垂危的母亲和一个关了二十年才从牢里释放出来的女儿！没有人受得了这样一次的会面的。一定还有宪兵们站在房门口……我还是不能够静下心来。我有什么办法从这些思想的围攻中脱逃呢？只要我有一本书也好，那么我就可以用别人的思想来压住我自己的思想了！

我敲着门："看守，请给我找点什么东西来读。我换了个新地方就睡不着。"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宪兵答道，"图书馆关门了，不过我会去找找看。"

一刻钟以后一个细长身材的下士出现了，他有一张漂亮的、有相当教养的脸孔。他递了一本书给我，一张单页从书中落了在地上。我把它拾起来。啊，奇怪！

我面前是一张印得漂亮的纳特孙[1]的像。我翻开书页。我不满意纳特孙的诗。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一个讲空话的人，而不是实干的人，这使我不喜欢。可是我的心境却改变了；纳特孙的软弱的意志反而唤起了我的力量。

我不再害怕了，恐惧已经离开我了。今天不会再有什么事了，明天呢——我用不着去想明天的事。

我把纳特孙的像放在我面前桌子上，就靠着水瓶；有一个朋友跟我在一块儿，我并不是孤独的。

彼得保罗要塞的钟响了起来，它们唱着二十年前唱过的同样的调子。……我睡着了。涅瓦河的黑浪在叫吼；一只白色小火轮向着未知的地方急急驶去。船的名字是“帕龙德拉”。然而我那时并不知道“帕龙德拉”的意思就是“当心！”

---

① 西蒙·纳特孙（一八六二——一八八七），旧俄诗人，只活了二十五岁。

第一次重逢

三天过去了，他们还不许我接见任何人。

“在所有别的囚人接见亲友的那一天，您会看见您的家属的，”督察长说。

这是残酷的，但也是聪明的办法。不论是多么急切的盼望，它总不能够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种使人倦怠的紧张终于宽松了；到了第四天，我的心差不多完全平静了，我也不再等待了。我专心地读着喀莱尔[1]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就在这一天下午一点钟光景督察长走进我的监房里来。

“快准备好，”他说，“您的弟弟和妹妹们都已经到了：您马上就要给带出去会见他们。”他看见我的脸色发白，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便加上一句：“我告诉他们要做出好象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样子。”

“好象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样子！”这是残酷

① 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的散文家和历史家。

的，但也是聪明的办法。这好象是一份节目单，不仅是为他们，为我弟弟和妹妹们安排的，并且也是为我安排的，我应当照着节目单去做，可是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份节目单说装假。大家一块儿演喜剧。"好象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样子！"不要扑倒在地上，不要拿头去撞地板，不要浑身打颤地啼啼哭哭。戴上一个面具！弄熄你灵魂里所有的火焰！

他们领着我经过一些走廊，楼梯和陌生的过道，我的脚步又有些不稳了，我想找一个东西来支持我，便伸了手去扶住墙壁。一道门开了。

我的弟弟和妹妹们坐在那儿。我的弟弟是一个强壮的中年人，一个漂亮的工程师，他已经给他自己开辟了一条宽阔的生活道路，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没有胡子、脸颊红红的青年。我的妹妹们现在都是健康、端庄的太太，家庭中的母亲了，她们都已经有了二三十年的生活经验了，我当初跟她们分别的时候她们都还是柔嫩的少女。他们全坐在那儿，我站在他们面前，好象狄更斯[1]的小说中的那个女人一样，那个穿着破烂的结婚服的疯狂的老妇人在许多年前她的婚期

---

①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英国小说家，这里提到的那本小说是他的晚年的作品《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

中知道自己受了骗，她的新郎不会到场了，她便把钟停止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一天的正午十二点。我的生命已经在二十年前停止了，我也是靠着那个疯狂的幻觉生活下去的，我始终以为生命的钟仍旧定在正午十二点上。

我的弟弟扶我坐在他对面一把椅子上。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中。他就这样一直握着它们。我害怕动，所以我只顾朝他看；他改变得不多，我尽力去找寻从前那个脸颊红红、没有胡须的彼特亚。[1]我得在这改变了的陌生的面貌上逐渐找出一点熟悉的东西。遥远的"过去"的纤弱的面容渐渐地透过了"现在"的厚的面幕显露出来。我开始认出并且找到我所寻求的东西。这好象是我在陌生的远地，在混乱不明的暗雾中居然找到一个不结实的路标，我正在努力把记忆的线团系在它上面，为着想拉长那线团，一直长过二十年的距离，这样才把"过去"跟"现在"这不幸的时刻连接起来。……

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我记不起来了。没有内容的空洞的话接连地从我们的嘴唇上落下来，就象一些伪币接连地落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发出那种响声似的。脚灯打起来了，我们在做戏，"好象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

[1] 彼得的爱称。

的样子。”

“接见的时间完了！”督察长说，他站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睡不好觉，时常醒来，我觉得快要发狂了。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激烈的、不能控制的话语，就象是一大股激流，都是没有意义而且并不连贯的话。物件的名字——名字和名字。它们大量地倾倒出来，就象一堆白色碎纸从一个正在给人震摇着的口袋里滚出来一样；它们落下去，就跟一个人猛然挨了一下拳头以后看见的火星一样地快。同时我的知觉又象一个旁观者似的惊恐和焦虑地问着：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这情形要继续下去，并且我会发狂吗？……

后　记

一九二七年我曾发愿要把俄国革命者薇拉·妃格念尔(Vera Figner)的《回忆录》全部译成中文。那时我曾在一本书里写下这样的话："实在这部书象火一样点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现在，虽然是在写了那样的话的二十年以后，但我终于把《狱中二十年》的译稿交出去了。这是《回忆录》的第二卷，它还有一个名字：《生命的钟停了的时候》第一卷还在翻译中。第一卷，依据德译本叫做《不自由毋宁死》；依据英译本叫做《一件完成了的工作》。我决定给它换上一个题名：《俄罗斯的暗夜》，那是德译本的《回忆录》的总名，原文是《笼罩着俄罗斯的夜》。

德译本《回忆录》的第二卷中共有三十章。英译本比较德译本少了七章，但另外加了一章，所以英译本的第二卷只有二十四章。不过我在英译本中也发见了不

少被德译者删去的句子。

第二卷是作者的《狱中记》。作者在一八八三年初被捕，到一九〇四年十月出狱，她一共在监狱里住了二十二年。然而她的《狱中记》却只是她在席吕塞尔堡中的生活纪录。她是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被押送到席吕塞尔堡要塞里去的，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离开要塞（从那儿她又被送到彼得保罗要塞中去，关了些时日），刚巧是二十年。

作者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老将。她参加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关于这一切详情以及作者的家庭环境和她三十岁以前的经历，在《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均有详细的叙述。

关于作者妃格念尔，她的友人尼·米海罗夫斯基（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曾经说过如下的赞美的话：

“她所放射出来而且如此吸引着她周围的人们的魔力与动人处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这不容易说出来。她自然又聪明，又美丽。但是她岂只聪明而已。至于美丽，那是革命团体中所不大注意的。可是此外她又没有别的特殊才能。她之所以动人，在于她整个身心十分谐和，十分一致，她的

一言一动都表现着她的整个自我；疑惑与犹豫是她所不知道的。通常这类的人总是非常刻苦、十分严肃的，然而她完全不是这样。刚相反，当党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她便很活泼，很爱戏谑，就象一个小女孩似的。”

她生于一八五二年六月，在一九四二年病故，逝世前曾在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里担任职务。

巴　金　一九四八年九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狱中二十年
作者＝
页数＝２７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